



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

回憶文革：在超越與再現間的選擇視野

研究生：蔡明苓 撰

指導教授：石之瑜 博士

中華民國 九十七 年 八 月

## 摘要

爆發於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一九七六），不僅在中國當代史上，而且在整個世界史上都寫下了相對神秘又深刻的一章。以暴力為核心，不僅重創了中國的政經結構、社會秩序與悠久的文化傳統。這一場盛大的荒謬祭典，獻祭了數百萬人的生命。然而，文革如今所呈現的模糊印象，非但出自親歷者記憶的逸散或混淆，而是中國對文革的暴力處理模式。

四十年過去了，屬於文革的集體記憶正在流逝，但遺留的巨創仍瘡痍滿目地存在。文革回憶錄作為文革研究之外，窺伺文革時代具貌的途徑，沿著其特別的書寫模式與敘述深度避開了政治上的考驗，無論採取「超越式」（張戎、徐友漁）、「再現式」（季羨林、楊絳）、鎔鑄兩者的「半超越式」（巴金、楊曦光）書寫策略，都忠實呈現富涵個人哲學的知識脈絡。透過參照「文革角色」、「作家國籍」、「寫作身份」、「出版地區」四個向度，進而呈現西方社會科學長期存在的特定普遍觀點對文革親歷者的影響，最後提出以「身份作為一種策略」的文革回憶，在本質上代表著文革敘事主體的回歸與再回歸，有著補充規範性質的實踐意義。

讓歷史告訴未來，為了療癒文革傷懷，不忍忘卻這段極為重要的歷史經歷，親歷者如此躬逢其盛地透過回憶的銘刻，再現歷史，反思歷史，引領讀者一同捲入那個屬於荒謬的、狂飆的、史無前例的文革時代。

關鍵字：文化大革命、文革回憶錄

# Abstract

Evolved in the 60s (1966-1976),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opened a mysterious and deep chapter not merely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but also in World history. Cultural Revolution's core is violent. This phenomenon hit deeply into china'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ystem, society's order, and cultural tradition. Millions of people had been sacrificed in this huge and irrational ritual. Yet, the illusive impression towards this Cultural Revolution doesn't result from people's scattered or mixed up memories, but from the way China dealt with it.

For forty years,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has been fading. However, massive trauma still remains. Memories of this Cultural Revolution provides not only the research of Cultural Revolution but also gives a way to peep through via its special narrative mode and depth, avoiding political testifying. Whether those writers use "Transcendental skill" (like Jung Chang, Xu You Yu), "Reproductive method" (like Ji shian Lin, Yang Jiang), or the "Hemi-Transcendental skill" (like Pa Kin, Yang Xiao Kai) that involves above mentioned techniques, they all faithfully show us their personal philosophical thinking of that special time. Using four dimensions as reference: social status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riter's nationality, writer's identity (official scholar/ free writer), and area of publication, this thesis will show how the prevalent western social science value affects those people who have experienced this Cultural Revolution. Finally, this thesis shows how one's identity can be regarded as a writing strategy.

History can be a mentor to the future. For truely healing the trauma, we shouldn't forget such important experience. By their retrospection, people who lived during that period lead readers into that special irrational, rush, unprecedented period.

Keywords: Cultural Revolution, Memoirs of Cultural Revolution



# 回憶文革：在超越與再現間的選擇視野

## 目次

第一章 導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	1
第二節 研究背景.....	4
第三節 問題意識與研究目的.....	6
第四節 文獻回顧.....	7
第五節 研究途徑與研究限制.....	18
第六節 章節安排與論文架構.....	20
第二章 「超越式」普遍觀點的文革記憶—張戎、徐友漁.....	23
第一節 張戎、徐友漁之生平記事與其思想.....	23
第二節 文化大革命中的張戎與徐友漁.....	28
第三節 「超越式」普遍觀點的文革記憶表現手法.....	35
第三章 「再現式」文革記憶敘事—季羨林、楊絳.....	45
第一節 季羨林、楊絳之生平記事與其思想.....	45
第二節 文化大革命中的季羨林與楊絳.....	49
第三節 「再現式」文革記憶敘事表現手法.....	60
第四章 「半超越式」文革記憶敘事—巴金、楊曦光.....	69
第一節 巴金、楊曦光之生平記事與其思想.....	69
第二節 文化大革命中的巴金、楊曦光.....	75
第三節 「半超越式」文革記憶表現手法.....	80
第五章 三種文革回憶寫作策略之身份意涵.....	89
第一節 「超越式」論述之身份意涵.....	90
第二節 「再現式」敘事之身份意涵.....	96
第三節 「半超越式」寫作之身份意涵.....	101
第六章 結論.....	109
參考文獻.....	113
附錄 徐友漁訪談稿.....	118

圖表

(圖 1.1) 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

(圖 6.1) 六位書寫者之寫作策略與文革角色／國籍／寫作身份／出版地區綜合分析

(表 5.1) 寫作三式與四個分析向度的理解

# 第一章 導論

## 第一節 研究動機

「中國文化大革命的驚人性和規模、影響與複雜性…無論從哪一個方面來看，這都是一個值得世世代代長期研究下去的歷史課題」<sup>1</sup>

—費正清（John Fairbank）

### 一、不忍忘卻的紀念：銘刻回憶的文革研究

此刻，我們與文化大革命爆發距離已近半載，此刻，中國經濟發展疾駛狂飆，改革開放已屆三十年。人們似乎已然忘卻四十二年前那場的全民祭典，那段藏於夢底的十年狂飆，但同中國當代文壇巨擘巴金一般「心還在發痛，還在出血」的感懷仍盤旋在親歷者心中。屬於文化大革命的集體記憶正在流逝，但文化大革命帶來的巨創仍瘡痍滿目地存在。時間正不斷淡化著歷史記憶，侵吞著親歷者的文革經歷。文革研究，為西方知識界觀察中國政治發展的歷史途徑之一，但對中國人而言，卻是銘刻回憶，記取教訓的重要儀式。

西方學術刊物如《China Quarterly》季刊、《Asian Survey》、《Problems of Communism》等，早於六〇年代便對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進行學術性的研究，直至八〇年代，這波西風東漸的風氣與中國內部稍微寬鬆的研究氛圍相互作用，其時在中國已有不少相關著述，如劉國凱《文化革命簡析》、王希哲《毛澤東與文化大革命》、高舉與嚴加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以及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九〇年代則有席宣與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簡史》。歷經八〇年代「文革研究中國化的試煉」，海內外同時出現大規模的中國文革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和一批海外中國學者共同扮演著重要角色。

<sup>2</sup>一九九六年，文革研究分別在海內外有了第一道閃耀的光芒。

---

<sup>1</sup> 出自著名之中國學研究學者費正清《觀察中國》一書，John King Fairbank, 1985. *China Watch*,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158.

<sup>2</sup> 徐友漁，2006，〈文革研究從西方回到中國〉，《開放雜誌》，2006年05月，期233，頁48-50。

一九九六年，在中國本土之外，「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在美國哈佛大學舉行「文革三十周年學術研討會」，由楊建利博士主持，會後出版了《紅色革命與黑色造反》研究文集；香港中文大學的《二十一世紀》雙月刊推出文革專題，由劉青峰教授編輯出版《文化大革命：史實與研究》。同年，中國本土境內，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當代中國研究所北京大學中國國情研究中心各舉辦了一場相對較小規模的文革研討會，《青年報刊世界》雜誌、《焦點》雜誌、《東方》雜誌皆出版了文革專輯報導。

作為實際欠缺的補償，網路上的文革博物館在一九九六春天由《華夏文摘》編輯部建立，成為虛擬文革「嚴肅記憶」的首次嘗試。<sup>3</sup>第二次文革虛擬記憶的嘗試落於二〇〇二年，由旅美學者宋永毅(Dickinson College, USA)主編，石之瑜(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wan)、丁抒(Norman Dale Community College, USA)、周原(University of Chicago, USA)、沈志佳(University of Colorado at Boulder, USA)、郭建(University of Wisconsin, USA)、周澤浩(York College of Pennsylvania, USA)、王友琴(University of Chicago, USA)共七位學者參與編輯的《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為文革嚴肅記憶創建了首張光碟資料庫，收錄的原始史料達一萬篇、三千萬字以上。

承襲一九九六年海外首次大型文革周年研討會的精采集結，二〇〇六年美國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紐約市立大學史泰登學院(College of Staten Island of CUNY)及紐約皇后區圖書館國際資訊中心於美國紐約，舉辦了《歷史真相和集體記憶：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國際研討會》，會後出版編著專書《文化大革命：歷史真相和集體記憶》，繼續帶領著文革研究者一同挖掘、銘刻文革回憶，高喊「反抗專制本質上就是拒絕遺忘」。這場會議與會學者近六十名，聽眾多達二百人，會議論文計有五十餘篇，時隔十年，文革研究又在海外達到空前的盛況。與此相較，同年由北京學者發起舉辦的「二〇〇六北京文化大革命研討會」，與會共計僅十六名學者，規模與海外形成鮮明的對

---

<sup>3</sup> 任教於加州聖瑪莉學院(Saint Mary's College of California)英文系，亦是著名海外文革研究者的徐賁教授將文革記憶分為「嚴肅記憶」及「通俗形式」兩態，而「虛擬文革博物館」、「講述文革敘事」、「消遣娛樂的文革懷舊」則為三種從嚴肅過渡到通俗的文革記憶。見 2006，〈變化中的文革記憶〉收錄於《二十一世紀雙月刊》，期 93，頁 19-27 與 2007，〈全球傳媒時代的文革記憶：解讀三種文革記憶〉，頁 916-940、〈懷舊物品與文革記憶〉，頁 982-1003，後兩文收錄於宋永毅主編之《文化大革命，歷史真相與集體記憶》(下)，香港：田園出版社。



照。在中國，香港中文大學繼續扮演著中國本土之外、中國文革研究最重要的推進角色，同年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的《二十一世紀雙月刊》承襲傳統，繼續推出文革四十週年的研究專題。

承上，文革作為重要的中國歷史研究課題，巧妙地呈現兩種局面：「海外（包括香港）熱，國內冷；民間熱，官方冷」，<sup>4</sup>或是中國本土之內的「被禁錮的文革」，與海外的「說不盡的文革」兩者。<sup>5</sup>歷史能告訴未來，研究能重現集體記憶。中國人研究文革的目的，無非是更深刻地銘刻文革記憶——無論是透過再現經歷、發現史實、深層研究的方式。於是乎，為了療癒文革傷懷，不忍忘卻這段極為重要的歷史經歷，如此躬逢其盛地透過回憶的銘刻，接近歷史，反思歷史。

## 二、敘事主體的回歸：從文革研究進入文革回憶的兩個意義

文革研究雖然能夠呈現文革的歷史回憶，深刻關注特定議題，然而文革研究在中國本土嚴苛的政治侷限，卻無可避免地造成海內外文革研究迥然不同的景象。澳大利亞塔斯曼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Tasmania）的高默波教授（2000）認為：「中國的政治目的是，文革要否定，但要是抽象的否定；譴責文革可以，但理論問題談的越少越好。」<sup>6</sup>而文革回憶錄，恰恰能沿著其特別的書寫模式與敘述深度避開了政治上的考驗，而能夠忠實呈現富涵個人哲學的文革回憶，與此同時，又由於其原創性與多樣性，鑄鑄「被禁錮的文革」與「說不盡的文革」兩者看似不相容的它者，使兩者在有同等呈現的可能。因此，文革回憶錄與文革研究的關注可能雷同，但回憶錄的文本呈現卻更具有彈性，這是敘事主體回歸到回憶錄書寫者的第一個意義。再者，透過書寫者的娓娓道來，回憶錄造成讀者的情感效應比起一般研究有過之而無不及，使讀者能輕易地進入書寫者的認知結構中，重現歷史，甚至某種程度地再造文革，這是敘事主體回歸到回憶錄書寫者的第二個意義。

---

<sup>4</sup> 有關文革四十週年海內外研討會截然不同的光景，見金楓，2006，〈文革四十週年，兩個研討會〉，《爭鳴》，2006年06月，期344，頁85-86。

<sup>5</sup> 參見宋永毅主編，2001，〈說不盡的文革和被禁錮的文革研究〉，收錄於《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總導言。

<sup>6</sup> 參見高默波，2000，〈文化大革命及史論方法：評回憶錄〉，《香港社會科學學報》，期16，頁153。

## 第二節 研究背景

### 一、《決議》定江山

爆發於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中國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一九七六年），不僅在中國當代史上，而且在整個世界史上都寫下了相對神秘又極為深刻的一章。文化大革命無疑是一場經典的歷史悲劇，對政治體制、文明傳統、社會秩序、經濟發展造成了莫大的重創；人民的基本權利遭到難以彌平的傷害。這一場盛大的荒謬祭典，獻祭的是起碼百萬人的血肉性命，祭典之名為「中國大浩劫」。<sup>7</sup>它如今所呈現的樣貌，是世人對此十年既模糊遙遠、卻又深刻宛如親歷的集體記憶。模糊神秘的，並非來自當事人記憶上的逸散或混淆，而是中國對文化大革命的含糊化處理；歷歷在目的，絕非當年那一張北大校園內的「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而是「西風東漸」<sup>8</sup>的文化大革命研究及汗牛充棟的回憶錄。何以如此？其來有自。

一九八一年，鄧小平主持起草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對文化大革命採取全盤否定以及避重就輕的立場。一方面高舉林彪與「四人幫」（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為代罪羔羊，認為他們為奪取最高權力而組成「反革命集團」，在欺瞞毛澤東的前提下，狡詐地利用毛澤東的左傾錯誤，進行了大量禍國殃民的罪惡活動；另一方面為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幹部辯護，尤其將劉少奇、鄧小平從「資產階級司令部之首」的指控中解放出來；並指稱文革為「十年浩劫、十年動亂、全面內戰、一塌糊塗、一團漆黑、一無是處」，是一次「所費不貲」的歷史教訓，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而對黨、國家和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更有甚者，《決議》一文在承認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左傾錯誤之外，將文化大革命視為「毛澤東晚年錯誤」，認為其「明顯地脫離了作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的軌道，從而巧妙把此一歷史錯誤與正統毛澤東思想完全區別開來。此後，一言而為天下法，中國內部關於文革的評價由此

<sup>7</sup> 關於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人數的統計，至今仍未獲得最終證實，但根據研究報告至少百萬人計。陳永發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估計為一百七十二萬人以上；丁抒於〈兩百萬人含恨而終—文革死亡人數統計〉一篇中直指為起碼兩百萬人；文革後中國官方據說有一百多萬人「非正常死亡」的說法。參見陳永發，1998，《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台北：聯經出版社，頁846與丁抒，1999，〈兩百萬人含恨而終—文革死亡人數統計〉，《開放雜誌》，1999年8月，期152，頁36。

<sup>8</sup> 徐友漁，〈文革研究從西方回到東方〉，《開放雜誌》，期233期，頁48。

定調，將富於批判性質的文革研究排除於中國本土之外，香港除外。

此一定案不表示後人對文化大革命的認識已有了最終的答案，恰恰相反地，作為一場全民被迫捲入的狂飆時代，文化大革命有其多樣而複雜的面向，實則是中國學研究者無法忘懷的一章。文革學研究以海外與香港為發展重鎮，但中國國內的文革研究並不被允許產生學術上的串聯，而僅以論文形式在學術期刊發表居多，舉辦以文革研究為主題、次主題研討會的機會卻是微乎其微，甚而連公開演講都被扼殺。造成文革研究在海外（香港）與中國本土發展迥異，而形成鮮明的對比。

## 二、書寫中國：一個中國，兩種意義

針對中國文革的研究頗多，除了以發表地為判準的中國本土—海外之別，在書寫的意義上，可根據閱讀作者的意圖後，大抵分為持普遍性質的「超越式」觀點與其相對的「再現式」觀點兩種視角。普遍性質的「超越式」觀點認為，中國學研究可以透過跨國界的進行，建立一套穿越古今、橫跨中西的操作型定義，從而進行跨國界的比較；更重要的是，讓中國的文革研究蘊含特定普世價值，研究者以客觀的一般性知識檢視文革，建立通往某種人類共通歷史目的之途徑，甚至將中國視為待進步、待學習的國家。準此，如果一項關於中國社會現象的發現，不能對普遍性質的律則有所啟示，則這個發現只能是一種不足的知識。但若一味地套用西方知識界之標準，則又粗糙地將可能屬於中國獨特歷史演變中的知識與力道化約為知識論、目的論、方法論、實踐論上的普遍律令。故相較於「超越」觀點著重的普世價值，道德情感上有著較強烈的批判論述，還有與其相對的「再現」觀點，則著重文革經歷的清晰呈現，較傾向淡然的敘事模式，不傾向強烈的批判態度。<sup>9</sup>當書寫者回憶自身的文革經歷或進行文革研

---

<sup>9</sup> 如季羨林身為文革中北大首當其衝的受害者，卻在二〇〇三年出版的文革回憶錄《牛棚雜憶》中透露：「其實文革中沒有加害者與被害者之別，一切的暴力都是由於秩序的破壞，加上人們盲目的趨同，因此人性中最醜惡的一面便肆無忌憚地表現出來。」正因對文革暴力沒有抱持著非黑即白的道德決斷，因此在「再現」文革回憶時有如此的體認，而產生對文革經歷有著看似較為寬容、卻也語帶自嘲的敘事。這種立場類同於楊絳所言：「烏雲蔽天的歲月是不堪回首的，可是停留在我記憶裡不易磨滅的，倒是那一道含蓄著光和熱的金邊。」有別於在普遍觀點下，試圖為自身文革經歷做出「超越式」的道德律令與價值評論，將革命罪惡總歸於領導階層，以特定的普世價值意涵為度來丈量自身文革經歷，如季羨林、楊絳等人純然使用「再現式」的敘事觀點，對文革的關注在於文革迫害的偶然性、受害者與加害者界線的模糊，常帶著諷諷的角度來描寫文革經歷中日常生活的瑣事。這些再現式的文革回憶敘事，有無窮的個人經驗與思想基礎。

究時，往往在「超越式」批判或者「再現式」敘事之間選擇，但選擇後又常同時顯露另一視角的痕跡，甚至有兩種視角交互存在，可稱之超越不完全的「半超越式」書寫模式，本論文對文革回憶錄之分析即從此著手。

### 第三節 問題意識與研究目的

文革回憶錄蘊含豐沛的個人知識內涵，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採取「超越式」、「再現式」、「半超越式」三種視角中的哪種視角回憶文革，都不脫行為者之身份意識的反映，行為者的實存狀態終究不斷衝擊其知識的內涵，<sup>10</sup>行為者的身份意識出自他們書寫時所要面對的對象，對文革經歷自然會有不同的詮釋與反應，書寫的尺度又因所處狀態有異。因此，文革回憶錄的寫作策略無論是「超越式」、「再現式」、「半超越式」都不脫寫作與出版者與他們所面對的對象的身份脈落。如此一來，所有文革的回憶就很大程度地根源於寫作者自身的歷史脈落當中，包括其生長經歷與文化環境、文革經歷、實存國籍、寫作身份與回憶錄出版地區等。這些共享的或獨有的個人化的差異裡，深刻地鑲嵌著書寫的身份意識。

承上，本論文透過剖析文革回憶錄，因書寫模式的趨同分別挑選張戎與徐友漁、季羨林與楊絳、巴金與楊曦光六位文革親歷者，將六人的文革回憶歸整為：帶有普遍觀點的「超越式」書寫策略（張戎、徐友漁）、「再現式」書寫策略（季羨林、楊絳），以及同時沾染兩造色彩的「半超越式」（巴金、楊曦光）書寫策略。這六位書寫者皆有文革經驗、具留學背景，更具備足以相互參照的身份意涵，藉此觀察西方社會科學對中國書寫者在知識形成過程中的影響，以及個人身份策略上的選擇意涵。

簡言之，本文研究目的有三：

- 一、分析三種文革回憶：「超越式」、「再現式」、「半超越式」的文理樣貌與價值意涵。
- 二、透過參照「文革角色」、「作家國籍」、「寫作身份」、「出版地區」四個向度分析三種寫作的身份脈絡；此處進一步將每一種策略中的兩位書寫者以此四個向度區別

---

<sup>10</sup> 如英籍華裔作家張戎（Jung Chang, 1952~）出身共產黨高幹家庭，自幼接受最正統的共產教育，但在成長過程中，逐漸因其生命歷程中的重要事件（文革經歷、文革後經歷）而激發自身深層的反省，也促使她對價值意識的重新詮釋。在了解真實，探悟是非與真理之後，她試圖告訴讀者：人的生命力與渴望追求幸福的能力皆與生俱來，不能受恣意剝奪。

開來，進行同中求異的比較研究。

三、透過個人化的歷史脈落參造，進而呈現西方社會科學長期存在的特定普遍觀點如何影響文革書寫，觀察中國學研究長久以來存在的普遍式觀點，並提出以「身份作為一種策略」的文革回憶，進而反映了書寫者基於際遇與身份流轉所促成的策略選擇與其論述內涵。<sup>11</sup>致使書寫者在普遍與相對，超越與再現之間擺渡的，莫過根源於書寫者因所處歷史脈絡中的身分意識，於是當書寫者在選擇「進入」或「跳脫」某種身分意識時，就產生對文革體驗的不同的論述。

#### 第四節 文獻回顧

當事人的回憶錄是認識文革的重要途徑，但是比起文革研究，文革回憶錄不免碰觸到真實性的隱憂，爲了克服此一困難，應當考慮書寫者的歷史背景、外在環境、政經結構、階級利益等對個人認知結構的影響，還應當意識到，認知結構可能具有隨機性，並沒有永恆的真理性，沒有決然獨立的客觀性。不過，儘管個人的認知結構帶有莫衷一是的特徵，但卻具有呈現某種趨同的可能，以致書寫者採取特定的知識內涵與身份意識來詮釋自身文革經歷——無論是作者不知覺或主動地反射出自身境遇流轉中不斷變動的身份意識。<sup>12</sup>儘管文革研究或文革回憶錄文獻通常不直接回答關於知識立場的選擇，但是讀者仍可在文本中參透作者的價值取向，尤其回憶錄更能透露此種個人化的選擇，可從梳理作者對文革經歷的書寫樣態來觀察。<sup>13</sup>在開始對文革書寫者的身份與研究結果進行省思之前，爲求客觀對待書寫者界定的問題意識，以下根據本論

---

<sup>11</sup> 如張戎對文革的問題意識通篇環繞著批判毛澤東個人爲主軸——無論是以左傾謬誤、善謀好鬥、妄自尊大、枉顧親情、花心濫情等全面性質的批判，她將文革化約爲一場由毛澤東個人政治鬥爭爲出發的全國性批鬥大賽，並將文革的恐怖活動直指爲毛澤東個人非道德的權力競逐之極致呈現。她對中國的未來抱以進步史觀：「我明白我很幸運，儘管我的家庭遭受到種種巨大的不幸，但畢竟有優越的條件。現在看來中國正在變得更開放更公正，我焦急地希望變化得更快，讓全國的人都一樣幸運。」以張戎爲例的普遍觀點式的道德律令之下，文革回憶顯然已超越了文革經歷其自身，而是以其它外於經歷本身的判準來評量自身的文革經歷，處處流露出革命的罪惡、毛澤東的全盤不赦以及書寫者無法跳脫的受害者身分。

<sup>12</sup> 這特定的知識內涵可能是帶有普遍意涵的自由主義式、左派式、無政府主義式；而這身份意識可能是文革中的革命實踐者、溫和理論派，可能是狹義受害者，但鮮少是加害者；文革後的身份意識可能是中國籍／華裔身份、學者／自由作家、認同傾向中國／中華文化。

<sup>13</sup> 如書寫暴力時，作者是坦然書寫暴力抑或著重善的一面，表現冷漠或是情緒激昂，直接批評抑或暗中嘲諷，皆不自覺地透露了作者的價值立場。

文中關注的六位書寫者在回憶錄中直接與間接關注的課題，將文革研究文獻分爲：一、文化大革命的成因；二、文革的本質；三、文革研究的幾點關注（第一張大字報、群眾動員起因、紅太陽式崇拜、文革暴力），最後再簡述整理文革記憶的概況。

一、文化大革命形成之因：領袖觀點、路線觀點、社會心理觀點、外部觀點

### （一）從最高領導者切入

首先，研究文革何以形成，由於文革爲毛澤東一手促成，所以幾乎無法避免地涉及到對毛澤東個人的研究，由此表現出特定領導者啓動文革的重要意義。<sup>14</sup>這可由王若水（2007）的一句話說明：「換了別人（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中的任何一個）處在毛澤東的位置，雖然也會犯這樣那樣的錯誤，但是不會發動文化大革命卻是可以斷言的。」<sup>15</sup>此種觀點雖屬於階級觀點，但認知上不傾向將領導階級全然混同，而是強調領導階級中的特定人物對革命有著決定性的作用。

於此，研究者常從政治理論、統治哲學、權力競逐過程中參透毛澤東的內在思想，再由內而外地論及毛澤東發動文革之心理動因與行動過程。此觀點並非否定其它促成文革的因素，但卻認爲其它因素得以作用仰賴毛澤東的發動。如此一來，這樣的研究往往將文革化約爲一場由毛澤東爲了規避大躍進以來的左傾錯誤，以個人政治鬥爭爲手段，而形成全國性質的批鬥大賽，並直指文革恐怖活動爲毛澤東個人非道德的追求權力、慾望的過程。由毛澤東個人利益出發，他先後支援了保守派與造反派，使群眾瘋狂地投入這場名爲反官僚、反迫害的運動，毛澤東和群眾之間的關係是政治聯盟關係，也是某種形式的互相利用的關係。<sup>16</sup>簡而言之，從最高領導者切入的觀點將文革歸結爲「精英（專指毛澤東）操縱群眾實現個人目的」的運動。<sup>17</sup>

<sup>14</sup> 參見席宣、金春明，1996，《文化大革命簡史》，北京：中國黨史出版社；Fairbank, John King. 1986.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1800-1985*. New York: Harper & Row。華新民，2007，〈關於「毛澤東爲什麼要發動文革」的研究述評〉，頁 173-185、王若水，2007，〈毛澤東爲什麼發動文革〉，頁 186-202、王力維，2007，〈毛澤東主義和人間天堂〉，頁 203-234、李劫，2007，〈毛澤東的文革：在毛天下與黨天下之爭中同歸於盡〉，頁 235-258。以上四篇文章收錄於《文化大革命：歷史真相與集體記憶》，宋永毅主編，香港：田園出版社。

<sup>15</sup> 王若水此言之目的在於突顯「特定領導人」對文革啓動的關鍵，而非要作出反歷史的假設或從中比較。參見王若水，2007，〈毛澤東爲什麼發動文革〉，《文化大革命：歷史真相與集體記憶》，宋永毅主編，香港：田園書屋，頁 186。

<sup>16</sup> 楊曦光、王紹光、周倫佐都持此群眾觀點的說法。

<sup>17</sup> 事實上，將革命的本質視爲精英階級爲擷取更多稟賦的手段之說其來有自，早在 18 世紀敵視革命的英國保守思想家伯克（Edmund Burke, 1729-1797）就系統地發展了這個觀點，用來徹底否定當時的法

## （二）黨內社會主義路線的衝突

同從最高領導者切入的範疇，此種關注亦是從領導階級出發，亦都不傾向將領導階級全然混同。前者著重於領導階級中，最高領導者對文革發動的決定性作用；後者則強調領導階級中，存在著對社會主義路線的認知差異，<sup>18</sup>尤其是文革領導人與黨內同志的路線差異間接造就了文革。共產黨內的保守派（親蘇派），主張移植蘇聯體制，其對史達林（Joseph Vissarionovich Stalin, 1879-1953）到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 1894-1971）的社會主義路線有著強烈信仰。但另一方面，黨內的本土派則認為蘇聯的新領導集團只知道抓住「個人崇拜」問題不放，卻全盤繼承了史達林遺留下來的僵化的經濟體制，以及群眾基礎薄弱政治社會制度，卻從未想過進行制度上的調整或革新。1956年，赫魯雪夫在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對史達林的政治肅反，使毛澤東深刻體會史達林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犯的錯誤所招致的結果，要避免這種政治清算，就必須發動一場真正擊垮階級意識形態的革命。他認為即使共產黨取得了政權、國家經濟走上公有制，也不代表國內階級鬥爭的意識形態已經消失，相反地，國內階級的鬥爭持續且穩固地在中國肆虐，而「無產階級專政」的時代未全面來臨。社會主義是過程而非結果，必須要著手發動一場的劇烈的階級革命，徹徹底底地讓中國洗心革面，走出有中國內涵、創新的、避免蘇聯弊病的社會主義道路。

## （三）社會心理觀點：社會集體反抗意識的爆發

持社會心理觀點者，認為文革爆發是中國社會基於一種從內而外、從下至上反抗權威的心態，長久以來人們集體的不滿找到了爆發的管道：即文革本身。對內，反抗悠久的中國傳統，破除幾千年來一切剝削階級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破四舊），並身體力行地反抗長期佔據社會優勢的「右派權威」。由毛澤東引領文革後，這股集體不滿的巨流宣洩而出，各地紅衛兵競相效仿彼此的暴力

---

國大革命。直至近代，這些反對革命（但不一定為保守主義）的理論全都如此認識革命本身：「一切革命的本質都是少部分精英野心家的狡詐設計，透過煽動群眾來達到自身目的。」事實上，群眾的造反是違反群眾自身階級利益的，但是群眾卻天真地深信透過革命所能得到一切，如此一來，社會將為革命付出極大的代價，但對統治階層的既得利益則無傷害。

<sup>18</sup> 這種對社會主義路線的認知差異，在國際層次上與冷戰期間中、蘇社會主義的路線差異有關，體現於五〇年代兩國一連串之交惡。此種意識形態的路線差異，強化了中國共產黨黨內的保守派與本土派間既存的歧見。

行爲。一時間，破四舊成了踐踏法律、恣意妄爲的絕對律令、通行證件、神符魔咒。對外，則形成一種集體扭曲的國民心理，中國人對外來文化和現代社會的國際交往方式施以最極端的暴力，是以禁絕所有西方文化相關典籍、甚而產生紅衛兵火燒英國代辦處的暴行。此種內外的集體反抗，主要行爲者爲老紅衛兵，構成文革初期的暴力樣態。社會心理觀點關注於社會既存的衝突，此種衝突肇因於資源的主、客觀稀缺，奠基於個人對所屬階層更高權力的汲取，以及對現存境況的不滿。以此分析，除了領導階層內部既存的矛盾外，文革前存在著兩個重要的社會分化狀態：精英與群眾間的垂直衝突、群眾之間的水平衝突，<sup>19</sup>文革中的紊亂不絕的群眾運動就延此而來。

#### （四）外部觀點：反蘇聯之修正主義

除了以上三項詮釋，外部觀點認爲文革動因尚有「國際反修對國內反修的催化」之因。蘇聯作爲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冷戰期間更身居社會主義國家之首，其意識型態卻在一九五三年史達林逝世後有了轉折，赫魯雪夫對蘇聯社會主義路線的修正以及對史達林的否定引爆了中蘇交惡之意識型態歧見，致使國際共產主義出現衝突，一九六〇年蘇聯公開指責中國處理中印邊境事件的不當，<sup>20</sup>毛澤東譴責蘇聯在古巴彈道危機中的退讓。在種種國際條件的催化下，毛澤東遂將蘇聯的修正主義視同反動的帝國主義、民族主義，「是騙子、黑貨，爲國際資本主義服務」。爲杜絕國內跟隨此修正歪風起舞，毛澤東因此提出「反修防修」的口號，並進行大宣傳與大學習，對內目的爲整肅黨內走資本主義路線的當權派。在此意識型態下的催化下，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反對修正主義，推進世界共產革命的歷史使命感油然而生，此種盲目而狂熱的信念，遂成爲紅衛兵們參與文革的思想動力之一，也成爲中國左傾思潮急速膨脹的重要因素，並爲發動文革提供了具體的理論依據。

## 二、文革的本質：一個文革？兩個文革？

---

<sup>19</sup> 王紹光，2004，《理性與瘋狂—文化大革命中的群眾》，香港：牛津，頁 13-15。

<sup>20</sup> 中印邊境事件指的是 50~60 年代中印兩國邊界東西段的衝突。1951 年，印度軍隊越過傳統習慣線向北推進，侵占了非法的「麥克馬洪線」（McMahon Line）以南 9 萬平方公里中國領土。1959 年印度政府公開向中國提出將東段 9 萬平方公里和西段 3.2 萬平方公里中國領土劃歸印度，雙方於 1959 年 8 月和 10 月在中印邊界東段和西段展開武裝衝突，1962 年 9 月 20 日再次對抗，同年 11 月 21 日，中國政府發表聲明，宣布中國邊防部隊在中印邊境全線停火、撤退。



一個文革指的是統治者的文革，是毛澤東錯誤發動、統治者的文革：利用群眾運動來摧毀政敵，攫取政治稟賦，此說在官方發表的《決議》一文中定調。兩個文革，<sup>21</sup>則指出在此一文革之外，尚存在著一個被統治者的文革，是一個富涵群眾運動基礎的「人民文革」，說明群眾利用文革中的合法條件，反抗特權階級的不對等權力壓迫。兩個文革之說，揭示著文革中群眾的相對自主性，說明了文革前中國社會長期存在的階級衝突，更重要的，此一說也突顯了造反派崛起的正當性。

或許這是兩個互相利用、同時又互相衝突的文革。而共同的時空條件把二者融為一體，就使得這融合體成了一團難以釐清的迷霧。楊小凱（1997）、鄭義（1992）、劉國凱（2006）、王紹光（2004）的觀點偏向「人民文革」，認為文革為中國的一種社會動員，毛澤東和黨內文革派發動和支援了群眾造反派，而毛澤東和群眾之間的關係是政治聯盟關係，有著相互得利的功利用關係。<sup>22</sup>相對於「人民文革」肯定群眾運動自主性的基調，邁斯納（Maurice Meisner）（1986）則對此說提出質疑，他認為「文革中『敢於造反』的權力並非人民固有權力，而是被奉為神靈的毛澤東的權威給予他們的權力，因此也是可以由他收回的權力。」徐友漁（2006）也持類似看法，認為沒有所謂「官方文革」與「人民文革」之別，而認為「文革中造反派的行為動機中包含了反官僚的因素，這是正確的，但這種行為的效果卻有兩個相反的方面：它在衝擊大大小小官僚的同時加強和鞏固了頭號官僚的地位。」<sup>23</sup>因此，一個文革與兩個文革之說對文革的認知有著本質上的差異，前者著重統治者之權力，後者強調群眾運動之相對自主性。

除了內部對文革本質的爭議，如「橫掃牛鬼蛇神」、「大樹特樹『紅太陽』的絕對權威」、「打倒階級敵人」等對內的政治目的之外，還具有與此相互聯繫的另外一項重要的功能，即以批判西方政治、文化為核心的目的：反霸權、反帝國、批判資本主義。

<sup>21</sup> 第一個提出兩個文革之說的是王希哲，1981年於《毛澤東與文化大革命》提出人民文革的概念。

<sup>22</sup> 有關三人對人民文革的詮釋，可參照楊小凱，1997，〈文化革命中毛澤東控制下的準政黨政治試驗〉，《浩劫以外：再論文化大革命》，頁273-287；鄭義，1992，〈毛澤東的文革和人民的文革〉，《九十年代月刊》，頁94-99；劉國凱，2006，《人民文革論》，香港：博大出版社；王紹光，2004，《理性與瘋狂——文化大革命中的群眾》，香港：牛津。

<sup>23</sup> Maurice Meisner. 1986. *Mao's China and After: 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New York: Free Press, 324. 另可見徐友漁，2006，〈關於兩個文革的爭論〉，《開放雜誌》，期233，頁60。

職此是故，文革的本質顯然是兩個文革相互聯繫，彼此激化的存在一對內建構平等的社會主義，對外抗拒一切外來政治、文化的侵略。

### 三、文革研究的幾點關注：第一張大字報、群眾動員起因、紅太陽式崇拜、文革暴力

#### （一）文革引爆的起源：大字報自發或授意的兩個意義



圖 1.1: 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北京大學聶元梓造反派共七人於校園貼出大字報，對中共北京市委、校內黨委展開抨擊。六月一日，毛澤東隨即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向全國人民廣播這張大字報，並稱讚它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二十世紀六〇年代北京公社的宣言。毛澤東的支持，讓這張大字報成為文革中幾乎是最重要的校園文件。關於大字報產生的背景因素較無爭議，首先，這關乎文革前校內社教工作隊與校黨委、北京市委間既存的衝突；其次，此張大字報呼應了中央五月十六日發布的文革綱領《五一六通知》——中央對五月召開政治局會議，批判彭真、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並正式決定發動文革。文革中「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被公認為點燃群眾運動的標誌，但其起源與產生經過卻存在著爭議。據文革後中國的說法（1987），

此大字報是康生授意予北京大學造反派聶元梓等七人所為，而康生隸屬於林彪、江青之反革命集團。<sup>24</sup>在此說法之中，毛澤東受反革命集團之欺瞞而不知情，然而印紅標（1996）對此作出顛覆性質的研究結論，認為此大字報非經授意，而是聶元梓等人自發作為。<sup>25</sup>該研究中深入探討大字報產出的迂迴過程，不僅探討大字報的執筆者，以及其標題、內文的修改與簽署過程，甚至連時間都做了一定程度的估計。而聶元梓（2005）本人也證實了此大字報係由自發製作而來。<sup>26</sup>

第一張校園內起身造反的大字報起源是自發或授意，表現出兩個截然不同的意義。若是授意，則群眾運動之起源不脫領導者的掌控，保守派如是，造反派更如是；倘若是群眾自發性質的產物，則表示毛澤東支持的串聯與四大自由（大字報、大辯論、大串聯、批判）奏效，大字報是毛澤東授予群眾部分出版自由的產物，是文革中準政黨試驗的附加價值。<sup>27</sup>值得注意的是，儘管事實上發表大字報是完全自發的，無需任何審批形式，但實際上仍然服務於毛澤東動員群眾之企圖，仍是一種自上而下的權力運作。同時此一試驗點燃了校園暴力之火，讓季羨林（北大東方語言文學系主任）、楊絳（中國科學院外文所研究員）、巴金（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作聯主席、中國作家代表團團長）與其他知識份子一般，自此跌入文革煉獄之中。

## （二）群眾動員的起因

幾乎所有學者都承認，文革中的鬥爭是相當具有派性色彩的群眾組織之間的鬥爭，是群眾基於政治上、理念上、利益上的衝突而展開與敵對群眾組織的武力鬥爭，因此對群眾組織動員的探討也是文革研究的重要之一。印紅標（1995）、唐少傑（1995）、徐友漁（1999a）、王紹光（2004）認為決定群眾衝突的本質原因是尖銳對立的利益、要求和目的，而非純然是意識形態的衝突，也不是一場更換官員職權的政治變革。<sup>28</sup>雖然群眾鬥爭的起源、過程和結局往往不是由雙方群眾能夠完整掌握，而

<sup>24</sup>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1987，《中共黨史大事年表》，北京：人民，頁 348。

<sup>25</sup> 印紅標，1996，〈文革的「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香港：《二十一世紀雙月刊》，頁 37。

<sup>26</sup> 聶元梓，2005，《聶元梓回憶錄》，香港：時代國際，頁 122。

<sup>27</sup> 楊小凱，1997，〈文化革命中毛澤東控制下的準政黨政治試驗〉，《浩劫以外：再論文化大革命》，羅金義、鄭文龍編，台北：風雲論壇，頁 279。

<sup>28</sup> 請見印紅標，1995，〈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造反運動的興起〉，《二十一世紀雙月刊》，頁 61-68；唐少傑，1995，〈清華井岡山兵團的興衰〉，《二十一世紀雙月刊》，頁 47-56；徐友漁，1999a，《形形色色的造反》，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頁 129；王紹光，2004，《理性與瘋狂—文化大革命中的群眾》，

是由上級領導指揮、仲裁，但是群眾動員的力道卻常常超出領導人的預期，甚至對領導者產生某種不可忽略的牽制。在很多情況下，群眾的爭鬥也逃脫了毛的掌控，當毛澤東亦理性的選擇協助有利於自身的一群之後，勢必讓具有反射利益的他群成為新的改革派、新的異端，如此反覆，生生不息，形成「革革過命的人的革命」、「沒有贏家的鬥爭」。如一九六六年七月末到八月初，紅衛兵在全國蔓延的現象是毛澤東意料之外，擔憂無法掌握全局，毛澤東便有意重新指導整場運動。

但群眾動員的起因若以利益衝突一以貫之卻有稍微籠統之嫌，這些衝突之因又可做以下細分：

### 1、毛澤東思想的矛盾性

毛澤東指導文革的理論「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帶有愚民與功利性質。一方面力圖建立一人至高的統治神話，一方面卻鼓勵「獨立思考」，在不同時期對不同群眾施以反覆且殘忍的對待卻突顯出「以權力競逐為目的」之治理規條，引發群眾反彈與自省。如「葉公好龍」式的民主口號淪為欺民手段，導致人民的不信任。

### 2、愚弄與醒思

學者認為文革中群眾動員如此深刻，是因為中共長期鼓吹共產主義而存在的虛偽性，與社會實際有所衝突，而文革中暴露上層權力鬥爭的殘酷性，與其矛盾政策致使群眾對領導階層的不信任日益擴大。如一九六六年春夏季，領導階層還支持反映血統論的老紅衛兵隊伍，秋冬季便將之拋棄。老紅衛兵是批判修正主義教育路線而起，持血統派，一九六六年六月北大附中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攻擊牛鬼蛇神。而造反派紅衛兵是靠「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衝擊領導幹部起家，以「平反」、「平等」為標誌，直接衝擊黨政軍領導體系。一九六六夏季老紅衛兵當道，然而幾個月之後毛澤東為了鬥爭劉少奇，於是將文革之箭指向黨領導階級，造成文革初期的指標團體老紅衛兵在秋冬遺棄，新的造反派紅衛兵代之崛起，老紅衛兵從文革派變成懷疑派、保守派、逍遙派，命運從「小太陽」淪為「作為壞事的小傢伙」。

### 3、來自正統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檢視

研究文革，批評文革，正統馬列主義可揭露毛澤東及其追隨著政治信條的矛盾，如激進造反派組織「省無聯」中的楊曦光（文革後改回乳名楊小凱）在〈中國向何處去〉（1968）一文中，認為在中國共產黨的統治的十七年當中，百分之九十的高幹已經形成獨特的階級，即「紅色資本家階級」，這個腐朽、阻礙歷史進程的「紅色資本家階級」必須被推翻，人民必須徹底砸爛舊的國家機器。<sup>29</sup>伊林·滌西在〈給林彪同志的一封信〉（1966）一文中，認為毛澤東思想不比正統馬列的地位高，更認為要認識毛澤東思想，就必須深刻了解正統馬列主義。而李一哲認為，林彪創造毛澤東崇拜是為一種封建性質的社會法西斯專政，是為進行中國式的造神運動，他在〈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和法制〉（1974）一文中，以馬克思對法國大革命的評論批評此一造神運動。<sup>30</sup>

### （三）紅太陽式崇拜

作為國家領導者、文革的發動人，文革時期、後文革時期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成為不可避免的議題。傳統以狂熱的偶像崇拜作為對文革中群眾對毛澤東的理解，有三個假定：

- 1、革命的領導者的有明確的目標與行動綱領；
- 2、發動者有一種超凡的魔力能夠操控運動本身；
- 3、群眾能充分理解領袖意圖並完整地付諸實施。

王毅（1995）〈「萬物生長靠太陽」與原始崇拜〉與周群、姚欣榮（1993）〈新舊毛澤東的崇拜〉把對毛澤東的崇拜類比為部落社會中原始崇拜，認為文革中的「紅太陽」崇拜，很大程度與與解救個人苦痛結合。<sup>31</sup>以祈母式的宗教情結創造統治的神話圖騰，甚至認為新秩序將超越中國，照亮世界。舊的偶像崇拜出現在文革當中，毛澤東創造

---

<sup>29</sup> 此為文革專家宋永毅先生界定之文革中的「新思潮」之二：「徹底砸爛舊的國家機器」。文革中的「新思潮」為一九六七年春夏之際興起的激進極左思想，因反對文革「血統論」之階級壓迫而生。楊曦光身為右傾家庭之子，舉家歷經一九五九年的反右運動，在文革中從而採取反壓迫、反剝削、反統治之激烈造反運動。

<sup>30</sup> 李一哲為筆名，由三位學生聯合起草：「李」正天（廣州美術學院油畫系學生）、陳「一」陽（廣州十七中高中學生，發表大字報時已下鄉務農）、王希「哲」（廣州十七中高中生，發表大字報時已下廠當工人）。《關於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發表於1974年，於1977年由漆豪校註出版。

<sup>31</sup> 三人關於偶像崇拜起源的探討，分別為王毅，〈「萬物生長靠紅太陽」與原始崇拜〉，《二十一世紀雙月刊》，期31，頁125-132；周群、姚欣榮，1993，〈新舊毛澤東崇拜〉，《二十一世紀雙月刊》，期20，頁37-43。

「榮顯化」(doxa) 秩序，建立思想體系和認知圖騰的客觀性、不正自明性，使客觀秩序（父子關係）和主體原則（毛澤東政體）之間達到完美的一致，毛澤東代表著父親形象，他與臣民的關係是父子關係，成為是全體人民溫暖的紅太陽。

王紹光（2004）對此種過於著重領導者的研究有所批判，而認為在文革中，對毛澤東的崇拜傾向是出自個人或是群體階級的「自利與理性」，本質上出自階級決定的利益追求。<sup>32</sup>因此，群眾信仰的是自身認知的毛澤東，而非真實的毛澤東。群眾並進一步將自我利益訴諸在對毛澤東思想的解讀，及其展開的行動上，將利益之爭披上道德、理念之爭的外衣，並用官方的意識形態（如「繼續革命」、「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捍衛紅色江山」）來保護自己的利益，形成一場理性的瘋狂持久戰。

#### (四)文革暴力

文革暴力最重要的特點就是，在「社會結構暴力」依然得到保存、「文化暴力」的辯護之下，「直接暴力」迅速成為社會顯性暴力，<sup>33</sup>這亦是本文六位文革親歷者與筆者最核心的關切——文革中一切暴力行為一致使上百萬生命葬生，無數民眾遭批鬥、毆打、監禁、被迫自戕的難赦之罪。質言之，貫穿這紅色十年的，是一連串暴戾殘酷的清洗與殺戮，暴力，是唯一自始至終的最高旨令。在這條紅色暴力曲線之上，一九六六年與一九六八年形成駭人的雙高峰。<sup>34</sup>前者來自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的《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以降，席捲而來的紅衛兵運動，亦稱紅色恐怖；後者則是發生在一九六八年——由各地革命委員會（以下簡稱革委會）指導運動，「工宣隊」（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軍宣隊」（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各機關學校，群眾運動遭到徹底的揚棄之後，由國家機器嚴密控制文革而生的暴力高峰。

除了兩個死亡高峰期的研究之外，宋永毅（2002）整理之文革七大慘案之時間、

<sup>32</sup> 可參見王紹光，2004，《理性與瘋狂——文化大革命中的群眾》，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頁 13。

<sup>33</sup> 社會結構暴力是透過現代社會政治、經濟等體制作用的間接暴力；直接暴力是透過直接手段進行壓迫；而文化暴力係作為支持另外兩種暴力存在的意識形態支柱，作為合理化兩暴力的正當性盔甲。文革中顯見的橫行是直接暴力，但不可忽視其與社會結構暴力、文化暴力同時存續的事實。有關文革中暴力的三種形式，受國際學術界公認為「和平學之父」的 Johan Galtung（1990）有詳細的闡述。

<sup>34</sup> 關於文革暴力的兩個高峰的討論，可參見宋永毅，2002，〈文革中的暴力與大屠殺〉，《當代中國研究》，期 3，頁 146；王友琴，2004，《文革受難者——關於迫害、監禁與殺戮的尋訪實錄》，香港：開放雜誌社；王友琴，2006，〈文革之罪正在被淡化〉，《開放雜誌》，頁 41。

死亡人數如下：<sup>35</sup>

- 1、大興縣慘案：一九六六年，三百二十五人；
- 2、青海二二三事件：一九六七年，一百六十九人；
- 3、內人黨大血案：官方數字一萬二百二十二，民間數字超過五萬人；
- 4、道縣大屠殺：一九六七年，九千零九十三人；
- 5、賓陽慘案：一九六八年，三千八百八十三人；
- 6、廣西四二二慘案：一九六八年，近十萬人；
- 7、沙甸事件：超過一千人。

貫穿於七大慘案與兩個死亡高峰期之元兇為國家機器的執行者：公安系統、軍區、革委會、武部、解放軍。此等屠殺，等同於國家對公民的直接殺戮。誠然，文革當中群眾運動傾軋不止，無論是一九六六年第一個死亡高峰或是其後一九六七、一九六八年間殘酷野蠻的造反派間武鬥，但更應當指出的是，文革中若有暴民政治，絕稱得上是服膺於毛澤東的最高指導原則；國家的縱容，是文革暴力之火得以遍地燎原的主因。<sup>36</sup>

#### 四、文革記憶

追本溯因，文革回憶錄是當事人對記憶「重建」(reconstructive)的呈現，為一種「自傳性記憶」(autobiographical memory)。<sup>37</sup>同時文革回憶錄也是「閃光燈記憶」(flashbulb memory)的集結，象徵著親歷者曝露在文革暴力與恐懼時，極為深刻難忘的感受，這經驗直接影響了親歷者的文革回憶，使回憶錄呈現了歷歷在目的記憶片段。在大眾傳播媒體高度全球化的當代，文革記憶的產出直接關乎論述的公共性，透過世人的傳達才得以傳達與保存，使得當代的文革記憶同時由親歷者經歷的「真實歷史」及傳媒所傳遞的「人為歷史」構成。<sup>38</sup>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親歷者經歷的真實歷史，

<sup>35</sup> 宋永毅主編，2002，《文革大屠殺》，香港：開放雜誌社，頁 266-267。

<sup>36</sup> 龔小夏在其 blog 中，曾深切探討文革中派迫害性集體暴力的起源，結論為威權的縱容與參與者意願的結合，參見龔小夏，2007，〈迫害性集體行動的邏輯〉，取自 <http://gongxiaoxia.qzone.qq.com>。龔小夏為哈佛大學社會學博士，美國國際勞工團結中心資深中國問題專家、自由亞洲電台粵語部主任，亦是當代著名文革研究學者。

<sup>37</sup> Martin Conway 等人 (1992) 認為「自傳式記憶是對個人生活事件的記憶」，跟個人生活的重大目標、強烈情緒，以及認知意義有關。

<sup>38</sup> 徐賁，2007b〈全球傳媒時代的文革記憶：解讀三種文革記憶〉，《文化大革命：歷史真相與集體記憶》

回憶錄中仍不免有著記憶的「重建」或「建構」(constructive)的意涵，兩種可能並行不悖，回憶錄中也存在著作者動機性遺忘(motivated forgetting)的可能，這些都是構成文革記憶的一部份。

就內容而言，徐賁將文革記憶分為「實錄記憶」與「非實錄記憶」兩者，兩者之別等同於「嚴肅記憶」和「通俗記憶」的區分，前者重視歷史的當下性與記憶的真實無誤性，如文革研究，後者則散見於文藝作品、文物收藏等相較非正式的作品之中，如文革回憶錄。值得注意的是，不管如何區分，兩者都有著本質上的雷同：對歷史記憶的銘刻再現，因而議題多有重複，僅是寫作方式與議題深度有別。對文革記憶的關懷，是文革研究與文革回憶錄的最大公約數，而文革回憶錄更能規避中國官方對嚴肅記憶的扼殺，利用相對通俗的形式維繫了一代記憶，展現敘事主體的回歸的意義，直接傳達親歷者身份意識上的價值取向。

## 第五節 研究途徑與研究限制

本論文目標，在於呈現六位文革回憶書寫者身份脈落與知識景觀間相互構成之關係，透過三種書寫策略之分類框架，從而觀察西方社會科學對中國書寫者在知識形成過程中的影響，以及個人身份策略上的選擇意涵。爲了同時呈現書寫者之知識與身份相互構成的關係，以及書寫者始終不可避免地受外在結構之影響，甚而產生知識轉移的現象，故採黃俊傑、蔡明田教授(1997)之「外在研究法」(external approach)與「內在研究法」(internal approach)。其中外在研究法將研究者視為歷史的一部分，是故假定研究者之論述將緊扣歷史的「脈絡化」(contextualization)條件，探討思想家與特定的歷史情境互動下，所產出之論述的時代性、脈絡性。而內在研究法著重研究者思想體系之周延性，假定思想或概念的自主性，而進行的一種「單位概念」(unit-idea)。<sup>39</sup>運用外在研究法，將探求書寫者在不同的時空脈落下所產出之文革視野，以及在書寫者的知識論述中，找到思想與政經環境的聯繫，更期在研究者的文革

---

(下)，香港：田園出版社，頁916。

<sup>39</sup> 黃俊傑、蔡明田，1997，〈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試論〉，《人文學報》，期16，頁6。



回憶中，找到與其所處脈絡環境與身分意識的軌跡，因此有利於解釋研究者身分意識的選擇與其相應之文革論述。然而，在歷史變遷的過程當中，何以同屬一政治團體之個體可能會產生相異之論述，這是外在研究法所不能處理的問題。要回答這個問題，還必須進一步地將論述背景視為一彈性的框架，研究者之文革學論述會受到政治、經濟狀態的影響，也會受制國家、社會既存的體系框架，同時也會受到其生命歷程中的流轉歷程的牽引，而導致相同時空條件中的文革書寫者在有著迥異的論述與關注，反之，文革視野相似之書寫者，亦可能來自不同之體系環境，或是出自不同之身份論述。使用內在研究法，能將視角緊扣在特定書寫者思想體系中，探討其論述中未經明言（tacit）的深層結構，更能明白特定思想體系的演進與分化，探討文革書寫此一研究體系內的單位概念，與其中各個書寫者的結構性與關聯性。在文革書寫的研究中，可以個人經歷脈絡與相應之思想觀念為體，將不同書寫者的研究旨趣、論述內涵加以歸納整理，與體系內其它知識視野進行比較分析。

據此，從個人的思想體系出發，經由內部途徑呈現張戎、徐友漁、季羨林、楊絳、巴金、楊曦光六位文革親歷者之生命歷程與知識內涵。首先，將六人之文革回憶置身於超越式（張戎、徐友漁），再現式（季羨林、楊絳），半超越式（巴金、楊曦光）之文革視野的內部體系之中，進而比對三種寫作策略。在進行此一內部研究時，參照文獻為相關傳記、文革回憶錄，佐以文學作品作為其人生哲學之補充；接著，仍循著三種寫作策略之別，與「文革角色」、「作家國籍」、「寫作身份」、「出版地區」四個外部途徑觀察個人脈絡流轉對其知識意涵的影響，檢視西方知識科學對中國文革親歷者的影響，透析鑲嵌於書寫者此一脈絡化的身份意識上而構成的文革回憶。透過內部、外部研究途徑的交叉檢視，進而瞭解即使在三個文革視野中，仍分別蘊含著變化無窮的個人歷史。

本研究途徑雖能充分觀察個人知識的脈絡化取向，但不可諱言，此六人代表的三種寫作策略無法完整投射出文革回憶的概況，僅是特定寫作樣態的呈現，筆者的寫作目的亦非拼湊出所謂真實的全貌，因而研究限制從此而生：本論文處理的並非全部階級的文革回憶，僅是特定六位有著述、出版能力、又有對比性的文革經歷者的回憶。

## 第六節 章節安排與論文架構

第一章導論，說明本論文的研究動機、研究背景、問題意識與研究目的、研究途徑與限制。第二章開始，以內部研究途徑處理「超越式」的普遍觀點下的文革回憶，第一節由張戎、徐友漁生平經歷與其思想著手，從中牽引出第二節中兩人關鍵的文革經歷，第三節深入探討此一「超越式」的普遍觀點的文革回憶表現手法為：一、「控訴」作為進行回憶的道德盔甲：鮮明的是非論斷；二、以普遍式觀點進行超越式的文革回憶：人道價值與自由色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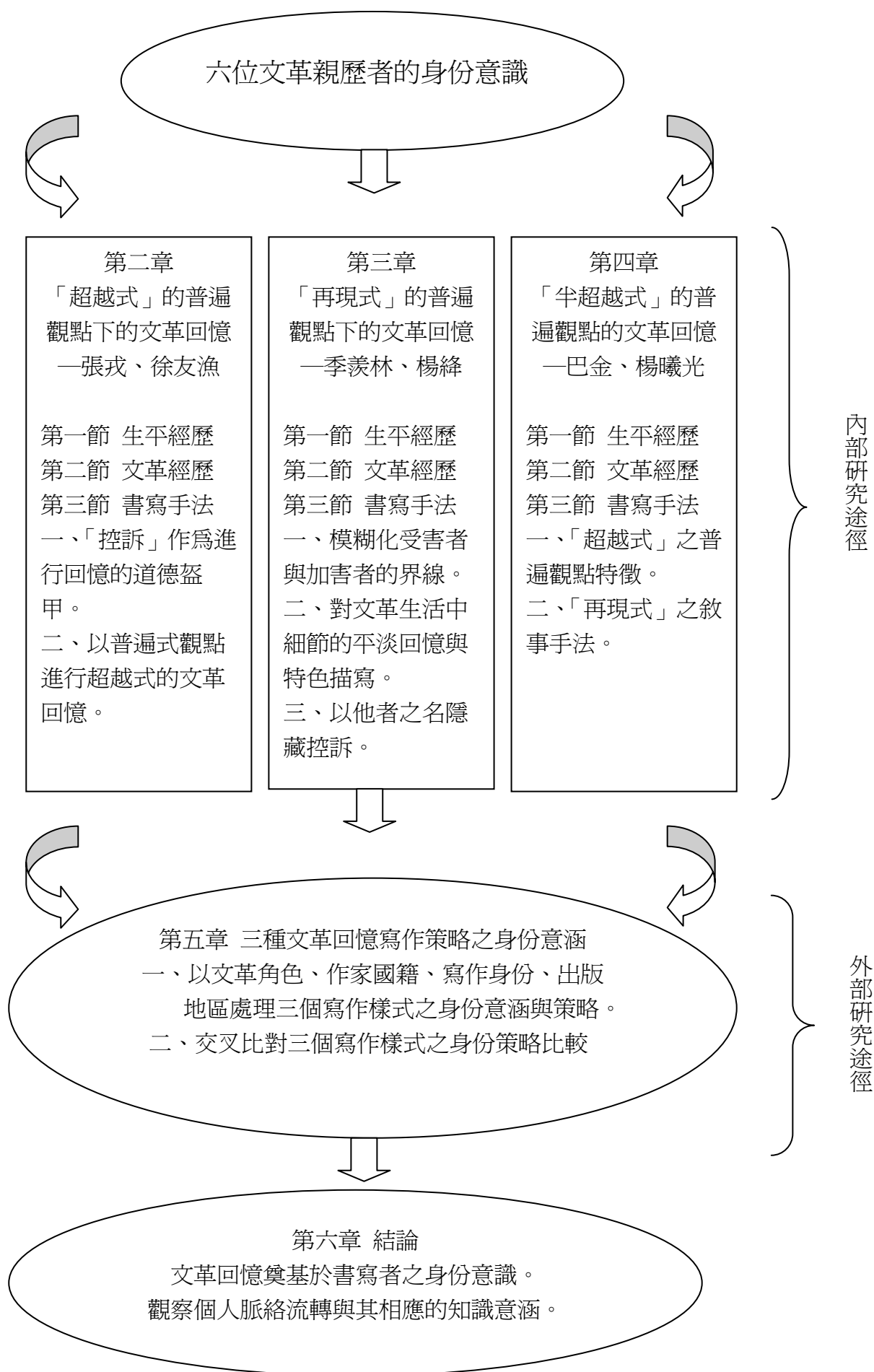
為求歸納上的整齊，第三章與第四章仿照第二章之編排進行分析。第三章處理「再現式」的文革回憶敘事，第一節由季羨林、楊絳生平經歷著手，第二節進入兩人之文革經歷，第三節綜合分析「再現式」之文革回憶敘事的表現手法：一、模糊化受害者與加害者之間的界線；二、對文革中生活細節的平淡回憶與特色描寫；三、以他者之名隱藏控訴。

第四章處理「半超越式」的普遍觀點的文革回憶，第一節說明巴金、楊曦光兩人之生平經歷，第二節進入兩人之文革歷程，本章第三節與前兩章之第三節型態稍有不同，係以個人為分析單位，而非綜合探討的方式來分析「半超越式」的普遍觀點的文革回憶表現手法：一、「超越式」之普遍觀點特徵：兩人有著不同指涉對象的人道關懷；二、「再現式」之敘事手法：藉由對他者之描寫呈現作者對文革的價值取向。

第五章運用外部研究途徑一併處理二~三章之六位書寫者，接續著「超越式」、「再現式」、「半超越式」三種寫作策略框架，從「文革角色」、「作家國籍」、「寫作身份」、「出版地區」等四個向度，分別進行身份意涵上的詮釋。第一節為「超越式」論述之身份意涵與身份策略，第二節為「再現式」敘事之身份意涵身份策略，最後進行「再現式」與「超越式」寫作樣式之身份策略較衡。第三節為「半超越式」寫作之身份意涵與身份策略，最後進行「半超越式」與「超越式」及「再現式」的交互審視。

第六章結論承接第五章而來，文革回憶奠基於書寫者之身份意識，從內、外部研究途徑觀察個人脈絡流轉與其相應的知識意涵，並回應西方知識科學對中國文革親歷

者之知識脈絡影響，及其中與個人身份內涵取向微妙的牽引。承上，本論文架構為：



## 第二章 「超越式」普遍觀點的文革回憶——

### 張戎、徐友漁

#### 第一節 張戎、徐友漁之生平記事與其思想

##### 一、張戎

（一）文革之前：享盡特權的高幹子弟，立志成為效忠毛主席的好孩子（一九五二年三月～一九六六年九月）

張戎，一九五二年三月二十五日生於四川瀘州市，原名二鴻，是為家中第二隻鴻雁之意。張戎出生時，其父甫升四川省宜賓地區專員，是僅次於黨委第一書記的第二號人物，其母亦於一九五一年成為正式的共產黨黨員，並在一九五三年春升為宜賓市宣傳部部長。同年張戎舉家從宜賓遷到成都，父親任省文教辦公室副主任，一九五四年升為四川省委宣傳部副部長，並安排母親任東城區宣傳部部長，工作是四處訪查民意並宣傳「統購統銷」的計畫式經濟方式。

一九五五年七月，張戎三歲時，母親與東城區的職工及幹部接到通知，開始了黨內「內部肅反」的政治運動，為了肅清暗藏在革命隊伍內部的反革命份子，每人都被迫徹底檢查，接受「禁閉令」。張戎及其姐弟分別被送到不同的托兒所，直到一年後，才由張戎的佬佬前往成都看料他們，一家才有重聚的契機，然而，此時共產黨對她母親的徵查尚未結束。重拾的家庭生活是異常珍貴但依舊冷酷，只因共產黨員每一分鐘都屬於革命，必須深埋革命之外的情感，張戎母親就曾因表現對子女的關愛而被批評「家庭觀念很重」，後來她才慣以用繁冗的工作取代對子女的陪伴。一九五八年，六歲的張戎憑藉幹部子弟的身份進入全省最好的實驗小學，時值全中國陷入大躍進的瘋狂氛圍中，在每天往返家與學校的途中，她總緊盯著每一吋路面，所有能成就大躍進的廢棄鐵物都宛若珍寶。

一九六四年，張戎進入四川的重點中學「成都四中」，當時「家庭出身好」的孩子有著入學優先權，入學考試成績則是其次。中學後的張戎開始了英語學習，在「革

命化」、「戰鬥化」的教育下，她將名字從「二鴻」改為戰鬥意味濃厚的「戎」。爲了貫徹解放軍精神，中學生每週有兩小時的體育訓練，舉凡短跑、游泳、跳高、平衡木、體操、擲鉛球、（模擬）擲手榴彈都是訓練項目。由於張戎擲手榴彈的成績總不甚理想，因而常遭同伴質疑其「對美帝戰鬥的決心」，壘罩在政治掛帥的自我批判中。唯恐無法成爲毛主席的好孩子，應當也是早期張戎的最大擔憂。一九六六年九月，中學三年級的張戎始捲入文革之中。

## （二）文革之後：啓蒙的開始，鴻雁得以展翅高飛（一九七三年迄今）

一九六六年六月，文革之火蔓延於校園，正規教育全面中斷，直至一九七三年夏天才開始恢復大學筆試招生。雖然揭示平等的筆試入學考試制度逐漸復甦，但是「純正的血統」仍是舉足輕重的加分條件。張戎考取高分成績後，憑藉著母親向四川招生委員會的遊說，當年十月便進入四川大學外語系，能夠如此萬般幸運的必要條件是，當年四川招生委員會大多數當權者是她父親的老同事。初爲大學新鮮人的張戎，生命看似逐漸開了一扇自由大門，但此時政治力的阻礙卻無不橫亙於學習之中。進入四川大學外語系之後，她學習的第一句句子是”Long Live Chairman Mao！”（毛主席萬歲），但無人膽敢在語法上分析任何錯誤。這是一個充滿矛盾的漸變時代：雖然仇外主義減緩，外國人儼然是「中國人的朋友」，但任何交流都走在危險的鋼索之上。歷經文革的壓抑與整肅，張戎已無法抑制對西方的好奇與憧憬，危險的真實比安全的謊言更來的吸引。她發現自己天生傾心的元素：禮節、尊嚴...以及「難以置信的自由」是常理，而非罪惡。大學圖書館提供了豐富知識系譜的條件，滿足她對西方生活的好奇，更讓她對書中的古典民主、文藝復興中的人文主義、啓蒙運動的懷疑主義大爲傾心，甚至將《獨立宣言》一字不漏的背了下來。一九七四年，她第一次意識到文革暴力的根源直指爲最高領袖。一九七五年十月，張戎與同學被學校派往湛江港市與外國海員練習英語，交談過程的細項有嚴格的規定，不得單獨交談、要求儀容端莊矜持、必須隱藏自己真實身份，事後還必須做詳細的報告，在親身接觸之後，她愈是發覺到西方文化中開放、自由的可貴。

一九七七年，張戎大學畢業，先是留在系上擔任助教，但是壓抑、封閉的生活已

無法箝制她嚮往自由的心願。一九七八年，張戎得到系上唯一的留英名額——憑藉著全國統一考試最高分的成績以及系上教授在口試時的暗中協助，成為當時四川省九千萬人中首位到英國留學之人。自此，禁錮的鴻雁終於得以展翅而飛。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二年，張戎在英國約克大學專攻語言學，一九八五年取得讀博士學位，成為中國一九四九年後第一位在英國取得博士學位者。目前是英國籍華裔作家，定居倫敦。

張戎父母皆任共產黨高層幹部，如此與當權一致的家庭背景應該利於子女發展——但這僅是在尋常的政治境況之下。在法規制度渾然失序的文革漩渦當中，家庭竟成子女拋不開的包袱，支配早期張戎命運的，正是這種福禍相依的共產黨高幹家庭背景。直到七〇年代後期，她才擁有追求自身幸福的能力，這樣的她更急於讓自身的幸運也擴及到舊中國：「我明白我很幸運，儘管我的家庭遭受了種種巨大的不幸，但畢竟有優越的條件。現在看來中國正在變得更開放與公正，我焦急地希望變化得更快，讓全國的人都一樣幸運。」<sup>40</sup>

## 二、徐友漁

### （一）中學之前：父親為生命中無法磨滅的陰影（一九四七年三月～一九六三年九月）

徐友漁，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七日生於四川成都市。對早年的徐友漁而言，經歷不凡的父親宛若一座巖峻陡峭的山脈，貫穿在他的童年、少年時期之中，之後更是影響了他在文革當中的角色選擇。徐友漁之父在一九二三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一九二五年留學於法國，就讀於巴黎大學法蘭西文學院，結識了周恩來等人，一九二七年被派遣至莫斯科中山大學，一九三〇年奉派回國，工作於上海黨中央機關，又與劉少奇關係密切。其父任職於黨中央組織部和宣傳部時，中共四川省地下黨組織遭到國民黨的攻擊，因而被捕入獄，為了保全生命、重獲自由，他只得先登報聲明脫離共產黨，待出獄後再「繼續革命」，然而，這次經歷卻直接造成徐友漁生命中的劇變。

徐友漁甫上小學，父親便開始教導他外語（俄語）及古文，課業優異的他形容自

---

<sup>40</sup> 張戎，1991，《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以下簡稱《鴻》），台北：中華，頁 425。

己是在「迎風招展的紅旗之下長大」，儼然是學校的風雲人物。其父雖以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自居，但是曾退出共產黨的汙點卻在五〇年代後期發酵，他後半生最大的心願，便是期盼黨對此事予以諒解，然而事與願違，直至生命終了他仍被視為黨內的異己份子，在尖銳的政治條件之下，家庭亦無法為他父親提供足夠的寬慰與體貼，令他孤獨地被整個世界拋棄，辭世時僅六十歲。徐友漁在若干年後才意識到自己應對父親的經歷多些理解與同情，只恐為時已晚。其父辭世半年後，其母也相繼病逝，失其怙恃的少年徐友漁，無可避免地正面迎向了安身立命的問題，而對自身歸屬感急迫的需求，也影響了其後在文革中的角色選擇。

（二）中學至文革爆發初始：「人道主義與共產主義」同為安身立命的選擇（一九六三九月～一九六六年五月）

徐友漁於一九六三年秋季進入成都市一中，此時他才初次體會到自己與現實生活的巨大衝突，起因自是來自父親那段不見容於現實政治的經歷。中學以前作為同儕表帥的徐友漁頓時失去學習重心，「上高中好像跨過了一道分界線，你不過問政治，政治也要來過問你。」<sup>41</sup>當時熱衷於閱讀西方人道思想讀本的他，更是深感自己的價值體系與現實情勢間巨大的矛盾。「我的世界觀的基調產生於我受大量西方古典名著的薰陶，這種情調為革命的時代所不容。」<sup>42</sup>少年時期徐友漁的眼中，外國文學作品中充滿對人性的深刻洞察，對虛偽的無情鞭撻，對愛情的細膩動人的描寫，在在能寬慰幾乎被生存實際遺棄的他。此時對他影響最大的三本名著是托爾斯泰（Leo Tolstoy, 1828-1910）的《復活》、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d, 1866-1944）的《約翰·克里斯朵夫》、普契尼（Ethel Lilian Voynich, 1864-1960）的《牛虻》。這三部作品中對道德追求、人性溫暖、人道主義的著墨令他著迷不已，他尤其認為《牛虻》的主角成長於壓迫之中，卻能保持內心的虔誠與理想，更勇於捨身投入熱血沸騰的革命當中，進而蛻變為革命梟雄，這般與己身歷史的斷裂，如此壯烈式的揮別，令他深感共鳴。

另一方面，他亦自認熱愛黨、熱愛社會主義、熱愛學校的集體環境，顯然，虔敬的人道主義理想與所處的共產主義實境都是心之所願，然而政治現實卻不容許此種不

<sup>41</sup> 徐友漁，1999b，《驀然回省》，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頁23。

<sup>42</sup> 徐友漁，《驀然回省》，頁24。



協調的共存。終於，他服膺了所處的政治環境，在家庭情感與自我認同中做了取捨，十八歲生日前夕，他選擇在「革命化的道路」上勇往直前，選擇清理家庭對自己的「壞影響」。他說，這並非是出自考量攸關個人前途的決定，而是經過縝密思考過後，追求客觀真理的具體動作，出自於對歷史必然趨勢的理性判斷。

### （三）文革之後：破繭而出（一九七八年迄今）

到了一九七七年七月，鄧小平在十屆三中全會上再一次恢復職位，他復出後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召開科學和教育座談會。徐友漁此時雖已屆而立之年，但仍有著一個未竟的心願：繼續教育，進入大學。面對文革時期種種的倒行逆施，他逐漸認為，這一代人必須抗拒愚昧，首要之務便是將自己從蒙昧和野蠻中拯救出來。該年底，中斷十一年的大學入學考試全面復甦，信心滿滿的他懷抱著對新生命的熱情報考，然而卻意外落榜，令人難堪的是，儘管國家號稱已進入了「新時期」，政治審查仍在關鍵時刻對他施以殘暴的一擊。

一九七八年三月，徐友漁意外地接到四川師範學院數學系的錄取通知，此次錄取端賴鄧小平發布的「補榜」的動作。睽違十二年，終於再次接受正規教育的徐友漁終於邁向新生命。大學就讀尚未過半，徐友漁就因表現優異而讓學校首開先例，得以提早畢業並參加研究生入學考試，於一九七九年秋季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八〇年代初，百業漸興，學界的思想發展更是快速復甦，一九八六年，他與幾位鑽研西方哲學的研究生共組了「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專攻存在主義、現象學、解釋學和分析哲學。徐友漁只來得及參加編委會前期的工作，就於九月進入英國牛津大學攻讀當代西方語言哲學，直到一九八八年夏季歸國。歸國之後，又陸續成為英國牛津大學（Oxford University）、布裏斯托爾大學（Bristol University）、雷丁大學（Reading University），美國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臺灣中央研究院、香港中文大學等院校訪問學者，二〇〇一年～二〇〇二年為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Stockholm University）客座教授。

徐友漁自一九八二年自中國社科院哲學所畢業後，至今皆擔任中國社科院哲學研究所之研究員，著有：《「哥白尼式」的革命》、《羅素》、《語言與哲學》（合著）、《精

神生成語言》、《告別二〇世紀》、《形形色色的造反》、《驀然回首》、《直面歷史》等，編有《一九六六：我們那一代的回憶》等書。

## 第二節 文化大革命中的張戎與徐友漁

### 一、張戎

#### （一）成為光榮的紅衛兵，心情卻無法同榮（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一月）

文革序曲在一九六五年底響起，成都四中於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六日成立了紅衛兵，出身良好的張戎直接加入這次「老紅衛兵」隊伍，<sup>43</sup>在當時彰示「血統論」：「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對聯指引下，僅有屬於紅五類的高幹子弟才得以成為「毛主席的孩子們」。為了忠實貫徹革命精神，張戎剪去長髮，在褲子上打上補釘，除去了所有「資產階級腐朽的生活方式」。當時生活中所有指向、影射封建傳統、美帝主義與資產階級的元素都遭到毀滅，張戎雖有疑惑，對暴力更是不敢領教，但卻也未表質疑：「一九六六年夏天，我學會了遇事不問為什麼，許多中國人早就這樣做了」。<sup>44</sup>

在披上紅衛兵的戰袍後，張戎的心並沒有變得同步「革命」。文革初期，她雖然因為優越的血統而成了同儕稱羨的紅衛兵，卻也因福而禍地捲入無數鬥爭，目睹無數殘忍的暴力行為。惻隱之心總驅使她一再逃離現場，而非加入實施暴力的行列，如此消極舉動自是惹人非議，但因其父為高級幹部，因此沒有人膽敢對她採取任何「革命行動」。批鬥大會中，當她看到十幾位老師被押上講台，他們低著頭，手被扭成「噴氣式」，<sup>45</sup>「那種恐怖氣氛使我在盛夏的午後也感到渾身冰涼。」<sup>46</sup>為了逃避心理上日益加重的恐懼，她甚至將「紅衛兵串聯接待站」視為避風港，以逃避暴力鬥爭、恣意

<sup>43</sup> 按著名文革研究者印紅標先生之分類，「老紅衛兵」指的是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作出進行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後，一批由紅五類（工人、貧下中農、革命幹部、革命軍人、革命烈士）子女組成的階級隊伍。他們為捍衛紅色江山而起，批判修正主義路線，打擊「牛鬼蛇神」與「黑五類」，並首先向教育界、也就是學校發難。這批以鮮明的血統論為胎記的中學生，特別是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澤東檢閱之前成立的紅衛兵，慣稱為「老紅衛兵」。

<sup>44</sup> 張戎，《鴻》，頁 225。

<sup>45</sup> 「噴氣式」為文革時期在批鬥會上特有的虐待方法，受批者之頭、頸、背向前彎曲直至九十度，甚而令其同時將兩隻胳膊向後上方或兩側伸直。

<sup>46</sup> 張戎，《鴻》，頁 229。

破壞等革命任務。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張戎與其他紅衛兵在北京天安門廣場接受毛主席的檢閱，但她始料未及的是，當時四川家中已籠罩在無法抑止的政治風暴當中。

（二）父母從高貴的「紅五類」淪為萬惡的「走資派」（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一九六九年一月）

一九六六年十月，中共中央召開工作會議，批判了以劉少奇、鄧小平為首的一批各級的領導人在執行的一條鎮壓群眾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發布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兩條路線》報告，闡明毛主席發動這場文化大革命本意是整肅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但劉、鄧兩人卻制訂了一條「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非但沒有整肅走資派，反而鎮壓了人民。因而群眾應起身批判這些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領導幹部。自此，革命之箭指向黨內的老革命幹部，絕大多數的領導被譴責為「反毛主席革命路線」，或執行資本主義的共產黨官員：走資派。文革前貴為幹部的張戎父母也因此被打為走資派，執行這項任務的人是毛澤東的新戰士：「造反派紅衛兵」。受批初始，張戎父母仍竭力合理化自身的遭遇：「我覺得我們這批幹部挨批、挨鬥沒什麼了不起，就算狠了一點，讓我們威風掃地，又有什麼關係呢？」<sup>47</sup>

但在一九六七年一月風暴發生後，<sup>48</sup>這波戰火越演越烈，昔日的幹部領導成了今日的頭號戰犯，對老幹部的批判讓造反派紅衛兵釋放所有對幹部的不滿，不管是出於忌妒之心抑或是舊怨難消，現在全有了正當的管道得以宣洩，張戎父母陷入更大的暴力恐懼當中。在殘忍的批鬥之後，張戎母親罹患子宮出血症，六年後才治好；而視書如命的父親亦被迫焚毀自己的藏書，「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看見他落淚，他的哭聲好像不能痛痛快快遞放出來」<sup>49</sup>。張戎倔強的父親不斷挨批，卻仍在會上出言反駁，此等剛烈的個性只為一家帶來更大的災禍。一九六七年三月，他貿然上書，以一介黨員的

<sup>47</sup> 張戎，《鴻》，頁 259。

<sup>48</sup> 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上海造反派奪取了上海市委的黨政大權，刮起了所謂「一月革命」的風暴，這是文革中相當重要的一個環節，是毛澤東將革命矛頭正式指向黨內高層之始，劉少奇、鄧小平、陶鑄等人都被正式點名批判，並被關押。在群眾運動中，也意味著造反派對老幹部（走資派）鬥爭的一大勝利。繼上海之後，山西、青島、貴州、黑龍江等省市的造反派也相繼起來奪權，建立所謂軍隊、幹部和造反派群眾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奪權之風刮遍全國，使全國陷入更大的動盪混亂中。但這波一月革命風暴隨即在二月遭到鎮壓，稱「二月鎮反」或「二月逆流」。

<sup>49</sup> 張戎，《鴻》，頁 263。

身份請求毛澤東停止文化大革命。信件寄出第三天，他便遭到逮捕，理由是「炮打毛主席、文化大革命的現行反革命份子」。在被捕前他對張戎母親說：「不要和黨記仇，無論錯誤有多嚴重，相信將來黨會改錯。和我離婚，把我們的孩子帶大，不要告訴他們」。<sup>50</sup>隨即被捕入獄。爲了解救丈夫，張戎母親混入造反派當中，一同前往北京晉見周恩來總理，終於得到周恩來的字條批示，讓丈夫得到釋放。經歷巨大的身心重創之後，張戎父親的精神狀況已漸失常，無奈的是造反派以他「裝瘋」爲名繼續對他施行殘忍的暴力，造反派當中不乏他的老同事或下屬，更讓張戎深感：「是什麼把人變成了魔鬼？爲什麼人們那樣盲目地殘忍？就是在這段期間，我對毛澤東的忠誠開始動搖了。」<sup>51</sup>直至一九六八年底，張戎父親不斷地經歷拘留、釋放、挨批、醫病，其母亦在一九六七年底到一九六九年十月遭到關押，家中更是不斷被抄來砸去，文革儼然成爲張戎一家前所未有的災禍，和多數中國人類同。

### （三）下鄉改造：農民、赤腳醫生與電工（一九六九年一月～一九七二年四月）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毛澤東在《人民日報》發布了新的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四川學生因而在一九六九年初一下鄉改造。張戎舉家如是，每個人皆流離所在，父母分別下放到四川的米易幹校與西昌幹校，張戎則是下放到四川德陽縣的德陽新公社，自此展開下鄉勞動生活。一九七一年初，張戎在沒有培訓基礎的情況下，僅讀過一本官方出版的《赤腳醫生手冊》變成了赤腳醫生，<sup>52</sup>工作僅是幫忙其他兩名醫生發藥、注射。一九七二年初，毛澤東開始解放幹部，城市的經濟建設逐漸復甦，張戎得以在成都東郊的工廠擔任工人，成爲城市戶口意味著能得到較穩定的糧食供應。與成爲赤腳醫生一般地荒謬，這份工作唯一的憑藉是一本《電工手冊》，因而她上工第一個月誤觸了五次電。一九七二年四月、五月，張戎父母分別前往北京就醫，兩人正式結束了爲期十三年的幹校生活，而張戎也得以在北京與家人重聚數月。學校制度逐漸復甦，張戎看見了從未敢奢望的夢

---

<sup>50</sup> 張戎，《鴻》，頁 273。

<sup>51</sup> 張戎，《鴻》，頁 283。

<sup>52</sup> 「赤腳醫生」是在毛澤東的號召下，下鄉知青接受短期且簡陋的醫療訓練後形成的獨特職業。

想：上大學。一九七三年夏，恢復大學筆試招生，張戎為所屬工廠代表應考，同年十月正式考取四川大學外語系，生命進程漸入佳境，唯獨在一九七五年四月九日下午，積勞成疾的父親心臟病發猝死，而他當時還未得到正義的平反。

## 二、徐友漁

（一）個人實踐前的狂風驟雨：佩帶毛主席像章之爭（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一月）

一九六六年底，正當血統純正的老紅衛兵大行其道之時，就讀於成都市一中高三的徐友漁卻受父親不名譽的背景所苦，滿懷激昂的革命情感卻動彈不得，只見老紅衛兵們在校內展開殘忍的鬥爭，在全國大肆進行暴力至極的「破四舊」。當時徐友漁雖能逃離皮肉之苦，但在學校中卻是處處壓抑對老紅衛兵暴力行為的不滿。他一方面痛恨老紅衛兵目無章法的破壞，另一方面又對自己無法名正言順地追隨毛主席，無法親自實踐研讀多年的的革命理論所惱，問題的核心無庸置疑地指向他的出身背景，只因他不屬於光榮的「紅五類」，因此連配戴毛主席徽章的政治權利都被剝奪。

「我好長一段時間被這件事深深苦惱…恐懼被當眾命令摘取像章的心情佔了上風，我不敢在學校戴上它，但我不甘心，決不願意承認我連帶一枚毛主席像章的權利都沒有，於是我出了校門就戴上它。這種偷偷摸摸的舉動，每一天都在提醒自己，我已經低人一等了！」<sup>53</sup>

（二）人生的光輝應在大革命的洪流中體現：成為造反派紅衛兵（一九六六十一月～一九六八年一月）

一九六六年十月過後，文革領導者發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運動，把矛頭引領向黨內走資派、資產階級司令部。文革之箭轉向共產黨內的老革命幹部，徐友漁在文革初期實踐意義上的鉗制豁然消失，生命中的價值標準與經驗事實初次得以結合起來：他當上了造反派紅衛兵。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他參加了校內的造反派「紅旗野戰兵團」（簡稱紅野），與四川成都地區新興的兩支對立造反派—川大的「八二六」，

---

<sup>53</sup> 徐友漁，《驀然回首》，頁 75。

以及除川大之外的大學生組成的「紅衛兵成都部隊」（簡稱紅成）互別苗頭，但立場較偏「紅成」，兩者同為不贊同「大破大立」的溫和派。

徐友漁主要的工作是與對立的戰團進行文攻論戰，作為一名好學的愛智者，他並不認同當時慣以聳動內容攻訐敵方的文字暴力，而認為應在行動前找尋理論依據，從根本上探求與敵對組織的價值分歧，如此才能透析運動的本質，不為人所利用，對此他的立場是堅定的，「我寧願繼續當理論家，而不願意當這種宣傳家和鼓動家。」<sup>54</sup>然而，革命蠱惑了多數人的心智，大批的造反派瘋狂漩入熱血沸騰的文攻武鬥當中，卻少有人對時局有較為深刻的看法，對此他深感灰心：「現實就是這樣令人沮喪，膚淺的東西總是大行其道，我不能老是去和對方比蠱惑煽動的本領。」<sup>55</sup>

一九六七年在中央文革小組的策動下，掀起全國性質的群眾運動，黨內直接衝擊以劉少奇為首的黨政行政體系，黨外則癱瘓各機關，機關中的造反派進行「全面奪權」的任務。一九六七年二月上旬，四川地區造反派在成都軍區外集結，以抗議軍區鎮壓軍內的造反派，當時川大「八二六」與「成都工人造反兵團」集結在軍區外靜坐抗議，大力聲援軍中的造反派戰友，要求軍區領導釋放內部的造反派，此舉在二月中旬隨即遭到中央軍委會授權的武力鎮壓。暴力鎮壓揭示了權力關係，成都陷入風聲鶴唳的詭譎氣氛，儘管徐友漁在立場上不贊同這些參與靜坐的造反派，但對他們的遭遇抱以同情：「我明確認識到，我與『八二六』派政見不同，我始終反對把矛頭指向軍區，但是，這種規模的鎮壓，決然是不對的。」<sup>56</sup>

一九六七年五月六日，徐友漁自運動以來第二次目睹大型的武鬥事件，稱「五六事件」，起因與上述事件本質上雷同，同為造反派與保守派間的衝突。當時國防工廠內的造反派受到壓制而尋求外援，廠外的造反派因而群起圍剿保守派，進攻者無視於守方真槍實彈的武裝，紛紛赤手空拳奮力前進，最後佔領了主樓，徐友漁如此描述：

「這時我見到了最悲壯無畏的場面。進攻者衝到主樓頂層平台上，揮舞大旗以示勝利…但從旁邊一樓上傳來槍聲…射手彈無虛發，揮舞大旗者捂胸

---

<sup>54</sup> 徐友漁，《驀然回首》，頁 117。

<sup>55</sup> 前揭文。

<sup>56</sup> 徐友漁，《驀然回首》，頁 104。

捧腹，應聲倒地，紅旗隨之跌落，但馬上就有人撿起旗幟，繼續揮舞…這是精神上的較量，它當然不是力量上的抗衡。」<sup>57</sup>

此時足見文革中行爲者對運動投注的熱情，但諷刺的是，他們心中秉持的理想與行動的價值判準，卻非今日徐友漁心中神聖的統一律令，而必須透過當時的政治局勢來審視。

### （三）崢嶸歲月：沉潛與復出的境遇流轉（一九六八年一月～一九六八年七月）

一九六八年一月，成都市的武裝鬥爭急遽升級，惡化爲更大規模的武裝暴力，許多學校、工廠都淪爲槍林彈雨的戰場，文革演變至今，已成了全面的武鬥內戰。此時武鬥勝利的要素已不僅是參戰人數，而是取得武器的多寡與武器的先進程度。在武鬥規模擴大的同時，徐友漁卻對群眾間反覆、粗糙的鬥爭產生厭倦的情緒，尤其對其中的暴力行爲更是不敢領教。早在一九六七年，徐友漁的溫和作風就與「紅成」意見相左而有了嫌隙。<sup>58</sup>

一九六八年三月下旬，他從搬到友人家中，暫時避開武鬥的紛擾，潛心研讀，企圖在更高的層次上探求文革發生的動因與意義。約同時，卻傳來中央抨擊「紅成」打倒劉張的做法，並發布「三一五指示」強烈指責「紅成」無疑是右傾翻案的舉動，這消息猶如對「紅成」宣判了死刑，自此，組織樹倒猢猻散。爲了保護戰友們，徐友漁與友人辦了一份《三一五》戰報，作爲政治上的宣示，表明願意貫徹中央的指示，並修正組織路線。然而，如此對組織的保護與反省的做法既得不到內部大多數人的諒解，又同時遭到對立派猛追窮寇的打擊。灰心的徐友漁只得再次奔走，半年之後返校時局勢已然不同，而他不再是領導人物，因而躲過組織對此事的追究。

### （四）造反派紅衛兵的終結：文攻武鬥一場空（一九六八年七月～一九六九年一月）

一九六八年中，全國奪權風氣漸緩，爲了控制不斷擴大的武鬥群眾，毛澤東於七月二十八日接見首都紅衛兵「五大領袖」：聶元梓、蒯大富、譚厚蘭、韓愛晶和王大

<sup>57</sup> 徐友漁，《驀然回首》，頁121。

<sup>58</sup> 一九六七年五月，中央爲了解決四川問題，頒布了《中央關於處理四川問題的十條決定》，稱紅十條，其中宣布張國華、梁興初、劉結挺、張西挺爲首建立四川省革委會籌備小組。這四人的態度與措辭上似乎視「紅成」地位低於敵對陣營「八二六」，對此「紅成」深感不滿，提出「炮轟劉結挺，火燒張西挺」，以及「打倒劉張」的口號，然徐友漁認爲此舉太過激進而反對。

賓，宣布：「現在輪到你們犯錯誤了。」自此工宣隊、軍宣隊進駐各機關，中央對各地的文革運動發動一連串的指導與掃蕩，進行「全面專政」的嚴密控制，是為造反派紅衛兵的終結。工宣隊與軍宣隊在成都市一中先後掃蕩「紅成」與「八二六」，為此，徐友漁被迫進入「鬥私批修學習班」，進行無止盡的自我批判。面對學校內瀰漫的肅殺之氣，徐友漁再次出走，為時一個月的沉潛使他避過了挨批的浪頭，一次又一次猶如逃亡的奔走已經撼動他從事革命的堅定心志，「我像個逃犯似的跑掉，我到底犯了什麼錯？回顧自己在文革中做過的每一件事，我問心無愧。難道不是毛主席教導我們『革命無罪，造反有理』嗎？」<sup>59</sup>

（五）覺醒與反思：三年下鄉，七年為工（一九六九年一月～一九七八年三月）

一九六八年底，毛澤東令知青上山下鄉進行「再教育」，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五日，徐友漁被遣往四川省綿陽地區安縣，落腳於東興公社，一待就是三年。下鄉對他產生巨大的衝擊，先前在學校學習的美麗口號「新舊社會兩重天」、「貧苦農民翻身得解放」迅速的在現實環境中破滅。徐友漁常與同學們懷著驚奇的心情，交換自己所見所聞。除了固定的勞動之外，下鄉學習以村里的貧下中農為典範，讓農民引導知青領略「憶苦思甜」的道理，包括食用「憶苦飯」、進行「憶苦會」，但過程加速他透析政治愚弄的強大作用。<sup>60</sup>

下鄉一年後，青年們不堪艱苦的勞動與低劣的生活條件，紛紛尋找替代之法，徐友漁等人利用知識技術上的優勢，組織了農業科技小組，研製肥料。終於脫離了鄉間勞動，領有更高的工酬，甚至讓他得以在培養化學肥料的等待過程中，得以前往四川省圖書館進修。一九七二年初，徐友漁回到成都，但因出身欠佳只能進入工廠工作，當了七年的鍛工。一九七七年，大學入學考試全面復甦。一九七八年三月，徐友漁意外地接到四川師範學院數學系的錄取通知，終於正式告別三年下鄉、七年為工的艱苦生活，告別了文革中反覆的嶄露與沉潛，自此生命展開新的旅程。

---

<sup>59</sup> 徐友漁，《驀然回首》，頁181。

<sup>60</sup> 「憶苦飯」是指舊社會（中國國民黨統治時期）中，如豬狗食一般難以下嚥的飯菜；「憶苦會」則是讓農村內苦大仇深的老農民們回憶舊社會中，自己牛馬不如的生活。「憶苦飯」和「憶苦會」旨在令人再次經歷解放前的舊社會的苦日子，加深共產黨解放農村的英雄形象。有趣的是，幹部在會前會交代農民要講1949年前的苦痛，而不得說1962年大飢荒的遭遇。



### 第三節 「超越式」普遍觀點的文革記憶表現手法

就表現手法而言，張戎的《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與徐友漁的《驀然回首》書中，雖大幅地記敘自己的文革經歷，卻是以「超越式」的普遍觀點完成之，意即在回憶文革經歷時，不單是以純然的再現（representation）手法表達，而更以足以超越作者當時境況、超越任何時空條件的普遍式觀點作為引導，在特定的意識價值上對文革經歷做出評論，並將自身經歷投射到完整的文革時代中，以對文革進行全面式的、普遍式的論斷。

張戎、徐友漁兩人從不涉及自己的角度進行關於文革責任的分析，呈現一代青年紅衛兵回顧文革時內心掙扎的情感：在希冀忠實地呈現文革經歷時，又藉新視野作為道德起點與論述根基，此種表現手法，呈現一代紅衛兵拒絕政治愚弄的宣告，是對自己篤信的革命理想破滅的反省，亦是對文革暴力致使的無數傷害的關懷與慰藉，更是對自身少年盲目狂熱的揭疤，無異是以作為一種對過去謬誤的揮別與斷裂而完成。而超越式的普遍觀點在此處便形成一層堅毅的道德盔甲，保護作者穿透時序空間對記憶的阻隔與破壞，讓自己「再進入」那段悲苦喜樂並存的崢嶸歲月，正式抗拒文革中一切的罪惡—無論是群眾派系惡鬥、毛澤東與四人幫狂妄的興風作浪、以及不容置喙的非人道暴力行為。此種寫作手法有其深刻性，透過能超越特定價值的語意傳達，引導讀者在其回憶中形成對文革的是非論斷，將文革經歷與抽象普遍的道德論述結合，因此，此種的文革回憶記敘較一般回憶錄更帶有批判的色彩，甚至一語道破文革中一切的錯誤標的，讀者足以在回憶錄中判斷或追究十年文革對錯的責任。

所謂超越式的普遍性觀點，在本章中專指兩人行文中滿溢的「人道價值」與「自由色彩」，透過對文革殘忍的暴力撻伐及對毛澤東與四人幫政治操作的辨析，進而參透文革的本質，駛過文革的狂濤驚駭而發展出普遍性質的超越觀點，在飽經憂患後更勇於追求人性普遍的良善。以下歸納整理張戎與徐友漁在其文本中的寫作特徵：第一，「控訴」作為進行回憶的道德盔甲；第二，貫穿回憶的普遍式觀點。

## 一、「控訴」作為進行回憶的道德盔甲：鮮明的是非論斷

### （一）一代紅衛兵的革命大夢：從滿腹熱情到抑鬱難申

張戎與徐友漁，兩人在文革中先後為老紅衛兵及造反派紅衛兵，在全心投入革命時都毫不懷疑自己堅貞的革命信仰，以及對毛主席萬般虔誠的擁戴。但卻在一次又一次的政治活動中耗弱革命能量，在遭受反覆的愚弄中逐漸明辨事非，面對現實猛烈的衝撞中更不斷澄清自己的心志，才在文革巨浪中抓住一絲絲足以安身立命的仰賴。

文革爆發前夕，在一九六五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六週年的慶祝晚會上，張戎望著天上絢爛的火樹銀花，熱淚盈眶地想著：「能生活在偉大的毛澤東時代，我實在太幸運了！我不明白資本主義世界的孩子們沒有毛主席怎麼辦？」<sup>61</sup>革命爆發之初，張戎也試圖讓自更符合紅衛兵身分，「我努力壓抑自己的『個人主義』思想，因為這有違毛主席的主張。」<sup>62</sup>她也認為「思想一與毛的教導相衝突，就產生一種愧疚感。」<sup>63</sup>。然而，當她目睹了紅衛兵友人們恣意的暴力行為，看見他們對昔日同窗、師長展開無情的批鬥時，當其他革命小將要求她這個「得意門生」動手攻擊哲學老師時，她卻是倉皇而逃而不知所措。「我以前所受的教育是要對年長者有禮貌，但現在的革命好像要我們殺氣騰騰。」<sup>64</sup>當肅殺的鋒芒指向自己家庭，更讓她深感文革是「把人變成魔鬼」的恐怖活動，而逐漸明瞭自己一家只是毛澤東在權力競逐上的工具，同當時無數的家庭一般。

徐友漁也承認，文革中種種意識形態的口號，如「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或「爭奪接班人」，對涉世未深的學生有巨大的吸引力。與《牛虻》如出一轍，主角揚棄了不公義的社會，割捨了來自背景的羈絆，全心全意投入革命而宛若新生，甚至為了實現崇高的理想，而甘冒天下之大不韙，進行翻天覆地的革命。自一九六五年，他便下定決心「清理」來自家庭的遺毒，開始公開地「反省」自己的出身背景，冀求以與家庭的切割來證明自己對革命的堅定情感，「用當時流行的話來說就是：『必須脫胎換

---

<sup>61</sup> 張戎，《鴻》，頁 209。

<sup>62</sup> 張戎，《鴻》，頁 224。

<sup>63</sup> 前揭文。

<sup>64</sup> 張戎，《鴻》，頁 226。

骨，重新做人。』」<sup>65</sup>然而當他一躍成為造反派，卻深感自己在實踐過程中始終未能追求真正的革命理想：

「我在文革中為自己編織了一個夢，一個理想的革命之夢。我以為，文革是對舊世界中一切腐朽事物的掃蕩，是人類淨化自己靈魂的一次大規模努力。我的行為意義，是和這種崇高目的聯繫在一起的…但我在『文革』中幹的越多，我發覺原先的理想離去的越遠。」<sup>66</sup>

經歷文革之後，兩人發現所恃的理想禁不起現實的殘酷考驗，進而參透文革殘酷的本質，這種對革命精神從崇拜到渾然斷裂的覺醒，正是後來對文革大加撻伐的心理基礎。

## （二）毛澤東對政敵的殘酷迫害是文革形成的基礎動因

在兩人的文革回憶中，皆認為毛澤東對政敵的迫害是掀起文革巨浪的罪魁禍首，四人幫為助紂為虐的爪牙，廣大無辜的人民則先後為文革獻祭。張戎學家正如是：「一九六七年和一九六八年，毛澤東努力建立他個人的權力體系，把所有像我父母這樣的犧牲品置於一種前途未卜的狀況下和不斷的折磨中。毛澤東是不管受害人有多痛苦的，人們不過是他棋盤上的車馬炮卒子。」<sup>67</sup>

林彪事件後，她深刻體認到毛澤東對政敵殘酷的迫害程度遠超過她的想像，這也是她生命中首次領略到：毛澤東必須為文革負責。<sup>68</sup>而中學時期曾為造反派的徐友漁亦在革命夢想破裂之後，認知到文革中週而復始的殘酷鬥爭不過是中央政治迫害的副產品，「在文革中，我和其他不少人早已看到政治鬥爭中充滿了欺騙和殘忍。」<sup>69</sup>當中共中央副主席劉少奇、中共國務院總理周恩來、曾任中央文革小組組長的陳伯達、毛澤東接班人的林彪等人先後在文革中遭到不同形式的批判，而一切的罪魁禍首都指向

<sup>65</sup> 徐友漁，《驀然回省》，頁 26。

<sup>66</sup> 徐友漁，《驀然回省》，頁 171。

<sup>67</sup> 張戎，《鴻》，頁 293。

<sup>68</sup> 根據中國官方說法，一九七〇年在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與林彪對於設立國家主席的意見相左，兩人衝突日益加深，而後林彪試圖刺殺毛澤東卻事跡敗露，於 1971 年 9 月 13 日畏罪潛逃，然飛機墜毀於蒙古境內的溫都爾汗，史稱「九一三事件」或「林彪事件」。此事件在文革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直接宣告了文革的失敗和毛澤東偉大神話的破產。

<sup>69</sup> 徐友漁，《驀然回省》，頁 228。

毛澤東及其爪牙，他更認為：「這難道是一個『偉大領袖』的作為，他不是發出過『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的號召嗎？」<sup>70</sup>

### （三）毛澤東對群眾政治立場反覆的界定致使群眾的不信任

一九六六年底，毛澤東致函林彪，要求軍隊應該堅定支持革命「左」派，林彪聞風而動，各軍區因此成立了「支左辦公室」，軍隊自始正式介入地方的群眾運動。這些軍區奉命明辨、公佈地方團體中何為正統左派，將給予支持，更要偵查、揭發何為「右派」，並施以無情的取締和鎮壓。這是何等諷刺之事，在號稱破除封建思想的文革中，群眾組織的正當性竟需要此種「御賜」的手段來證明，此「定性」決定了群眾組織的消長。

一九六七年四月底，與徐友漁親近的造反派組織「紅成」被成都軍區封為「左」派組織，為成都地區唯一的左派組織，「紅成」群眾無疑得到一帖扶正旨，然而一九六八年中央又在「三一五指示」中強烈指責「紅成」打倒劉張的口號，「紅成」瞬間被「罷黜」為右傾組織，如此反覆之事在文革中屢見不鮮。對此徐友漁深感不滿：

「地方『文化大革命』運動派系林立，不同組織之間的矛盾和利益錯綜複雜，怎麼能確定誰是『左』派、誰是『右』派，支持誰、打擊誰？當時能夠認定左派的只有中央『文革』和毛澤東本人，但他們卻撒手不管，讓軍區去自行確定『左』派……他們天然地和保守派心連心，決不會支持那些反對和衝擊軍政領導的群眾組織。等他們大張旗鼓行動之後，中央又批評他支持錯了對象，鎮壓了革命群眾。真不知這只葫蘆裡裝的是什麼藥？」<sup>71</sup>

一九六七「五六事件」過後，中央聲稱要追查開槍的兇手。開槍者的下場卻隨著政治局勢的變化而有天壤之別，「當造反派掌權時，他們被逮捕法辦，判處徒刑：當造反者失勢時，他們被宣布護廠有功。」<sup>72</sup>判斷人物、事件的是非判準並非根據真理證據，而是充滿人治色彩、無法依賴其效度的政治狀態。而一九六六年年底，中共中

<sup>70</sup> 徐友漁，《驀然回首》，頁 219。

<sup>71</sup> 徐友漁，《驀然回首》，頁 102。

<sup>72</sup> 徐友漁，《驀然回首》，頁 122。

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發布《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兩條路線》報告後，黨內外當權派即刻淪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鎮壓群眾的罪魁禍首，而張戎舉家因而從堅貞的共產黨高幹家庭中落，她認為：「因為我父母是各單位的領導，所以他們成了走資派。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sup>73</sup>

由上三點對虛偽、殘忍與反覆的控訴，體現了張戎與徐友漁般當代知識份子渴求某種真實的、人道的與一致的精神，並在此精神上展現出對文革時代難以抑制的感懷，及對政治迫害、暴力行為無法消解的憤慨，他們在足以超越任何時空條件的普遍式觀點的道德基礎上，「再進入」文革經歷，並試圖做出全面性質的論斷。

## 二、以普遍式觀點進行超越式的文革回憶：人道價值與自由色彩

### （一）人道價值是文革中至高的道德判準

首先，張戎與徐友漁為先後興起的老紅衛兵與造反派紅衛兵，兩人對自身派系的暴力行為都表達了高度的厭惡、冷漠與逃避心態。在所屬的隊伍中，張戎是同儕認為「看起來不夠積極」的老紅衛兵，而徐友漁則為專門以溫和的文宣攻勢打擊對立派，兩人皆對盲目而殘酷的暴力行為敬謝不敏。

對張戎而言，毛澤東為了煽動群眾起身造反推翻黨內的當權派，在「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血統論」對聯指引下，與張戎一般出身紅五類的高幹子弟率先在一九六六年八月組成紅衛兵隊伍，卻也意外投入行使暴力的行列，對此她認為「毛澤東為了營造他想要的恐怖和混亂情勢，故放手讓這些紅衛兵無法無天地幹。實際上，誰被打或打人，對毛來說，都無關緊要。」<sup>74</sup>而她在面對其他老紅衛兵同儕進行暴力行為時，更多次不忍卒睹而採取逃避的手段，因而背負不甚積極的評語。而徐友漁自始至終對武鬥的看法皆一致，全然出自於自己對暴力行為的深惡痛絕，他直接了當地說：「我討厭武鬥。」<sup>75</sup>即使直接攸關自己的利益，他仍毫不留情地拒絕。一九六六年底始，軍部正式介入地方的群眾運動，成為揭示群眾正當性的指揮部門，也

---

<sup>73</sup> 張戎，《鴻》，頁 222。

<sup>74</sup> 張戎，《鴻》，頁 222。

<sup>75</sup> 徐友漁，《驀然回首》，頁 125。

利用群眾作為打擊異己的工具。有次軍部欲利用與徐友漁親近的「紅成」打擊另一個造反派「八二六」的據點，軍部甚至給了他們敵方陣營詳細的地圖，打擊敵對陣營的利益在前，他卻渾然不為所動，正顯露行為者逐漸對文革中反覆、矛盾的政治口號和價值判準產生懷疑，而不願依附近利而成為過河卒。對於文革受難者，徐友漁表達了超越階級的關懷：「我在窗外看他們連剪帶扯地給 O（校內語文課老師）剃頭，那剪刀的嚓嚓聲就猶如在我心上絞動…每當我迎面看見被剃了頭的師長們，我都儘早閃開或把頭偏開，我不忍直面他們，我不敢仔細打量他們。」<sup>76</sup>

除了對暴力深惡痛絕的態度之外，其次，參與紅衛兵為文革群眾運動時期重要的政治權利，更帶有公平、平等的「人道啟蒙」意涵。文革初始，命定意味濃厚的血統論無庸置疑地扼殺了革命熱情，誠如徐友漁所言：

「我多次學過毛澤東的《實踐論》和《青年運動的方向》，毛澤東告訴我們，實踐是檢驗一切的準繩，看一個青年是否願意革命，唯一的標準就是看他是否願意，並且實行同工農結合。既然如此，表現就是唯一的判斷標準，與出身有什麼關係呢？」<sup>77</sup>

一九六六年底造反派紅衛兵興起之後，他終於突破了來自家庭的枷鎖：「思想上的枷鎖一旦去掉，人們的良知、價值標準和經驗事實馬上一致起來。那些自我反省，那些自我懷疑和否定，通通是受騙的結果。人民要重新做人。」<sup>78</sup>其中「人民要重新做人」道盡箇中心酸，一語中的指出造反派興起之最大心理動因：基於反抗、反壓迫、反特權的原則，爭取應有的政治權利。

以普遍觀點的人道價值從而進行對暴力、不公的批判，其正當性已經決然超越了出身、階級與派系，而是一種具有普世觀點的人道關懷，此種關懷如張戎所抗議的：「在文化大革命年代，我目睹人們因說『謝謝你』而遭攻擊，說是『資產階級的虛偽』，文明禮貌就快滅絕了。」<sup>79</sup>此種普世價值亦讓徐友漁這麼一位曾在文革中熱血沸騰的

---

<sup>76</sup> 徐友漁，《驀然回首》，頁 59。

<sup>77</sup> 徐友漁，《驀然回首》，頁 35。

<sup>78</sup> 徐友漁，《驀然回首》，頁 90。

<sup>79</sup> 張戎，《鴻》，頁 226。

革命青年，能在複雜的派系鬥爭中闡明心志，作出如此堅定的宣示：「我恨那些瘋狂的劊子手、殺人犯，不論他們屬於哪一派。」<sup>80</sup>「即使在那意識形態強化到了極點的時代，人們也並未完全喪失對於人性完善的追求。」<sup>81</sup>或許，對人性的捍衛與關懷不需依恃任何超乎理性、人性的判準，而緊緊依附著能夠成為超越任何層次的普世道德判準完成，這無論在何等政治境況中都是自明之理，在文革中亦是如此。

## （二）對毛澤東個人崇拜的疏離感書寫

文革擊碎了中國五千年以來一切的迷信、偶像與權威—除了毛澤東本人以外。在「三忠於，四無限」的政治指引下，人民必須永遠忠於偉大領袖毛主席，永遠忠於偉大的毛澤東思想，永遠忠於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無限熱愛毛主席，無限信仰毛主席，無限崇拜毛主席，無限忠於毛主席。張戎與徐友漁先後成為引領初期文革的革命小將，一九六六年底先後於北京天安門接受毛澤東的檢閱，但是兩人卻不約而同地在字裡行間表達對儀式當中失序的不滿與疏離感，這疏離感迥異於自己早年對毛澤東的崇拜，卻是在人生中最接近偶像的一刻才形成。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張戎與其他紅衛兵在北京天安門廣場接受毛澤東的檢閱，在張戎筆下，這趟從四川到北京的旅程異常艱苦：擁擠的列車、紅腫的關節、糧票被扒、飢餓寒冷、筋疲力盡、衛生條件極差，最糟的是，為時一個月的殷殷期盼最後只換來毛主席的一個背影，因而致使對偶像的破滅感，她形容：

「我看見毛澤東寬大結實的背影，右手正穩穩地揮動著。一眨眼間，他就從我的視野中消失了。這就是我朝聖的全部？這麼久的艱苦等候換來就只是瞥見他的背影？太陽似乎失去了光輝，周圍呢，紅衛兵還在又跳又叫…生命彷彿失去意義，一個念頭閃過腦海：也許我該自殺？」<sup>82</sup>

無獨有偶，徐友漁在接受檢閱時，認為：

「這次在天安門接受檢閱，我內心有一種不安與自責。我在廣場上並沒有達

---

<sup>80</sup> 徐友漁，《驀然回首》，頁 170。

<sup>81</sup> 徐友漁，《驀然回首》，頁 160。

<sup>82</sup> 張戎，《鴻》，頁 256。

到熱淚盈眶、熱血沸騰的地步。而在此之前，我看每一部關於毛主席接見紅衛兵的電影，鏡頭裡的紅衛兵莫不是如醉如狂欲仙欲死。但我那天的表現和感覺怎麼和原先設想的大不相同呢？莫非是我對毛主席的感情還未到應有的程度？我不敢想下去。」<sup>83</sup>

有趣的是，一九六六年底，兩人尚為熱愛黨的革命小將，張戎學家尚未遭到巨創而中落，徐友漁更力圖擺脫家庭背景，爭取成為正統的革命先鋒，兩人更尚未被迫下鄉勞動，但卻在最接近偶像時表現出龐大的疏離感，是為回憶錄中饒富意味的書寫模式。兩人的記錄下，宛若呈現對文革謊言的參透。為了詮釋對文革偶像的冷漠，甚而同時提及同儕的崇拜熱情遠甚自身，無非顯示出此段回憶是基於「當下」的立場，而非「當時」的立場，因而在文本中呈現邏輯上的不合理。誠然，此段書寫是在作者選擇、呈現自己的文本之前，先解讀自我參與文革的意義，再進行的後設書寫，於是對檢閱一事產生挑剔的餘地，更直接挑戰了當時的主流風氣。此種的書寫帶有已然身在文革之外的自由色彩，自是兩人倚仗普遍式觀點「再進入」文革經歷時，所自然呈現的解放書寫，利用檢閱這一事例，將自身救贖於荒謬的文革時代。

### （三）透過自由、民主、法制引領中國進步

張戎與徐友漁在回憶錄中都提到了對西方「難以置信的自由」的憧憬，張戎首重西方國家對異己的寬容：「我心想這正是我想生活的社會！我開始認識到正式這種對反對派、抗議者的容忍，才使西方不斷進步。」<sup>84</sup>而一九七八年，她在接到取得系上為一個留英名額時，更希望自身的幸福能擴及全中國。徐友漁則認為中國必須實行真正的民主，而非文革中假意的民主：「民主是一種平等的權利…如果一方可以任意地、不負責任地揭露另一方的一切…而另一方卻不想有同樣的權利…那麼，這種大民主不但對少數『走資派』不公平，而且對大多數群眾也只能起敗壞作用。」<sup>85</sup>文革後的民主實則服膺「道德復興」的潮流：「中國應該有一個道德復興的潮流，民主的潮

---

<sup>83</sup> 徐友漁，《驀然回首》，頁 84。

<sup>84</sup> 張戎，《鴻》，頁 396。

<sup>85</sup> 徐友漁，《驀然回首》，頁 227。



流和它是不可分離的。問題不在理論方面，而在實踐。」<sup>86</sup>

在這般的思想脈落下，人不應當用似是而非的論證理論矇蔽自己的良知，所謂歷史的必然性並不能成為剝奪人性的藉口，人應當相信自己的直覺經驗並忠於真實境況帶來的啓蒙與指示，對未來幸福的創造與實踐是人性中無法剝奪的部分。縱觀兩人文革後的際遇發展，都先後接受大學教育與海外進修，猶如一葉扁舟行駛在奔騰而喧嘩的生命之流，儘管文革一度阻擋了航行方向，但也是出於擺脫、面對、掌握文革意義的動機，進而在新生命中，沉澱出更為澄澈的生命之泉，當時機來臨，自是奔騰不息。Romain Rolland（1866-1944）有道：「創造，或者醞釀未來的創造，這是一種必要性：幸福只能存在於這種必要性得到滿足的時候。」對兩人而言，中國人真正的幸福，也只得存在於享有自由、民主、法制之際，這也是避免文革悲劇重演的唯一之道。

---

<sup>86</sup> 徐友漁，《驀然回首》，頁 230。



### 第三章 「再現式」文革記憶敘事—季羨林、楊絳

#### 第一節 季羨林、楊絳之生平記事與其思想

##### 一、季羨林

季羨林的生命經驗始於清廷初隕、民國嶄露的時代，或許正因為如此，他的人生處處呈現著某種鍥而不捨的堅毅與臨危不亂的坦然，生命之樹每一橫豎都深入知識土壤、生活岩層，緊緊扎根於曠野沃地，滿載著謙遜而豐美的果實。

（一）大學之前：生平無壯志，但求平順而已（一九一一八月～一九三〇年七月）

季羨林，一九一一年八月六日生於山東省清平縣（現併入臨清市）的小村莊—官庄，自小恰恰生長在山東省內最窮乏的縣、最窮乏的村莊，及最窮乏的家庭。或許背景使然，讓他日後回憶幼年生活時，多了份知足、樂觀：「現在寫這些事情還有什麼意義呢？這些芝麻綠豆般的小事是不折不扣的身邊瑣事，使我終生受用不盡。它有時候能激勵我前進，有時能鼓舞我振作。」<sup>87</sup>

一九一七年冬，六歲的季羨林離家到濟南投靠環境稍好的叔父，開始了正式的求學經驗。此段遷徙，是他一生中最關鍵的轉折點。叔父對他百般栽培，先是讓他就讀於私塾，接觸《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經》、《四書》等經典名著，接著轉到小學接受正式教育。季羨林進入新育小學考過甲等第三、乙等第一的名次，雖然是中上的學生，但他自稱自己是「幼無大志」，小說遠比正式教材更為吸引他。較特別的是，此時他參加了非正式的英文學習班，開始了第一外語的學習，對語言學習的熱愛自此萌芽。<sup>88</sup>一九二四年，十三歲的季羨林考取正誼中學，他自稱這是另一個「幼無大志」的代表。相對地，叔父對他的教育愈加嚴謹，不僅替他選課，亦著手安排讀物，安排他進入古文學習班學習，期間讀閱《左傳》、《戰國冊》、《史記》等書，晚上另外送他到英文學社進修。初中畢業後，先是在正誼高中就讀半年，後於一九二六年轉入新成

<sup>87</sup> 季羨林，2006，《另一種回憶錄》，北京：作家出版社，頁7。

<sup>88</sup> 談到初識英文，他說：「我以爲，方塊字是天經地義，不用方塊字，只彎彎曲曲像蚯蚓爬過的痕跡一樣，居然能發出音來，還能有意思，簡直是不可思議。越是神秘的東西，便越有吸引力。」

立的山東大學附設高中。國文老師王昆玉對季羨林的文學之路有著重要的啓蒙作用，他的第一篇作文《讀「徐文長傳」書後》受到王老師的高度讚揚，評語是「亦簡勁，亦暢達」，驚喜之於，他遂對古文產生濃厚的興趣。此時增添德文的學習，英文亦無中斷。在如此悉心照料下，季羨林在課業上已遠比同儕出色許多，取得了甲等第一名的成績。但是此時的他，夢寐以求的不過是畢業後考上大學，掙到一只飯碗，平庸地渡過一生罷了。一九二九年，季羨林轉入山東省立濟南高中，國文學習有所精進，他當時改以白話文書寫，大得董邱芳老師的讚揚，稱讚他與另一位同學為「全校之冠」，這顯然是季羨林的文學學習過程中，難以忘懷的稱許，「我之所以五十年來舞筆弄墨不綴，至今將近耄耋之年，依然不能放下筆，全出於董老師之賜，我畢生難忘。」<sup>89</sup>

## （二）大學之後：嚴謹漫長的學術坦途（一九三〇年七月迄今）

一九三〇年，季羨林考取北京清華大學，成績優異的他捨棄第一志願北京大學，著眼的是清華提供著較多的留學機會，於是進入清華西洋系就讀，專修德文。在所有課程中，受益最大的是朱光潛先生開設的「文藝心理學」及陳寅恪先生開設的「佛經翻譯文學」，他認為：「這兩門課對我以後的發展有深遠影響，可以說是一直影響到現在」。<sup>90</sup>一九三五年，季羨林成為清華大學與德國哥廷根大學的交換學生，主系印度學，副系英國語言學與斯拉夫語言學，另外還學了梵文、巴利文、俄文、南斯拉夫文、阿拉伯文等，期間在德國獲得哲學博士學位，並擔任哥廷根大學漢學系講師。為時十年的留學經驗，正式教育之外，他更受到德國人「徹底性」（*grundlichkeit*）的薰陶——學術研究上秉持的認真與嚴謹。

一九四六年，季羨林回到北京大學任教，由陳寅恪先生介紹予胡適、傅斯年、湯用彤，擔任東方語言文學系主任，並創下北大副教授直升教授的首例。從那時開始在北大待了四十二年——包括文革期間挨批遭整。一九五六年他當選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一九七八年後任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北大東語系系主任、北大副校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南亞研究所所長、中國外文文學會副會長。其後陸續擔任中國南亞學會會長、中國語言學會、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全國人大代表、中國外語教學研究會會

<sup>89</sup> 季羨林，2007，《季羨林說自己》，北京：京華出版社，頁21。

<sup>90</sup> 前揭文，頁28。

長、全國人大常委等職。二〇〇三年起因病調養，至今仍筆耕不輟，而成為當代研究梵學、佛學、吐火羅文、比較文學之國學大師。

縱觀季羨林的一生，除了十年浩劫期間，都稱得上是穩健而豐采，在學術成就上更是極受尊崇，為當代國學大師，但即使如此，他對自己的人生經歷既謙遜又自嘲：「我這一生，同別人差不多，陽關大道，獨木小橋，都走過跨過。坎坎坷坷，彎彎曲曲，一路走了過來。我不能不承認，我運氣不錯，所得到的成功，所獲得的虛名，都有點名不副實。在另一方面，我的倒楣也非常人所可得者。」<sup>91</sup>

## 二、楊絳

### （一）大學之前：好學不綴，不忮不求（一九一一年七月～一九二八年七月）

楊絳，本名楊季康，慣以筆名行世。祖籍江蘇無錫，一九一一年生於北京，同季羨林一般，楊絳生長在古老中國在二十一世紀初的巨變狂濤之中，時值辛亥革命前夜，但兩人家世背景迥異。楊絳生長於地方士紳之家，父親任職北京歷任京師高等審判廳廳長、京師高等檢察長、司法部參事等職。其父個性耿直，學識廣闊，早年先後留學於日本早稻田大學、美國賓州大學，為雙法學博士，其母嫻靜溫雅，楊絳的記憶中，從未見兩人失和。楊絳的人生哲學，就是在如此靜懿的書香世家中鑄成，她學習了父親好學不綴的態度，也繼承了母親和善客氣的性格，更承襲父母淡泊名利、不忮不求的處世觀，「假如我們對某一個東西非常艷羨，父親常常也只說一句話：『世界上的好東西多著呢』…我私下的反應是，天下的好東西多著呢，你能樣樣擁有嗎？」

92

一九二〇年是楊絳正式教育的開始，就讀於上海啓明女校，一九二八年畢業於蘇州振華女校。楊絳自小對文學有著極為濃厚的興趣，父親為啓蒙導師，常為她準備詩詞小說等傳統讀物，但從未流於強制性質，「如果她對什麼書感到興趣，父親就把那本書放到她的桌上。有時他得爬樓梯到書櫥頂層去拿；如果她長期不讀，那部書就會

<sup>91</sup> 季羨林，《季羨林說自己》，頁 75。

<sup>92</sup> 楊絳，1993，〈回憶我的父親〉，《楊絳作品集》第二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頁 81。

不見了一這就等於懲罰。」<sup>93</sup>

## （二）大學之後：我們仨，從未孤單（一九二八年九月迄今）

一九二八年，楊絳就近就讀於蘇州東吳大學政治系，一九三二年成為清華大學研究院外國語文研究生，與季羨林為同班同學。清華時期，王文顯老師點燃了她對西洋戲劇的喜好，吳宓老師奠定了她扎實的翻譯能力，朱自清老師開啓了她的散文創作，楊絳第一部散文《收腳印》創作於一九三三年。此時不但是楊絳重要的學習黃金期，與錢鍾書的邂逅，奠定日後「我們仨」的生命基體，往後半個多世紀的人生旅途上，歷經抗日戰爭與文革的驚濤駭浪，兩人始終休戚與共。

一九三五年，婚後楊絳與錢鍾書一同前往牛津，錢鍾書攻讀英國文學學士，楊絳則自費旁聽課程，獨自進修。一九三七年，兩人偕同幼女錢媛轉赴法國巴黎大學進修，抗日戰爭爆發後兩人因愛國心驅使返國，而自此不願離棄。回國後，楊絳先後任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學院外語系教授、清華大學西語系教授。一九四九年後，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外國文學研究所工作。一九五三年，任北京大學文學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此期間翻譯了《一九三九年以來英國散文作品》、西班牙著名流浪漢小說《小癩子》、法國勒薩日的長篇小說《吉爾·布拉斯》等。一九七〇年同丈夫錢鍾書一同下放至河南省息縣幹校，分別從事菜園勞動與簡單的通訊。一九七二年兩人脫離幹校，重返北京。文革後楊絳重回中國社會科學院外文所，繼續研究翻譯外國文學，並從事散文創作，至今不輟。一九九七、九八年，錢媛與錢鍾書相繼離世，但「我們仨」，終未走散。

就像一面澄清皎潔的明鏡，楊絳的價值觀與人生態度，莫不在作品中真實地反映出來。著有溫馨家庭散文《我們仨》，小說《倒影集》、《洗澡》，劇本《稱心如意》、《弄假成真》、《遊戲人間》、《風絮》等，譯作有《1939年以來的英國散文選》、《小癩子》、《吉爾·布拉斯》、《堂·吉訶德》、《斐多》等。在她的許多創作中，常環繞著楊絳式主題：解構與解嘲人性中常見的勢利與虛偽，以及對人生哲學、美學的嚮往與肯定，尖銳與溫儒並存。<sup>94</sup>

<sup>93</sup> 羅銀勝，2005，《楊絳傳》，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頁30。

<sup>94</sup> 《稱心如意》、《弄假成真》兩部作品中，表現出中國的宗法制在邁向西方現代化的過程中，出現某

## 第二節 文化大革命中的季羨林與楊絳

### 一、季羨林

#### （一）懷抱知識份子的原罪挨批（一九六五年六月～一九六七年十一月）

「在這期間，我是怎麼考慮十年浩劫的呢？實際上，我腦筋開了竅認識這一場在極端絢麗的面紗下蒙著極端的殘酷的那一天起，我就沒有把它忘記。」<sup>95</sup>

——季羨林

十年文革是近代中國文人一場最艱鉅的劫難，五十五歲的季羨林自此捲入這場暗無天日的漩渦中，將他推入「追往事，嘆今吾，春風不染白髭鬚」的老境。文革結束四十年後，他用「自己親手搭起牛棚」「牛棚生活（一）、（二）、（三）」、「牛棚轉移」等五節，在《牛棚雜憶》中描寫當時他在北大的牛棚生活，而此本書也成為季羨林回憶文革最重要的一本回憶錄。

面對權力關係相當複雜的上層政治鬥爭，恭儉溫良的中國傳統文人通常是一知半解的。文革初始，住在北京旁小山村的對季羨林尚未察覺有異，當姚文元的「評《海瑞罷官》」傳出後，他不識山雨欲來風滿樓的詭譎氣氛，還天真地發表對評《海瑞罷官》的意見，認為「我根本看不出《海瑞罷官》同彭德懷有什麼瓜葛」，<sup>96</sup>又說「三家村里的三位村長我都認識，有的還可以說是朋友，我同吳晗三十年初在清華是同學」，<sup>97</sup>這些未經再三斟酌的隨評，日後都成了倒持太阿，授人以柄的罪名。

一九六五年「五一六通知」如一道橫雷打在這位學術巨擘身上，徹底揭露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的學術權威」，對這位思想不純正的學者展開如火如荼的批鬥。當年六月四日，季羨林奉召返校，殊不知這一返，就跌入挨批深淵之中。

---

些弄巧成拙、幽默諷刺的生活片段。長篇小說《洗澡》則呈現了知識分子在五〇年代的思想震盪和面對政治運動時，不同的心態和反應，這部作品在當時的文壇掀起議論。洗澡，在楊絳巧妙的比喻下，實代表政治力道對知識份子的洗腦。

<sup>95</sup> 季羨林，2003，《牛棚雜憶》，香港：三聯出版社，頁258。

<sup>96</sup> 季羨林，《牛棚雜憶》，頁8。

<sup>97</sup> 前揭文。

某日他家中突然闖入兩名聲稱破四舊的紅衛兵，命他砸掉案頭的擺飾，並直指他牆上的領袖像之所以一塵不染，應是「臨時掛上去的」，開始對他進行一連串荒謬的指控。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五日，陳伯達、康生、江青等人以鎮壓群眾之名下令撤銷北大工作組，其後聶元梓當上北大校文革籌委會主任、校文革主任，是為北大一代造反派之首。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三十日，新北大公社由聶元梓授權，<sup>98</sup>對季羨林展開抄家暴行。是夜，倏地闖入六七名大漢，昔日的學生成為了今日的剋星，人人手持棍棒，面若寒霜，將季羨林、季夫人、孀母趕入廚房，再大肆破壞屋內的家當、古董、擺飾，龐大的書庫也在劫難逃，更被搜出通訊錄，使無辜親友遭池魚之殃。當時流行「先抄家，再舉証」，季羨林被搜出三大罪證：其一，是未燒完的信件，紅衛兵指信件中必有重大機密，以至於必須燒毀之；其二，是從季羨林孀母枕下搜出的防身刀，紅衛兵一口咬定是由季羨林枕下搜出，是季羨林存心想殺害紅衛兵的工具；其三，是一張印有蔣介石與宋美齡合照，這是留德期間，一位具國民黨背景的留學生給他的，這些革命小將因此斷定，他保留合影是欲等國民黨捲土重回後邀賞之用。此三大罪證成立，所有的解釋與回應都遭曲解為「態度頑劣」，此時的境況已然是百喙莫鳴。「長夜漫漫何時旦？這一夜是我畢生最長的一夜，用任何語言也無法形容的一夜。」<sup>99</sup>

## （二）成為挨批專家（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一九六九年二月）

人走投無路時，最糟可能也是最好的選項是尋短，文革中這種現象很普遍，季羨林也曾經考慮過自殺的可能，且有研究「自殺學」的念頭。他在牛棚雜憶中敘述：「我從來沒有研究過自殺學，可現在非考慮不行了。」<sup>100</sup>在衡量過各個死亡進行的方式、地點，他決定前往圓明園服安眠藥自盡，直到出發前夕，家中闖入了三個紅衛兵，將他抓去「陪鬥」<sup>101</sup>，雖說某種程度上拯救了他的生命，但也將他推入更暗無天日的地

<sup>98</sup> 季羨林遭抄家事件由是否有上級授權，或由何人授權存有爭議，此處採季羨林於《牛棚雜憶》中的說法。聶元梓於《聶元梓回憶錄》中對此作出了反駁，她認為此事件出自自己無法充分掌握北大混亂的局勢，但「我並沒有親自指示對包括季羨林在內的任何一個北大師生進行批鬥和迫害。」，可參見聶元梓，2005，《聶元梓回憶錄》，香港：時代國際，頁492。另一方面，新北大公社創立於1967年2月15日，由「紅旗兵團」、「紅教工兵團」、「東風兵團」等紅衛兵造反組織聯合成立，是當時北大最大規模的紅衛兵組織，因支持聶元梓之校文革當局而有保守派的意涵。

<sup>99</sup> 季羨林，《牛棚雜憶》，頁56。

<sup>100</sup> 季羨林，《牛棚雜憶》，頁68。

<sup>101</sup> 雖說是陪鬥，但也是被強押上台，接受群眾大聲斥罵吆喝，受到彎腰、低頭的「噴氣式」懲罰，並遭吐痰、毆打、遊街。只是挨打程度沒主角嚴重罷了。



獄，但是他卻不認為自殺好過挨批，反視批鬥唯為一種「拯救」，提供了另一種人生可能的選項。「這是我活了五十多年第一次受到的批鬥，牠確實能令人驚心動魄，畢生難忘。牠把人的殘酷本性暴露無疑，然而牠卻在千鈞一髮之際救了我一命。這樣殘酷的批鬥原來也是可以忍受住的阿！」<sup>102</sup>身為系主任，自然無法逃過成為群眾暴力目標的厄運，他很快就成了批鬥會上的主角，在會中不僅遭到莫須有的指控，還被群眾一陣追逐痛毆，對一名五十幾歲的中年文人施以最直接的暴行，他以這麼一句話形容當時的慘況：「他們用牛刀來殺我這隻雞。」<sup>103</sup>

一九六七年冬天至一九六八年春天，無情的批鬥成為一種常態，他開始慣以視之：「我是在批鬥方面見過大世面的人，我又珍惜我這一條像駱駝鑽針似遞減來的性命，我再不想到圓明園了。」<sup>104</sup>這樣的心態，是逆來順受，更是苟且偷生。在面對難以忍受攻擊時，他想到的並非如何究責、如何平反，他腦海中常浮現的，卻是：「我想到我的幼年。如果我留在鄉下的話我的文化水平至多也只是一個半文盲…人生識字憂患始…我真是多麼後悔呀！」<sup>105</sup>緊接著批鬥的，便是勞動改造，但就如批鬥一樣，當一件慘劇成為例行公事之後，便能以調侃的心態看待自身了。季羨林描繪當時狀況的語氣多了分諷刺與自嘲，他形容那些言語攻擊時猶如「秋風過耳邊」，而自己「在批鬥的煉獄中已經接近畢業，應該拿到批鬥實踐學的學士證書了。」<sup>106</sup>

一九六八年春，季羨林等人接到通知，要與其他黑幫一起修建、入住校內極為簡陋的廢棄平房—狹小、骯髒、潮濕，屋頂無法抵擋烈日驟雨：「『牛棚』要牛馬們親自搭，北大選擇在兩座樓房之間的空曠地，讓『牛』們用葦席搭成牆壁，圍成大門，築成篷帳。除了地上蒙老佛爺之恩而准許鋪上木板，『男生分居』等『文明』痕跡之外，其他和『馬廄』、『豬圈』、『牛棚』完全一樣。」<sup>107</sup>上級為了鞭策這些黑幫建設牛棚的偉大工程，特設立審訊室。對歷經風霜的季羨林而言，發生在這小審訊室的暴力當然只是小巫見大巫：「小小審訊室裡響徹鐵鍬砸地的聲音，激昂而又和諧，宛若某一個

<sup>102</sup> 季羨林，《牛棚雜憶》，頁 78。

<sup>103</sup> 季羨林，《牛棚雜憶》，頁 82。

<sup>104</sup> 季羨林，《牛棚雜憶》，頁 83。

<sup>105</sup> 季羨林，《牛棚雜憶》，頁 88。

<sup>106</sup> 季羨林，《牛棚雜憶》，頁 97。

<sup>107</sup> 季羨林，《牛棚雜憶》，頁 114。

大師的交響樂了。」<sup>108</sup>或許不難發現，走入「黑幫大樓」的季羨林，越來越能用「超外」的心態來看待自身的遭遇。他更為此牛棚量身打造了首短詩：

「大院建成  
乾坤底定  
言順名正  
天下太平」

「黑幫大樓」中的例行公事包括每天的勞動、勞動前要背誦「最高指示」、以及與監改人員碰頭時的「問候」：「如果哪個監改人員不用國罵開端，我反而覺得非常反常，非常不舒服了。」<sup>109</sup>而晚間訓話是指晚餐過後，所有黑幫必須列隊接受點名，一一接受許多虛實不分的指責。痛苦的晚間訓話，被季羨林評為「勞改監改人員最偉大的最富有天才的發明創造」。作為「黑幫大樓」憲法的《勞改罪犯守則》，更有些離奇的規定，如走路不許抬頭，或是坐著不許翹腿。面對所有遭遇，季羨林以「折磨論」稱之，並認為自己的消極處理正是應付這些折磨的對策：「這種打著勞動旗號折磨人的辦法，只是改造人的身體，而決不會改造人的靈魂。如果還能達到什麼目的的話，我的自暴自棄就是一個最好的例證。折磨的結果只能讓人墮落，而不能讓人升高。」

110

### （三）從「半解放」、「完全解放」到真正解放（一九六九年二月~一九七三年三月）

一九六九年農曆年前夕，季羨林接到系革委會通知，終於得以離開牛棚回家，謹須固定回校進行「學習」，他稱此狀態是「半解放」，然自己卻尚無定性而「游移於人鬼之間，不知何以自處」。<sup>111</sup>一年之後，他轉任校內「三十五樓」擔任門房工作，負責「三十五樓」之看守與通訊。此時他既無教學工作，也無科研任務，可比印度的賤民階級，是為「不可接觸者」，正因不可接觸，也因此風光邁入「完全解放」的階段。

<sup>108</sup> 季羨林，《牛棚雜憶》，頁 116。

<sup>109</sup> 季羨林，《牛棚雜憶》，頁 127。

<sup>110</sup> 季羨林，《牛棚雜憶》，頁 161。

<sup>111</sup> 季羨林，《牛棚雜憶》，頁 171。

了卻外在之紛沓干擾後，自己卻是其樂陶陶地享受著此般完全解放。在完全解放的境況下，一九七三年一月，季羨林不抱著希望地向東語系圖書館員申請訂購印度史詩《摩羅衍那》（Ramayana）梵文精裝本，卻意外地毫無阻礙下，兩個月後便收到八大本梵文原著的《摩羅衍那》，「我真覺得這幾本大書熠熠生光。」<sup>112</sup>此刻翻譯工作，是季羨林在文革中最大的驚喜，他自此投入，直至一九七七年終譯完這部一萬八千七百五十五頌的宏篇鉅製。一九七三年三月，系軍宣隊隊長與支左總書記告知季羨林：「恢復組織生活，留黨查看二年」的支部決議。儘管再多不服，「說老實話，我已經失望到了極點。我盼星星，盼月亮，盼著東方出太陽，太陽出來了，卻是這樣一個太陽。我不想在這個問題上傷腦筋了，夠了，夠了，已經足夠了。」<sup>113</sup>他對此決議仍簽下了「基本同意」而享受真正解放了。

十年浩劫之後，季羨林以陶淵明的《形影神贈答詩》形容浩劫重生的自己：「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浩劫重生，生死禍福自順天命、樂天命。或許正是如此委順自然、謙遜溫良的性情，才有如此超然度外之境。

## 二、楊絳

### （一）《幹校六記》：馥郁溫婉，不露怨意

楊絳的文革回憶文本有二，一是《幹校六記》，二是《丙五丁末年記事》，兩者皆是以散文的形式呈現，前者敘述的是下放幹校後之事，後者記載的是下放前挨鬥之事。《幹校六記》書名取自清朝乾隆嘉慶年間沈復所寫的《浮生六記》——同樣是從「情」出發之文。綜觀《幹校六記》全文，最大特色在於幾乎篇篇的主角都是自己與丈夫——錢鍾書先生，並以此兩人構成文革記事的主角，字裡行間也足見對丈夫的關懷，鶼鶼情深之情一覽無遺。全文不見震懾人心的情節，也無慘絕人寰的故事，沒有自怨自艾、哀愴悲涼的氣氛，僅有作者以平靜的心情寫著看似平凡的故事。不僅是對丈夫，她字裡行間處處流露對旁人的關懷，遠遠大於對自己遭遇的憐惜；感激旁人的篇幅，也遠遠大過埋怨的篇幅。行文看似清爽淡然，但是濃烈的情感滿溢紙上。以下依六記之排

<sup>112</sup> 季羨林，《牛棚雜憶》，頁 178。

<sup>113</sup> 季羨林，《牛棚雜憶》，頁 184。

序說明：

### 1、下放別記：下放二別，一家支離破散

下放之前，楊絳於中國社會科學院外文所任教，錢鍾書於文學所任教。一九六九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已開始了知識份子的學習運動，全體人員先是集中住在辦公室裡，六至十人一間，每天清晨練操，上下午和晚飯過後共分三個單元分班學習。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三日，楊絳得知錢鍾書將於十一月十一日先遣下放河南羅山幹校，當時再過幾天便是錢鍾書的六十歲生日，如今來不及一同慶祝，心中不免悵然。這一記詳細書寫了如何替錢鍾書整理行李，及替他送行的場景，在此卻對自己隨即而來的下放不多作描寫，心態更是看似平凡：「我們等待著下幹校改造，沒有心情理會什麼離愁別恨，也沒有閒暇四品嘗那『別是一般』的『滋味』。」<sup>114</sup>

楊絳的下放晚了丈夫約八個月，她於一九七〇年七月十二日前往幹校，此時的幹校由羅山改為息縣東岳。由於女婿王得一於一個月前已自盡，所以這次送行少了得一，獨剩女兒錢瑗（以下同楊絳稱之為阿圓）。在敘述得一自盡的前因後果時，楊絳倒能坦然面對他的立場與價值，第一句便是：「得一承認自己總是『偏右』。」<sup>115</sup>而得一最後一次離開前對岳母的告白更是強烈地表現出對過度鬥爭的控訴：「媽媽，我不能對群眾不好，也不能頂撞宣傳隊；可是我絕不能捏造個名單害人，我也不會撒謊。」<sup>116</sup>不久，在學校工宣隊每天實行三個單元對得一展開鬥爭，逼他交出「五一六名單」後，得一便自盡了，當年阿圓三十三歲，兩人結婚僅不到三年。少了女婿得一，獨剩女兒阿圓的送行，無論是從楊絳或阿圓來說，都是滄涼寂寞，但此記末，楊絳僅是蜻蜓點水式的點出這份遺憾：「可是比了獨在北京的阿圓，我們就算是同在一處了。」<sup>117</sup>此處的我們，指的是他與錢鍾書兩人。

### 2、鑿井記勞：集體勞動增生的歸屬感，突破階級我群／他群的劃分

楊絳在幹校中被分配到菜園班，舉凡大田勞動（種豆、種麥）、造屋、養豬等，都要親力親為。在鑿井記勞中，楊絳與同伴們爲了引水耕作只得破土鑿井，終於造就

<sup>114</sup> 楊絳，2006，《幹校六記》，台北：時報出版社，頁13。

<sup>115</sup> 楊絳，《幹校六記》，頁15。

<sup>116</sup> 楊絳，《幹校六記》，頁16。

<sup>117</sup> 楊絳，《幹校六記》，頁17。

三米深的井，楊絳特此向廚房討一個酒瓶，走上二里路去打一斤酒及糖，爲大夥驅寒慶功。透過勞動，竟也使楊絳產生參與感：「我每天跟隨同伴早出晚歸，幹些輕易的活兒，說不上勞動。可是跟在旁邊，就彷彿也參與了大夥兒的勞動，漸漸產生一種『集體感』或『合羣感』，覺得自己是『我們』或『咱們』中的一員，也可以說是一種『我們感』。」<sup>118</sup>相對地，「有一位擺足了首長架子，訓話『嗯』一聲、『阿』一聲的領導，就是『他們』的典型；其他如『不要臉的馬屁精』、『他媽的也算國寶』之流，該也算是屬於『他們』的典型。」此時的我族與他族，大抵沿著領導者／被領導者劃分開來，但有時也突破了階級的劃定，而是從集體勞動中形成的聚集情感。

### 3、學圃記閒：從平淡中體會日常的趣味

在此記裡，楊絳提到了爲了施肥於菜園，便著手興建廁所，用以蒐集肥料之事，但行筆之間卻毫無骯髒的意象，而盡是耕作的記載。楊絳稱被分配到菜園是班長的「照顧」之舉，因爲錢鍾書的宿舍就在菜園以北，約步行十多分鐘的距離。由於錢鍾書負責看守工具，故班長常令她去商借，楊絳相當滿足於此近乎人情的安排：「我的班長常叫我去借工具。借了當然要還。同夥都笑嘻嘻地看我興匆匆走去走回，借了又還。」<sup>119</sup>又因爲錢鍾書的專職是通信員，每天下午要到村上郵電所去領取報紙、信件、包裹等回來分發，郵電所在菜園的東南邊，因此兩人得以在菜園聚首。楊絳如此形容當時這患難中的幸福感：「這樣，我們老夫妻就經常可在菜園相會，遠勝於舊小說、戲劇後花園思鄉約會的情人了。」<sup>120</sup>

除了菜園耕作的日常瑣事，以及偶爾與丈夫短暫而滿足相會，在此記中，楊絳與季羨林先生一樣，提到了「墳墓」—死亡的意象。第一件發生於一九七一年一月三日下午，來了三、四個人在菜園東邊的溪岸上刨坑，並從葦蓆下擡出一具穿著藍色制服的屍體，後埋之，楊絳詢問後才知道是幹校中自縊之人。她趁暮色蒼茫、暗無一人時前往那座掩埋的小丘，只看見添了一個扁扁的土饅頭。雖然誰也不會注意到溪岸上多了這麼一個新墳，但這事件顯然在她心底投下了一個沉重的石子，不斷地在心上掀起

---

<sup>118</sup> 楊絳，《幹校六記》，頁 23。

<sup>119</sup> 楊絳，《幹校六記》，頁 27。

<sup>120</sup> 楊絳，《幹校六記》，頁 28。

陣陣波瀾。首先，她隔天就跟錢鍾書提這件事，提醒他往來時留心別採著那墳，又向他探聽死者的姓名、身世等等。不久後下了一場大雪，楊絳擔憂雪後地塌墳裂，屍體恐遭野狗拖食，還親身前往墳地觀察，所幸無大礙。

第二件，是來她形容勞動後返家之途，宛若走入自己的墳墓。這起因於楊絳獨行、夜行的習慣，但是這段路她行之有時，卻第一起死亡事件出現後才觸發連鎖效應：

「我住在老鄉家的時候，和同屋夥伴不在一處勞動，晚上不便和她們結隊一起回村。我獨往獨來，倒也自由靈便。而且我喜歡走黑路。打了手電，只能照見四周一小圈地，不知身在何處；走黑路倒能把四周都分辨清楚。我順著荒墩亂石間一條蜿蜒小徑，獨自回村；近村能看到樹叢裏閃出燈光。但有燈光處，只有我一個床位，只有帳子裏狹小的一席地——一個孤寂的歸宿，不是我的家。因此我常記起曾見一幅畫裏，一個老者背負行囊，拄著拐杖，由山坡下一條小路一步步走入自己的墳墓；自己仿佛也就是如此。」<sup>121</sup>

同年清明，學部的幹校遷往明港，動身前，楊絳又關注了那個引她注目的墳墓：「連那個扁扁的土饅頭也不知去向，只剩了滿布坷垃的一片白地。」<sup>122</sup>遺失的，是墳，是歸屬，是滅絕，亦是重生。

#### 4、「小趨」記情：狗尚諳人性，況人乎？

尚在席縣時，有天一位詩人從磚窯裡抱回一隻幼犬，這隻名為「小趨」的瘦小黃狗，與楊絳、錢鍾書兩人感情深厚，兩人視其如己出。這樣的豢養關係是危險的，狗只是「資產階級夫人小姐的玩物」，所以表面上楊絳待小趨向來淡然，但回憶時楊絳毫不諱言自己對小趨有著亦兒亦孫的情感投射：

「我有一位同事常對我講他的寶貝孫子。據說他那個三歲的孫子迎接爺爺回家，歡呼跳躍之餘，竟倒地打了個滾兒。他講完笑個不了。我也覺得孩子可愛，只是不敢把他的孫子和小趨相比。但我常想：是狗有人性呢？還是人有

---

<sup>121</sup> 楊絳，《幹校六記》，頁 35。

<sup>122</sup> 楊絳，《幹校六記》，頁 35。

狗樣兒？或者小娃娃不論是人是狗，都有相似處？」<sup>123</sup>

一日，幹校遷至明港的消息傳來，領導命「各連養的狗一律不准帶走」，楊絳只好將小趨寄養給當地的解放軍。解放軍說：「放心，我們會養活它；我們很多人愛小牲口」。楊絳不忘告訴他小狗名「小趨」，還特意喚了幾聲「小趨」，讓對方知道該怎麼稱呼。然而搬家之後，息縣傳來消息說小趨不肯進食，卻是在原地來回跑叫，似乎是滿處尋找熟悉的主人。楊絳這才懊惱應索性違反紀律，將小趨帶到明港——雖然帶到明港的狗，依舊終究不敵遭遣的命運。日後，楊絳與錢鍾書常掛念起小趨，但自是生死兩茫茫：「給人吃了也罷。也許變成一隻老母狗，揀些糞吃過日子，還要養活一窩又一窩的小狗…」<sup>124</sup>面對這樣的別離，楊絳自是萬般無奈，卻用如此平淡風輕的情緒寫出看似無所謂的字句，更表現出對小趨的無限關懷。

#### 5、冒險記幸：萬般幸運的三場冒險

第一件事，是楊絳冒雨犯險去探望錢鍾書之事。幹校還在息縣的大雨時節，有次午後約兩點的自由時間，楊絳冒著隻身擅自外出的風險，行過泥濘不堪的路面，只為見錢鍾書一面，「一路坑坑坡坡，一腳泥、一腳水，曆盡千難萬阻，居然到了默存宿舍的門口。」<sup>125</sup>錢鍾書見她臨時來訪自是又驚又喜，但也急催她回去，所幸平安歸返。

第二件事，是楊絳送錢鍾書回宿舍，自己再摸黑走回自己宿舍之事。除夕夜當天，領導特准女同志的另一半前來團圓，為了怕視力不佳的錢鍾書迷路，晚飯後楊絳索性送他回宿舍，同行時為免除他擔心，還誇口說道：「這條路，我哪天不走兩遍！況且我帶著個很亮的手電呢，不怕的。」<sup>126</sup>但其實她每天來回走的路，僅僅是南方的堤岸和北岸的東西大道。甫將錢鍾書送達，楊絳走出宿舍門口，乍見地上大雪初融，她一走出燈光所不及的範圍，便落入一團昏黑裏。天上沒一點星光，地下只一片雪白，看不見樹，也看不著路，一路萬般迂迴，跌跌撞撞，所幸最終還是安全抵達宿舍。

第三件事，是楊絳走失一事。有次看完「學習電影」後，隨著隊伍回宿舍，卻跟

---

<sup>123</sup> 楊絳，《幹校六記》，頁 39。

<sup>124</sup> 楊絳，《幹校六記》，頁 45。

<sup>125</sup> 楊絳，《幹校六記》，頁 49。

<sup>126</sup> 楊絳，《幹校六記》，頁 51。

錯隊伍以致走失，幾度輾轉才找到熟悉的夥伴及熟悉的路途。當晚，好不容易安全返回的她，縱使睡在僵硬、結實的小床上，卻感到享不盡的安穩。以上三場記事，說的是幹校生活中不經意的冒險，此等不經意，可能造成的結果卻可小可大，最後楊絳都得以平安無虞地歸來，故也是極度幸運的三則記事。

#### 6、誤傳記妄：面對返家，無法壓減私心的欣喜

一九七二底，北京誤傳遣返錢鍾書的消息。在此記中，愛國與愛家的情感著實矛盾：「我自慚誤聽傳聞，心生妄念，只希望默存回京和阿圓相聚，且求獨善我家，不問其他。解放以來，經過九蒸九焙的改造，我只怕自己反不如當初了。」<sup>127</sup>誠如楊絳自己說的「據說，希望的事，遲早會實現，但實現的希望，總是變了味的」，這變了味是因為私心作祟，亦是因為未產生預期中的改造：「這就使我自己明白：改造十多年，再加幹校兩年，且別說人人企求的進步我沒有取得，就連自己這份私心，也沒有減少些。我還是依然故我。」<sup>128</sup>面對自己的價值選擇，楊絳誠實以對。

綜觀六記，字數不多但用字深刻，雖多為生活片段的描寫，卻是文革親歷者最真實直接的受難呈現，彷彿一杯看似清淡無害的苦艾酒，縱然字裡行間不見如火如荼的控訴，讀者飲下後卻見心頭灼燒，哀而不傷，同情滿溢。

#### （二）《丙午丁末年記事》：端視烏雲旁的一抹金邊

《丙午丁末年記事》<sup>129</sup>是《幹校六記》之外，另一部楊絳的文革回憶散文，記載著下放幹校前，挨批受整的故事。在《丙午丁末年記事》中，楊絳與錢鍾書受到了比在《幹校六記》中更為殘酷無情的暴力對待，不僅被迫勞動、反省，還遭到毆打、吐痰、罰掃廁所、剃陰陽頭（剃光半邊頭髮）、剃十字頭（頂上僅留十字形狀的頭髮）等非人化的對待，但是在此文中遣詞用字卻更為活靈活現，趣味中帶點諷刺，自嘲中挾帶感懷。在楊絳十足的黑色幽默下，讀者總是笑中帶淚。

一九六六年八月九日（陰曆丙午年六月），楊絳與錢鍾書兩人成為批鬥大字報中的主角，因此莫名掉入這場無妄災禍中，但過程在楊絳筆下卻顯的平凡無異。「我下

<sup>127</sup> 楊絳，《幹校六記》，頁 16。

<sup>128</sup> 楊絳，《幹校六記》，頁 64。

<sup>129</sup> 收錄於楊絳，2006，《幹校六記—及將飲茶等篇》，台北：時報文化出版社。



班回家對默存說：「我今天『揪出來』了，你呢？」他說：「還沒有，快了吧？」果然三天後他也「揪出來了」。我問默存：「你是怎麼揪出來的？」他也莫名其妙。「大概是人家貼了我幾張大字報。」<sup>130</sup>短短一段話，閃爍著楊絳在《幹校六記》裡一貫的黑色幽默和狡詰的語態。既然挨批，那麼也該符合挨批的模樣：

「我給默存找出一塊長方的小木片，自己用大碗扣在硬紙上畫了個圓圈剪下，兩人各按規定，精工巧制；做好了牌子，工楷寫上自己一款款罪名，然後穿上繩子，各自掛在胸前，互相鑒賞。我們都好像阿麗思夢遊奇境，不禁引用阿麗思的名言：『curiouser and curiouser！』」<sup>131</sup>

在批鬥大會上，楊絳直猜測自己會被冠上何種名諱，結束後一看，才知道自己原來是個「資產階級學者」，自幸級別不高，不久，楊絳便「升級」成了「資產階級學術權威」，還慶幸自己與和錢鍾書的層次一般。挨批，在楊絳筆下不全是難堪無法自恃之事，卻平白無故橫生幾分趣味，如她形容一次面對群眾的謾罵時，她膽敢公然頂嘴，惹的群眾勃然大怒，要她掛上發霉的木板遊街，她如此形容遊街的情形，並以一句「有體面的人」便道盡文人不懼威勢的風骨：

「當時雖然沒人照相攝入鏡頭，我卻能學孫悟空讓『元神』跳在半空中，觀看自己那副怪模樣，背後還跟著七長八短一隊戴高帽子的『牛鬼蛇神』。那場鬧劇實在是精彩極了，至今回憶，想像中還能見到那個滑稽的隊伍，而我是那個隊伍的首領…我忍不住要模仿桑丘·潘沙的腔吻說：『我雖然遊街出醜，我仍然是個有體面的人！』」<sup>132</sup>

面對殘暴的鬥爭，絕大多數受害者應然恐懼又緊張，但她卻總以自嘲的方式化解令人震懾的窘境。她形容自己爲了躲避紅衛兵而入女廁：「真沒想到女廁也神聖不可侵犯，和某些大教堂、大寺院一樣，可充罪犯的避難所。」<sup>133</sup>女廁固然是楊絳的避風

<sup>130</sup> 楊絳，《幹校六記》，頁 183。

<sup>131</sup> 楊絳，《幹校六記》，頁 184。

<sup>132</sup> 楊絳，《幹校六記》，頁 207。

<sup>133</sup> 楊絳，《幹校六記》，頁 194。

港，但經由掃廁所得到的某種扭曲的自由卻是以尊嚴換得，這種透過非人化對待之後被迫承受的自由，是無比沉重：

「我自從做了掃廁所的人，卻享到些向所未識的自由。我們從舊社會過來的老人，有一套習慣的文明禮貌，雖然常常受到『多禮』的譴責，卻屢戒不改。例如見了認識的人，總含笑招呼一下，儘管自己心上不高興，或明知別人不喜歡我，也不能見了人不理睬。我自從做了『掃廁所的』，就樂得放肆，看見我不喜歡的人乾脆呆著臉理都不理，甚至瞪著眼睛看人，好像他不是人而是物。決沒有誰會責備我目中無人，因為我自己早已不是人了。這是『顛倒過來』了意想不到的妙處。」<sup>134</sup>

在《丙午丁末年記事》記載的事件當中，不得不提的是楊絳翻譯的「黑稿子」《堂吉珂德》（Don Quixote de la Mancha）被沒收之事。在她變成「牛鬼蛇神」之後，革命群眾俘虜她翻譯的《堂吉珂德》，活捉了她筆下的「四個大妖精」，也將《堂吉珂德》妖魔化為「美化地主、醜化農民」的萬惡之作，稿子被無端地沒收，同時錢鍾書的無數筆記都被銷毀，足見一介文人在政治強權面前，是多麼的渺小無奈。直到下放幹校前夕，楊絳的學習組長主動將稿件還她，並親自交付予楊絳說：「快抱回家去吧！」此時再多詞彙也無法表達楊絳內心無盡的謝意：「落難的堂吉珂德居然碰到這樣一位扶危濟困的騎士！我的感激，遠遠超過了我對許多人、許多事的惱怒和失望。」<sup>135</sup>

### 第三節 「再現式」文革記憶敘事表現手法

就表現手法而言，誠如季羨林自認的「寫文章從來不說謊，現在把事情的原委和盤托出。」又如楊絳所言：「這裡所記的僅僅是這場大革命裡的小小一個側面。」楊絳之《幹校六記》與季羨林的《牛棚雜憶》無疑是作者欲真實呈現當時經歷的藝術作品，而「再現」（representation）作者自身的文革真實經歷。

---

<sup>134</sup> 楊絳，《幹校六記》，頁 196。

<sup>135</sup> 楊絳，《幹校六記》，頁 204。

所謂再現，首先碰觸到的即是真實性的問題，許多學者也曾質疑回憶錄型的文革敘事之真實性，然而，現象學大師杜夫蘭（Mikel Dufrenne, 1910-1995）認為，當作品的真實發生的同時，作品的真實便超乎作者的真實，即使不能等同於文革的實際，仍形成了一種「獨立的客觀論述」。<sup>136</sup>亦即，當季羨林、楊絳將自己親身的文革經歷表現於其作品之中時，當讀者認真酌量、品味其中意涵時，將自身置於具有意義的脈絡（meaningful context）下，去領會（apprehension）作者表達的初衷，作品本身便形成的真實的客觀的存在的再現，而非僅為作者偏頗的一己之見，更非能夠任由個別讀者任意解讀而消解。這樣的再現，不單是透過讀者對作者使用語言的詮釋即可完成，而是在本質上，文本對文革真實性發生再現其真實性的作用，再現的不是文革本身，而是文革具有其真實性的印象。以下歸納整理季羨林與楊絳在其文本中三個再現的特徵：第一，模糊化受害者與加害者界線；第二，對文革中生活細節的平淡回憶；第三，以他者之名隱藏控訴。從這樣的再現方式中，對文革的審視乃是來自於某種具有真實性的人物，並且是一個個關切自有不同的小人物，而不是從抽象普遍的道德論述，判斷或追究十年文革對錯的責任，或從客觀中立的法則，定義並解釋文革反映了什麼理論。不依賴理論或原則的敘事風格，反而使得文革的道德性顯得荒唐，具有一種在真實人性之外的不可批判性，一種絲毫不能再被容許進行任何自我辯白的空洞。這個空洞，是人性的空洞，比採用任何普遍價值對文革批判的努力，更能免於修飾或偽善，也就更令讀者感到真實。

#### 一、模糊化受害者與加害者之間的界線

相對於使用超越式的普遍觀點回憶文革，利用再現式的文革回憶敘事少了強烈的控訴、直接的指責、以及將受害者加害者一分為二的做法，或是將文革所有暴力罪惡的責任歸結到部分領導階級身上，相對地，再現式的文革回憶敘事著重描寫文革生活中的真實場景，刻劃大時代下的人物表現，並將受害者與加害者之間的界線模糊化，以嘲諷的語態描寫親歷的暴力對待，甚至敘述在文革中鮮有的人道溫暖。誠如季羨林

---

<sup>136</sup> Mikel Dufrenne 著，孫非譯，1987。《美學與哲學》（Esthetique et Philosophie）。台北市：五洲出版社。

在《牛棚雜憶》序文中說：「我自己在被打的『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的時候還虔信『文化大革命』的正確性，我焉敢苛求於別人呢？打人者和被打者，同是被害者，只是所處的地位不同而已。」<sup>137</sup>此種將受害者與加害者間界線模糊化的處理，如同楊絳在《丙午丁末年記事》中說道：

「不久後，得勢的革命派也打下去了。他們一個個受審問，受逼供，流著眼淚委屈認罪…曾幾何時，他們不僅脫去了狼皮，連身上的羊毛也在嚴冬季節給剃光了。我已悟到『冤有頭，債有主』；我們老傢伙也罷，革命小將也罷，誰也不是誰的敵人。反正我對革命的『後生』不再怕懼。」<sup>138</sup>

對當時曾迫害他們之人，楊絳並無特殊指涉者，甚至使用「披著狼皮的羊」來形容之。理應是生活上敵對角色的監管小組，她形容個個都是「披著狼皮的羊」，她甚至將自己與錢鍾書能夠挨過無數的批鬥，兩年後又安然從幹校歸來，歸結為是這群「披著狼皮的羊」的底護。有次，錢鍾書因為感冒引起嚴重的氣喘病，也受感染的楊絳為了照顧他不得不在會中缺席，楊絳同所的年輕人常為她轉述會中的內容，為此她感懷在心：「我如果沒有他們幫忙，我翻譯的《堂吉訶德》也不知得拖延多久才能譯完。關注和照顧我們的，都是丙午丁末年間『披著狼皮的羊』。」<sup>139</sup>這種對階級敵人身分的混淆，也表現楊絳與煤炭工人的互動當中：

「煤廠工人是認識我的。他們明知我是『牛鬼蛇神』，卻十分照顧。我下班趕到煤廠，往往過了營業時間，他們總放我進廠，叫我把錢放在案上，任我自取煤餅。有一次煤廠工人問我：『你燒得了這麼多煤嗎？』我說：『六天買七天的，星期日休假』，他們聽我還給自己『休假』，都笑了。往常給我家送煤的老田說：『乾脆我給你送一車吧。』他果然悄悄兒給我送了一車。我央求他給李健吾和唐棣華家也送些煤，他也送了。」<sup>140</sup>

<sup>137</sup> 季羨林，《牛棚雜憶》，頁2。

<sup>138</sup> 楊絳，《幹校六記》，頁213。

<sup>139</sup> 楊絳，《幹校六記》，頁216。

<sup>140</sup> 楊絳，《幹校六記》，頁190。

於此，一名工人與其階級敵人一下放幹校的楊絳就形成意外的調和關係，工人理應趁機鞭策、改造這名頑強的知識份子，卻一反常態地對她雪中送炭。這一切存於烏雲旁的金邊，成為構成楊絳文革回憶的重要片段。

就藝術內容而言，文革後早期的傷痕文學大多把挨批、上山下鄉、進幹校等看作是一場不堪回首的回憶，基調基本上是以受害者自居，並憤恨不平地向充滿愚弄人民、悖於人性的文革錯誤展開批判。在涉及個人受暴的暴力的回憶時，筆下的加害者往往是特定的指涉對象，書寫者對政治領導階層的「極左錯誤」更是深惡痛絕地躍於紙上，受害者與加害者的分類是一翻兩瞪眼的非黑即白。然而，季羨林與楊絳筆下的加害者，套句季羨林的話來形容，所謂加害者「至多只是非人，絕非畜生」。他自認：「我是一個有感情的人，寫著寫著，不禁怒從心上起，淚字眼中流，刺兒也來了，氣兒也來了。我沒有辦法，就這樣吧。否則，我只能說謊了…我實際上是不願意這樣幹的，爲了息事寧人，不得不爾。」<sup>141</sup>由此可見，受害者之傷從未消褪殆盡，但是季羨林與楊絳卻選擇將受害者與加害者間的界線模糊處理，幾乎也沒有在文中對任何人展開具名的反擊。<sup>142</sup>然而文革後楊絳返回外文研究所，季羨林復職爲東語系系主任，甚而晉升北大副校長等職。兩人都迅速恢復了文革前的文化地位，自是可以在文章中對當年的施暴者加以鞭撻，這所謂的「息事寧人」不僅代表兩人無意對加害者展開反噬，更是知識份子在遭逢劇變的文革時代洪流中，面對傷痛的一種超脫處理。

## 二、對文革中生活細節的平淡回憶與特色描寫

季羨林與楊絳兩人的文革回憶敘事，第二個特徵是面對生活細節的平淡處理，以及著重描寫文革生活特有的生活特徵。從「親手搭起牛棚」、「牛棚（一）~（三）」、「牛棚轉移」三部分的描寫記載牛棚生活，雖然篇幅不長，季羨林筆下的牛棚形象卻是相當寫實而清晰，而楊絳亦使用如此「再現式」的文革敘事，兩人在藝術表現上緊扣著的是週遭發生的種種看似平淡的瑣事，行文中流露的，莫不是對自身遭遇的解嘲，以

<sup>141</sup> 季羨林，《牛棚雜憶》，頁 196。

<sup>142</sup> 兩人在回憶文革的著作中，僅有一個道名批判的事例，爲季羨林在《牛棚雜憶》中對 1966 年北大北大校文革籌委會主任、校文革主任，及 1967 年新北大公社領導一聶元梓的批判，但是季老在文中也只出現一個「聶」姓爾爾。

及知識份子面臨改造的無奈。以下歸納兩人描寫的三大慣用素材：

### （一）勞動改造

文革時期倡導的學習，不只是文化知識，而是以技術為主的勞動教育。對於思想不純正的走資派，最直接的改造方法便是透過勞動，勞其筋骨，改其心志。一九六八年春季開始出現了季羨林筆下的「牛棚」。文革時期，成為填塞日常生活最重要的勞動改造，無疑是兩人第一個著墨重點。

季羨林參與的勞動包括跑步、耕作、搬運、建設（黑幫大樓）等等，面對所謂的勞動改造，季羨林以「折磨論」視之，他認為文革中所謂的勞動，目的不為了什麼崇高的教條，而只是為了折磨人而施之，而這樣的折磨只有一個目的，便是將人施以非人化的待遇，使受虐者痛苦難耐，也滿足革命小將們自身的虛榮感與復仇的快意。然而，季羨林告訴讀者，如此勞其筋骨的苦難，並無降大任於斯人，徒勞空乏其心，而無法收其「改造」的成效可言：「這種打著勞動的旗號折磨人的辦法，只是改造人的身體，而絕不會改造人的靈魂。如果還能達到什麼目的的話，我的自暴自棄就是一個最好的例證。折磨的結果只會使人墮落，而不能使人升高。」<sup>143</sup>

楊絳筆下的勞動工作則包括了掘井、種菜、建設（廁所）、養豬等等，面對勞動，楊絳沒有季羨林筆下的譏諷，但也不脫否定之意，如她在敘述掘井工作時也有對自方改造的感想：「平常總覺得污泥很髒，痰涕屎尿什麼都有；可是把腳採進污泥，和它親近了，也就只覺得滑膩而不嫌其髒……我暗暗取笑自己：這可算是改變了立場或立足點吧？」<sup>144</sup>由此看來，楊絳並非受到改造而轉變，而是「久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這觀點在《幹校六記》的最後一記「誤傳記妄」文中得到引證，當時楊絳夫妻倆將從幹校返京，雖然名單內少了其他「老弱婦孺」，但面即將對脫離幹校，她自認難掩欣悅之情，並且肯定自己這份私心：「改造十多年，再加幹校兩年，且說別人企求的進步我沒有取得，就連自己這份私心，也沒有減少些，我還是依然故我。」<sup>145</sup>

因此，季羨林與楊絳在經歷了知識份子的勞動改造之後，相當明白地告訴讀者：

<sup>143</sup> 季羨林，《牛棚雜憶》，頁 161。

<sup>144</sup> 楊絳，《幹校六記》，頁 21。

<sup>145</sup> 楊絳，《幹校六記》，頁 64。

若欲從勞動而使人發生思想上的質變，進行煥然一新的改造，著實困難。在這一點上，兩人不約而同地否定了此種勞動改造的成效。

## （二）污穢事物

再好乾淨之人，面臨到混亂骯髒的文革批鬥，難免沾染一身污穢，季羨林亦如此，他在文本中不僅毫不避諱自己在批鬥中遭受的暴力，也將過程中的污穢真實呈現出來，如他第一次陪鬥時遭人吐痰於左臉，他形容當時也只能「唾面自乾」了，而遊街時，「彷彿有一千張嘴向我吐著泡沫」，但當時自是無法抵抗。對於骯髒事物的書寫，楊絳更是明快直往，在「學圃記閒」一記中，她仔細地描寫建造廁所、蒐集肥料之事。在她筆下，廁所以及其中的堆肥並非令人無法忍受的骯髒之物，而只是一棟建築與一些可用之物，她甚至還利用麻繩替廁所編織了一道漂亮的門簾。而她筆下的愛犬「小趨」亦與豬隻相似，為求溫飽，會在廁所偷取人們的排泄物食用，面對小趨如此驚人的本能動作，楊絳僅是用「村子裡的狗，哪一隻不吃屎」道破：豬與狗並非是不潔的動物，與之相較，人的思想彷彿更為骯髒。

當一朵倔強的白蓮綻放在污穢之上時，其驚艷更耐人尋味。季羨林與楊絳在文革書寫中直面所有的污穢，彷彿將一代知識份子的冰清獨立告諸世人：再多的苦難都將洗滌自己的靈魂。

## （三）死亡意象

在藝術表現中，唯有「死亡」最能深刻地反映出生命存在的意義問題。意象是「寓意之象」，寄託了作者主觀思維的客觀事物，在兩人的文本中，死亡意象不單是死亡意念的呈現，如自盡，更包括了「孤絕」、「墳墓」、「屍體」、「地獄」等等的詞彙使用與場景編排。

首先讓季羨林透露出此種意象的是對牛棚氣氛的形容，他認為牛棚中的肅殺氣氛比起佛教中形容地獄的恐怖氣氛，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第二個是面臨批鬥之初，因痛苦無法自持而不禁聯想到各種自殺的片段，無論是飲毒、跳樓，臥軌、割脈、自刎、剖腹…等等都在他腦海中掠影閃過，令他「浮想聯翩，想入非非」：「有時候我想的非常具體，非常生動，我把死人想像得就像在自己眼前一樣。我彷彿看到了鮮紅的血流

滿屍體，可怕卻又具有吸引力。我知道，這絕不會給我帶來愉快，然而卻是欲罷不能……」

<sup>146</sup>此種想像死亡的狂熱，不僅讓他興起研究「自殺學」動機，甚至讓他慎重考慮該以何種方式、在何地何時自我了斷生命。

而楊絳在文本中，如本章第二節所述，楊絳在「學圃記閒」中一則提到某日埋於菜園東邊的無名男性，並對此墳展三番兩次的施以關注，一則是有次她勞動結束，夜歸獨行時遠眺自己的住所，因孤寂而衍生的死亡意象：「有燈光處，只有我一個床位，只有帳子裏狹小的一席地——一個孤寂的歸宿，不是我的家。因此我常記起曾見一幅畫裏，一個老者背負行囊，拄著拐杖，由山坡下一條小路一步步走入自己的墳墓；自己仿佛也就是如此。」<sup>147</sup>形容自己日常的歸途猶如走入人生的墳墓，更是栩栩如生的死亡偈語。

由是，季羨林與楊絳透過處理死亡之議題，在文本中呈現若干關於死亡的意象，事實上亦呈現出作者面對生命巨變的一種心理探索，自是文革經歷對一代知識份子的生命經驗、價值體系發生「斷裂」產生的投射聯想。雖然文革未使兩人隕落，但在文革中，兩人或許都曾擔憂自己的生命將走向於不幸，而對死亡有著較敏感而深刻的記憶。雖然宇宙間萬物更迭之事無法抗禦，但是身形的消亡何嘗又非意念的不朽的起端，因此，儘管死亡意象呈現的是沉潛與滅絕，但也或許是知識份子沉心暗修、回歸本心的歸屬，亦是面臨厄運、戰勝恐懼的重生。

以上三點，只是概括性地整理兩人文革改造時期的生活記載，尚有包括批鬥、暴力等題材呈現於文本當中，以上僅是以兩人相似的口吻，進行價值的呈現。重要的是，無論是關於勞動改造的記載，或是呈現出來的污穢及死亡意象，對於文革生活片段的真實性，季羨林與楊絳皆以文學的手法表現，前者多採記敘，後者專用散文，但都在文革回憶中以真實意象樹立典型，藉典型衍生字裡行間的真實，從真實際況擴散出無窮無盡的綿長意味供讀者尋覓。

### 三、以他者之名隱藏控訴

---

<sup>146</sup> 季羨林，《牛棚雜憶》，頁 68。

<sup>147</sup> 楊絳，《幹校六記》，頁 35。



季羨林與楊絳在其文本中的第三個再現的特徵，也是富饒意味的一點，是以「他者」之名而行使對文革迫害的控訴。於此，兩人不約而同地透過對周圍親友、甚至動物的關懷，在文中行使對他者看似無關自身的冷靜敘事，或是對他者的待遇投以熱切的關懷，其中不難窺伺兩人在書寫的過程中投射了的情感，並迂迴地、婉約地與文革暴力形成強烈的對比，將淚水滴進了字裡行間，徒留不甚明顯的淚痕容讀者讀者去細細感覺。如季羨林形容牛棚一名挨鬥者無力參與點名之事，就無意揮灑出行文間前所未有的感情：

「只有一件極小極小的小事，卻給我留下了畢生難忘的回憶…有一位西語系的歸國華僑教授，年齡早過了花甲，而且有重病在身，躺在床上起不來…他行將就木，根本不能勞動，連吃飯都起不來。就讓他躺在床上『改造』。他住的房子門外就是晚間訓話『罪犯』們排隊的地方。每次點名，他都能聽到自己的名字。此時就從屋中的木板上傳出來一聲『到！』聲音微弱、蒼老、淒涼，我每次都想哭上一場。這聲音震動了我的靈魂！」<sup>148</sup>

而楊絳對女婿得一因挨鬥而自殺的書寫當中，她雖不言恨，但也透露了情感上明顯的惋惜，她以女婿未能來送別為引，才帶出女婿已在一個月前自殺身亡，以及他是因不堪每日三回的鬥爭而自我了斷，不過卻沒有一句批判用語。女婿自是自家人，楊絳書寫心疼女婿受整自殺之事，順同藉此將自己區隔自在文革中「極左」的立場之外，連帶包含自己挨批並且下放幹校之事，也當然影射自己是革命精神的外人。自己是外人，不是什麼偉大的道德信奉者，所以不論文革是否有朝一日復甦，都與自己無關。

又如季羨林在「牛棚花絮」中記載著某位西語系的老右派學生，其文革前原本聰明伶俐，然而，無數的批鬥卻使他的精神受到莫大的損害，以致於成為流落街頭的傻子，連一名季羨林從未見過打其他罪犯的年輕工人，都能對他無所不用其極地拳打腳踢，對此，季羨林也施以相當沉痛的發洩：「我寫回憶錄，有一個戒條，就是：絕不去罵人。我在這裡，只能作一個例外，我要罵這個年輕的工人及他的同夥：『萬惡的

---

<sup>148</sup> 季羨林，《牛棚雜憶》，頁 129。

畜類！豬狗不如的東西！』」<sup>149</sup>

最後，這裡的「他者」不單專指人，連動物亦如此。在「小趨記情」中，「小趨」本與楊絳、錢鍾書有著情同血親的感情，卻被無法避免地因遷徙而斷了聯繫，於此，楊絳試圖告訴讀者當時「極左」思想上的侷限性與非人性，與其對應之下的種種作為，不管是對任何人或其他動物，都是場醜陋的錯誤。

文必真而感人，作者不必刻意抒發自己的價值，然此藉他者的書寫卻使讀者讀來處處有情，愈發撼動人心。綜觀《牛棚雜憶》與《幹校六記》，行文時而馥郁溫婉，<sup>150</sup>時而閃爍著諷刺的狡詰，勞動時雖蒼蒼莽莽，挨批時亦慘慘淒淒，甚至萌生對生命存在的疑惑，其筆下卻不明言怨意，至多是以關懷「他者」的方式抒發自己的惆悵之情，如此的傷痕處理方式，或許有著身分上不便明確言說的無奈，也或許是久經文化涵養薰陶和歷練人生經驗才能醞釀而得的了。

---

<sup>149</sup> 季羨林，《牛棚雜憶》，頁 148。

<sup>150</sup> 如楊絳認為，丙五丁末年同遭大劫的人，如果經過不同程度的摧殘和折磨，讓彼此加深了一點了解，就該算是那一片烏雲的銀邊或是金邊了。常言道「世間好物不固牢，彩雲易散琉璃脆」，就算是烏雲無法永遠佔領著天空，而停留在她記憶裡不容磨滅的，倒是那一道「含蘊著光和熱的金邊」。

## 第四章 「半超越式」文革記憶敘事—巴金、楊曦光

### 第一節 巴金、楊曦光之生平記事與其思想

#### 一、巴金

(一) 中學之前：官宦世家的大夢與破散(一九〇四年十一月～一九二〇年九月)

巴金，<sup>151</sup>一九〇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生於四川成都市，原名李堯棠，字芾甘，取自《詩經·南風》《甘棠》一詩之「蔽芾甘棠」，意即茂盛豐美之棠樹。

巴金自小生長在官宦世家，其曾祖父李璠、祖父李鏞及父親李道河皆任清朝縣官，一九〇九年父親李道河出任川北廣元知縣，五歲的巴金連同兩兄兩姐與父母同行，直至一九一一年武昌起義，父親才辭官與妻兒歸返成都。五歲開始，巴金白天隨私塾先生學習《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古文觀止》等傳統讀物，晚間則在母親帶領下讀起《白香詞譜》。母親溫柔的嗓音是他幼年時代唯一的旋律，童年時期的巴金就在母親滿溢的關愛中成長，「我每次回溯到我最遠的過去，我的腦子就浮現了母親的面顏。」。<sup>152</sup>巴金早年平靜安逸的生活在一九一四年遭到重擊，母親、二姐與父親相繼病亡，為家族中的權力關係投入了變數，而一九二〇年祖父辭世，更讓官宦世家卸去禮教的華裳，遺產的爭奪直接地揭露家族交相傾軋的醜態，勢力代替了公道，家財成了唯一目標，昔日溫馨的大家族已轉化為「專制的王國」。此時的巴金開始在盤石般沉重的禮教中掙扎，家庭經歷則成為日後其長篇小說《家》的題材，當年他僅十六歲。

若是凋敝的家庭生活使其失去依靠，那麼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便是鼓舞巴金重拾人生信仰的開始，自此，嶄新的社會生活取代了家庭生活。五四運動期間，無政府主義（Anarchism）以國際社會主義思潮之一的姿態傳入中國，恰好與國內反帝反封建的訴求達到一致，吸引了一批嚮往反對任何形式之強權、追求絕對個人自由的革命

<sup>151</sup> 「巴金」為最廣為人知之筆名，其它尚有佩竿、極樂、非子、黑浪、赤波、壬平、甘寧、亦鳴、李冷、鳴希、馬拉、春風、一切、李一切、餘一、王文慧、馬琴、歐陽鏡蓉、余三、余五、余七、黃樹慧（輝）、德瑞等。

<sup>152</sup> 李輝主編，2002，《巴金自述》，鄭州：大象出版社，頁99。

青年。巴金在這期間廣閱《新青年》、《每週評論》、《星期評論》、《少年中國》、《少年世界》、《北京大學學生周刊》、《星期日》、《學生潮》、《威克烈》等革命刊物，更著迷於克魯泡特金（Peter Kropotkin, 1842-1921）的《告少年》等文學作品。無政府主義，作為一種替代家庭溫暖的精神慰藉，一種與舊制的撕裂，一種嶄新而迷人的人生指引，將巴金的愛憎欲仇前所未有地串聯在一起，「從那時起，我才開始明白什麼是正義，這正義把我的愛和恨調和起來。」<sup>153</sup>

（二）中學之後：從革命之夢邁向文學之夢（一九二〇年九月～一九六六年八月）

祖父過世不久，巴金進入成都外國語專門學校就讀兩年。時值中國在二〇年代初期爆發之社會主義論戰，革命之夢席捲了滿懷理想的少年巴金，他參與了無政府主義革命濃厚的「適社」、「半月社」、「民眾」、「均社」，並著手相關刊物《半月報》、《民眾》的發行。他於《半月報》上初試啼聲，發表第一篇無政府主義理念文章《怎樣建立真正自由平等的社會》，此時亦是他自稱「安那其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之始。

《半月報》停刊後，他又陸陸續續與朋友合辦《警群》雜誌、《平民之聲》週刊，期間陸續創作新詩《被虐者的哭聲》、《路上所見》、《夢》、《瘋人》、《慚愧》、《喪家的小孩》，及散文《可愛的人》。一九二三年，巴金赴上海南洋中學就讀半年，隨後進入南京東南大學附中。求知若渴的青年巴金並不滿足於紙本上的知識，相反地，行動上的實踐卻是無時不吸引著他，當一九二五年上海發生「五卅慘案」，他焦急地想著：「我不願意再坐下來，安安靜靜地讀書…只要快一點給我一個機會做一點事情，盡一份力量，叫這奴隸來的、受苦的人民站起來，爭回他們的自由。你給我死也好，只是你不要使我這樣活著受罪，不要使我這樣無用地浪費我的青春。」<sup>154</sup>同年暑假高中畢業，罹患肺結核檢驗結果打擊了巴金攻讀北大的決心，他決定前往上海繼續宣傳無政府主義並參與編譯工作，與友人發行《民眾》半月刊，強調「民眾的利益，需民眾自己去謀」，並繼續翻譯無政府主義名著，如克魯泡特金《克魯泡特金全集第二卷》（法名 La Conquète du pain，又譯為《麵包略取》、《麵包與自由》）、蒲魯東（Pierre-Joseph Proudhon, 1809-1865）《財產是什麼》（《What is Property?》）等。

<sup>153</sup> 李輝主編，《巴金自述》，頁 132。

<sup>154</sup> 陳丹晨，2003，《巴金全傳》，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頁 42。

一九二七年一月，巴金在大哥的幫忙下赴法國留學，開始翻譯克魯泡特金的《人生哲學，其起源及其發展》（上冊），並參與編輯《克魯泡特金全集》，完成譯本《人生哲學，其起源及其發展》（下冊）與克魯泡特金的自傳《一個革命者的回憶》，與鄭佩剛、盧劍波、惠林一同創立《時代前》雜誌。在二〇年代國內的紛擾不安中——無政府主義與共產主義展開一連串激烈的論戰——巴金只得將自己的理想托付在紙本當中，在靜修中尋覓解救靈魂的出路。其中《人生哲學，其起源及其發展》更是強化了巴金的信仰，他深感真正的幸福乃存在於民眾之間，是與民眾共同為真理與正義的奮鬥中得來的。自此他把人類崇高的道德理想歸納為三要素：互助、正義與犧牲。儘管革命之夢在日後終未能實現，但是此種浪漫而熾熱的憧憬，卻是引領著他一生追求理想的原初驅力。巴金日後憶起這段近兩年的時光，無視於自己完成三十篇文章，譯有數十本無政府主義著作的成就，卻僅淡然地說：「結果我什麼也沒有學，連法文也不會唸好，只是毫無系統地讀了一大堆書，寫了一本《滅亡》。」<sup>155</sup>

巴金於一九二八年歸國回到上海後，於一九二九年出版第一部小說《滅亡》，這是署名巴金之始，亦是他對舊制度表明心意之作：他終究以豐饒的文學哲理取代了大哥對冀望他完成的興家立業。在另一個層次上，這無非是巴金以「文學之夢」取代「無政府主義式的革命之夢」的轉捩點，自此，巴金成為五四以降之文壇新秀，而非昔日那名「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的革命青年了，文字與寫作終於成為他代償性質的道德實踐。相較於中國無政府主義革命的滯緩不進，巴金於文學上的成就則日益卓越，一九三〇年代起，其作品有兩大主題：其一是描繪為理想獻身的寫實作品，代表作是《革命三部曲》（《滅亡》、《死去的太陽》、《新生》）、《愛情的三部曲》（《霧》、《雨》、《電》）等；其二是表達對中國傳統宗法制度的深悟痛絕，代表作有《春天裡的秋天》、《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巴金在四〇年代以迄的作品，批判性越趨和緩，以散文小品、寫實小說、記實遊記為主。不管主題為何，巴金皆用他誠摯而熱情的筆觸，寫出深厚的人道主義與現實關懷，更將溫潤的人道主義與堅貞的愛國情懷鎔鑄一脈。一九四九年七月起，巴金將這份理想融入文藝出版的終生事業，除文革黑暗時期，

---

<sup>155</sup> 陳丹晨，《巴金全傳》，頁 57。

他多次任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以下簡稱文聯）、上海文聯、中國作家協會（以下簡稱作聯）主席等職，成為中國當代文壇舉足輕重之人物。

### （三）文革之後：奔放不絕的激流（一九七七年四月～二〇〇五年十月）

文革結束後，巴金以沉痛的心境道出中國知識分子在二〇世紀所走過的歷程，寫作了五卷《隨想錄》，包含《隨想錄》、《探索集》、《真話集》、《病中集》、《無題集》。一方面總結文革為當代中國帶來慘痛的歷史教訓，一方面抱著「說真話」的準則，為自己一生經歷做出了總結：奮鬥就是生活，人生只有前進。文革的殘害並未使他對人生絕望，相反地，直至二〇〇五年臨終前，這一雙赤誠、睿智的眼睛仍持續對生活投注熾熱的目光：「生活並不是一個悲劇。它是一個『搏鬥』…我無論在什麼地方總看見那一股生活的激流在動盪，在創造它自己的道路，通過亂山碎石中間。」<sup>156</sup>

知識份子的沉潛與復出，向來是個艱難的抉擇，文革後重返文壇的巴金，在面對政治任務掛帥的雜務時，卻是抱著相對消極的態度。這非但僅是出於自己年事已高，力有未逮，更大程度是不願受「名人之累」的牽連，以及拒絕政治行動對知識份子獨立心智的銹蝕。所以他甚至認為自己非作家，而只是抱持著「講真話」的初衷，以無可遏止的浪漫情懷直書胸臆，在文學夢中實現正義、自由、甚至是藏匿革命意涵的烏托邦。因此，儘管一九七七年巴金恢復政治權力，一九八一年復出任職中國作協主席，一九八三年當選全國政協副主席，然而他卻在寫與友人信中透露心意：「…需要休息。因此我不想出席文聯的會，當然也只是想想而已。我也想過幾次：該退休了。」<sup>157</sup>巴金決然視寫作為終身志業，在文革後面對眾多職務邀約時更是消極地認為：「評獎會只要不找我去開會，不講話，掛個名是可以的。我的理想是關門寫作。」<sup>158</sup>

一九八三年，巴金已近乎耄耋之年，因病未能出席全國政協第六屆二次會議，往後巴金出席政壇、文壇公開場合的頻率銳減。諷刺的是，儘管他曾自嘲「長壽是一種懲罰」，九十年代以來更常年以醫院為家，並幾乎失去了表達能力，然而至二〇〇五年臨終時，卻仍駝負著中國作協主席之盛名。

<sup>156</sup> 陳丹晨，《巴金全傳》，頁 86。

<sup>157</sup> 陳丹晨，《巴金全傳》，頁 515。

<sup>158</sup> 前揭文。

相對於無意戀棧的諸多職務，對「中國現代文學館」、「文革博物館」兩館的倡議與推動，是巴金晚年備感興致的重要任務，前者已於一九八五年開幕，後者卻至今仍無法越過中國文革的政治禁區，建立涵蓋所有文革史料，成立全國性質的「文革博物館」。事實上，巴金早在一九八六年便提出興建「文革博物館」的構想，但至今僅有零星的陳列而無大規模的串聯，二〇〇五年一月，位於汕頭市澄海區蓮上鎮塔山風景區的文革博物館正式建成開放，是當地文革受害者籌建的文革博物館，而江蘇昆山的錦溪鎮亦有一所小規模的文革博物館，兩所主要館藏為文革期間的部分宣傳品。然而如此零星的史料集結卻是真誠有餘，但涵涉不足；對歷史之記載有之貢獻，卻無法銘刻出文革深厚的歷史維度。倘若川流因疾行而生動，燧石因相擊而生火，那麼世人怎能不為爭取文革博物館繼續努力呢？記憶便是歷史，中國興建文革博物館的停滯，不僅有違巴金之遺願，亦是對歷史的背叛。

## 二、楊曦光

### （一）中學之前：右傾家庭的命定磨難（一九四八年十月～一九六六年八月）

楊曦光，一九四八年十月六日生於吉林省敦化縣，正逢國共內戰中國共產黨由劣勢轉為優勢之時，故名小凱，學名曦光。楊曦光生長在共產黨高幹家庭，早年求學之途順遂無礙，入學前父親便聘請家教教育他《論語》等中國經典古著。背景使然，他自小對共產黨的崛起有濃烈的革命英雄主義式崇拜，然而，他卻從不以身為共黨高層高幹子女之「血統」為傲，反而始終與此優越感保持道德上的安全距離。

反右運動為楊曦光一家首次的磨難，一九五九年，楊曦光父親因批評大躍進而被劃分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被迫下放勞改，直到一九六二年的「復舊」風潮中才獲得黨中央的平反。一九六二年是楊家撥雲見日之年，父親恢復聲譽，同年楊曦光考取了全國重點中學：長沙一中。金榜題名本當是豐彩人生的開端，然而一九六二年的「復舊」卻讓他開啓更深沉的省思，思想與實踐愈發左傾。一九六四年，他主動追隨在省總工會工作的母親到湘潭錳礦參加社教運動，一九六五年初中畢業時，他甚至想

加入「四清」工作隊，<sup>159</sup>然而在父母堅持繼續教育的原則下，他於一九六六年考入長沙一中高中部，時值文革前夕。歷經文革幾端折磨掙騰，終而鑄就了日後著名的華裔經濟學者、海外異議份子「楊小凱」。

## （二）文革之後：再露鋒芒楊小凱（一九七八年五月～二〇〇四年）

一九七八年五月，刑滿釋放的楊曦光恰是而立之年，適逢政治鬥爭式微、社會秩序恢復而大有作為之際，但是文革殘毒仍不斷侵蝕著他的生活。楊曦光出獄後卻無人膽敢雇用這位著名的「反動人士」，報考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學實習研究員亦遭拒絕，因而他只得暫且蛰伏，等待時機。這兩年中，他先是在湖南大學數學系旁聽課程，接著在湖南新華印刷二廠當校對工。同時他做了重大的決定：恢復使用乳名「小凱」，將屬於文革革命時代的「曦光」深深隱匿起來，作為一種「覺今是而昨非」的告別儀式，亦是對自己革命之夢的保護。

一九八〇年，楊小凱再次報考中國社科院經濟學實習研究員，在社會科學院副院長于光遠的幫助下，終於獲得參加數量經濟學考試的機會，並被錄取為實習研究員。自此，經濟研究取代革命實踐，成為嶄新的人生命題。當時楊小凱僅有中學學歷，但勤能補拙，在社科院經濟學研究所的兩年當中，出版了《經濟控制論初步》，並發表了若干經濟相關的文章。一九八二年，楊小凱受聘於武漢大學，教授數理經濟學課程，此時出版了《數理經濟學基礎》和《經濟控制理論》兩本著作。一九八三年，他受普林斯頓大學經濟系錄取為博士研究生，在普林斯頓大學經濟系教授鄒至莊的幫忙下，才得到武漢大學校長劉道玉的同意，終於擺脫「文革盛名」而得以出國。一九八八年獲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博士，並在耶魯大擔任一年客座研究員。一九九〇年接受澳洲莫納石大學之聘成為經濟系講師，自此移民至澳洲，並定居墨爾本。一九九三年當選澳大利亞社會科學院院士。一九九八年擔任哈佛大學客座教授。楊小凱於二〇〇二、二〇〇三年兩度被提名諾貝爾經濟學獎，在新古典經濟學與超邊際分析方法的理論上更是出類拔萃，然而英年早逝，二〇〇四年因肺癌逝世，享年僅五十六歲。

楊小凱移民的抉擇與研究議題的轉移不代表他不再關切「中國向何處去？」相反

---

<sup>159</sup> 四清是指「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為1962年底始在農村推廣的左傾政治運動。



地，他仍不斷對中國境內政治民主、經濟自由及人權相關課題，投注敏銳而澄明的目光，提出諸多暮鼓晨鐘式的忠告。當中國境內著名異議份子任不寐發動《網絡公民權利宣言》時，楊小凱是第一個表達參與意願的學者，他甚至說：「您可以用我的名字簽署這份文件，我支持。」<sup>160</sup>

## 第二節 文化大革命中的巴金與楊曦光

### 一、巴金

（一）淪為「上海文學界最大的反動權威」（一九六六年八月～一九六八年十二月）

一九六六年八月，上海作協中的造反派對巴金展開攻擊，先是貼出批判大字報，不久巴金被關進牛棚—上海文聯資料室，從此開始了靠邊、檢查、匯報思想、挨批和強迫勞動的生活。最初一個月，他還有幸被歸為罪孽較輕微的一群，每日僅在作協中進行清潔工作即可。然而，年中後革命紅潮受到了更大的煽動，巴金淪為罪孽深重的反動權威，而成了全市造反派攻擊的眾矢之的。九月十日，上海作協中的造反派對他展開抄家、掠奪，本來巴金以為這是一次「保護性抄家」，無奈貼上的封條並未展現「作協已抄，不得再抄」的版權作用，上海各單位的造反派紅衛兵卻仍是恣意的破壞與強奪，當巴金之妻蕭珊告知作協時，卻只是換來「革命行動有理」的無情回應。從該時起，巴金真正地感到恐懼絕望，因為人身財產、生命安全皆遭到亂無章法的破壞，他只得「死心踏地做起『奴隸』來。」<sup>161</sup>

一九六七年一月風暴後，奪權之風刮遍全國，各機關中的舊幹部領導幾乎全面成了箭靶，巴金與魏金枝、王西彥等六人被遷出資料室，關進不滿五平方公尺的煤氣灶間，更被迫加入「遊鬥」的行列。直至一九六八年七月前，全國造反派紅衛兵惡性膨脹，巴金遭到批鬥的狀況愈發慘烈，先是《文匯報》發表文章《徹底揭露巴金的反革命真面目》、《鬥倒批臭文藝界反動「權威」巴金》，《解放日報》發表《徹底鬥倒批臭

<sup>160</sup> 任不寐，2004，〈楊小凱，站在李慎之與路德之間〉，取自 [http://www.boxun.com/hero/renbm/132\\_1.shtml](http://www.boxun.com/hero/renbm/132_1.shtml)。

<sup>161</sup> 巴金，2005，《隨想錄》，北京：作家出版社，頁278。

無產階級專政的死敵巴金》等多篇批判文章，甚至為此進行電視直播，舉辦《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徹底鬥倒鬥臭無產階級專政的死敵巴金電視大會》。直到一九六八年七月過後，毛澤東派遣「工宣隊」、「軍宣隊」進駐各機關，造反派紅衛兵受到壓制、揚棄。緊接而來的，是另一波下鄉勞動的風潮了。

## （二）勞動下放，痛失蕭珊（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一九七二年九月）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巴金遭下放到上海郊區松江縣的辰山農村。對一名六十四歲、長年寫作的長者而言，每日在烈日曝曬下割稻、翻地是萬分艱辛，每日收工時巴金總是筋疲力盡，步履蹣跚。隔年一九六九年九月份，他再度被分下放同一農村，勞動內容亦相似，只是這次還要學習毛澤東著作、語錄，以及標誌文革藝術的「革命樣板戲」。<sup>162</sup>

一九七〇年三月，巴金一行人移轉到上海郊區奉賢縣的五七幹校，該地集中了上海幾乎全部的文藝工作者。當時巴金首要工作是搭建蘆葦棚的宿舍，長期的勞動折磨，使他步伐維艱，所屬的幹校又位於沿海溼地，難友王西彥就曾回憶：「給我印象特別深的，是嚴冬的風雨之夜，開會也好，上廁所也好，在昏暗中一腳高一腳低地踩著泥濘而滑溜的道路，經常聽到有人摔跤的聲音，十有八九總是巴金。他的衣褲上，總是留著左一塊右一塊的泥印。」<sup>163</sup> 搭建宿舍外，他還需要運肥至菜園，常失手而濺得一身髒污。下放不意味著就能以勞動取代羞辱，巴金在農村及幹校勞動的歷程中，仍不斷地遭到幹部們的明批暗鬥，亦未能減少造反派紅衛兵們對巴金嚴厲的詆毀與攻擊。更有甚者，在一九六九至一九七〇年間，造反派和工宣部仍繼續更新整頓巴金的資料，並將他從「上海文學界最大的反動權威」升級成為「無產階級死敵」，聲稱應將他「徹底打倒、永遠打倒」。

在這段煉獄般的日子當中，由於失去妻子蕭珊（一九二一～一九七二年）的相伴，

<sup>162</sup> 「革命樣板戲」是文革期間被江青樹為樣板的特定戲劇，於一九六四～一九六六年間成型，為文革中唯一且最為鮮明的文藝標誌，特色在於樹立無產階級英雄人物之典型，原則為偶像崇拜式的「三突出」：「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因此「革命樣板戲」具有強烈的政治及時代意涵。其中劇目包含：京劇《紅燈記》、《沙家浜》、《奇襲白虎團》、《智取威虎山》、《海港》、《龍江頌》、《杜鵑山》，及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和《白毛女》等戲劇作品。

<sup>163</sup> 王西彥，1991，《焚心煮骨的日子》，香港：崑崙製作公司，頁204。

巴金唯靠自己手抄本—但丁的《神曲》在暗無天日的地獄中偶偶獨行：「從我這裡走進苦惱之城，從我這裡走進罪惡之淵，從我這裡走進幽靈隊，正義感動了我的創世主；我是神權，神智，神愛的作品，除永存的東西以外，在我之前無造物，我和天地同長久；你們走進來的，把一切的希望拋在後面吧！」於是，抱著走進地獄之門的決心，暫時將微薄的希望拋諸腦後，從「奴在心者」轉化為「奴在身者」，巴金終於明白：「我不是服從『道理』，我只是屈服於權勢，在武力之下低頭，靠說假話過日子。同樣是活命哲學，從前是只求給我一條生路；如今是：我一定要活下去，看你們怎麼收場！」。<sup>164</sup>只是他萬無意料到蕭珊終究並未能盼到他走出地獄之門，便先於文革而「收場」，決然棄他而去了。這肇因於巴金身分特殊，因此蕭珊不明的病情始終得不到任何診斷，當一九七二年八月，巴金費盡千辛萬苦將蕭珊送進醫院時，癌細胞早已失控蔓延，蕭珊入院後二十天便撒手人寰。蕭珊的逝世，無疑比文革以來的任何痛苦都令巴金難以消受，更令巴金此生從此陷入無盡的自責之中。

### （三）脫離幹校，獲得平反（一九七二年九月～一九七七年四月）

蕭珊逝世不久的一九七二年九月，工宣隊同意巴金得以脫離幹校，但命他仍需進入上海作協學習，不久後作協中的難友們紛紛從幹校撤退，巴金兩年半的幹校生活正式結束了。此時上級對巴金等罪犯的監督越為鬆散，他得以重新校譯屠格涅夫（Ivan Sergeevich Turgenev, 1818-1883）的《處女地》，及翻譯赫爾岑（Aleksandr Herzen, 1812-1870）的回憶錄。一九七三年七月，工宣隊領導宣佈對巴金的「結論」：「市委王洪文、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金祖敏、洪國柱六人討論決定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不戴帽子，發生活費，這是根據張春橋、姚文元指示的精神決定的。」自一九六六年市委將巴金打為階級敵人後，經過七年巴金總是盼到審查結論了，然而卻是沒有載明事理原委的結論，究竟是對敵人的寬厚處理抑或是對人民誤植罪行，都隻字未提。無論如何，這一平反總算恢復巴金的身分，使他脫離地獄而重回「人」的行列，巴金得以繼續從事正規的翻譯工作。一九七五年，巴金被作協分發到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六年十月新總理華國鋒將四人幫隔離審判；一九七七年，上海出版社新的領導代表

---

<sup>164</sup> 巴金，《隨想錄》，頁 280。

黨對巴金撤銷一九七三年實為四人幫對巴金發佈的結論。自此，巴金總算正式熬過文革一切的兇險關隘，恢復社會活動，更得以再次拾起筆，以血淚記載著自己的文革經歷，成就日後「說真話」的《隨想錄》五卷。

## 二、楊曦光

### （一）革命小將的鏗鏘鉅作《中國向何處去》（一九六六年九月～一九六九年十一月）

楊曦光進入湖南省長沙市一中後，在一九六六年九月升入一中高中部。文革一開始，他父母便遭湖南省委批為「反革命修正主義份子」，使楊曦光在學校中也被擋在官方性質的保守派紅衛兵組織之外，滿懷理想卻也萬般惆悵的楊曦光憤而支持了校內反對工作組的造反派，誓言與不公義的大環境對抗。他在一九六六年底積極地為工人造反派平反，並支持湖南第一個大規模的造反派組織——「湘江風雷」。一九六七年「二月逆流」發生時，多數造反派遭到武力鎮壓，楊曦光因支持「湘江風雷」而遭關押至長沙東北郊六棟里的省公安廳看守所——模範監獄，為期一個多月。

初嚐囹圄滋味的少年曦光並未因此一蹶不振，相反地，他出獄後開始著手投入「新思潮」之研究，<sup>165</sup>並在湖南鄉村進行社會調查，企圖尋求文革中群眾趨力的根源與造反派崛起的社會條件與論述基礎。他藉由重新詮釋毛澤東思想，對中國的政經結構進行一連串的論述，包括《中國城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調查報告》、《槍桿子裏面出政權》、《關於組織與建立毛澤東主義小組的想法》、《積極投入捍衛毛澤東主義純潔性的鬥爭》、《堅持和鞏固新思潮的方法應該改變》等等。楊曦光更於一九六八年一月中的《中國向何處去》揭示了所有問題真相：在中國共產黨執政了十七年後，百分之九十的高幹已形成了一個特權階級，這個「紅色資本家階級」成了阻礙歷史前進的一個腐朽階級，他們壓迫、剝削廣大的人民。中國政體已絕然偏離了法國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政體，<sup>166</sup>因此中國需要一次新的暴力革命推翻特權階級，重建嶄新的民主政體。而《中

<sup>165</sup> 根據文革專家宋永毅之分析，文革中的「新思潮」為一九六七年春夏之際興起的激進極左思想，因反對文革初期「血統論」之階級壓迫而生。包含三個明確的思想體系，第一為「打倒特權階級論」，再者為「徹底砸爛就的國家機器論」，第三為「階級關係大變動論」。

<sup>166</sup> 由於巴黎公社的政治組織和無政府主義的政治理想接近，是故部分學者認為楊曦光和省無聯的政治

國向何處去》則一舉成名為「省無聯」<sup>167</sup>的理論綱領。

如此尖銳的「異端思潮」很快地引來官方的掃蕩，在發表《中國向何處去》僅數日後，康生、周恩來、陳伯達、江青、姚文元等人於一月二十四接見湖南各派政治組織代表和湖南革委會籌備小組負責人時，批評《中國向何處去》實質是極右的「反革命」文章，並發布「砸爛反革命組織『省無聯』」的「一·二四指示」。楊曦光隨即於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度進了監牢，被關進湖南省長沙市左家塘看守所，度過一年多等待宣判的監禁生活。一九六九年秋，毛澤東視察湖南時對「省無聯」做出了毀滅性的裁示，他指出「省無聯的群眾是好的，其頭頭思想是壞的」，省無聯相關人士因而從風光的造反派淪為階下囚。該年十一月，楊曦光等人被押上卡車到長沙東風廣場的宣判大會，楊曦光胸前掛上「現行反革命，十年徒刑」的牌子，罪名除了寫《中國向何處去》一文外，還以「其父於一九五九年被劃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其兄其舅於一九五七年被劃為右派，其母於文革中『畏罪自殺』」作為楊曦光仇視黨的證據。犯行一宣判，楊曦光即從從嫌疑犯「正名」為階下囚了。

## （二）勞改之路與圜牆生活（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一九七八年五月）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楊曦光遭宣判十年徒刑後，於一九七〇年元旦被押送至岳陽建新農場進行勞改。在建新農場中，楊曦光與昔日看守所同伴周國輝、畢健、劉鳳祥、宋紹文等人一同分到第十大隊中，其一夥人的勞動任務是在湖洲上築堤，每日肩挑重擔，煞是辛苦，初入勞改隊的楊曦光說：「我的第一個印象是到了書上所說的『奴隸社會』」。<sup>168</sup>對此劉鳳祥對他安慰：「你以前沒在社會下層生活過，一九五九年的大躍進運動中，整個中國農村社會都是這個樣子，甚至更糟糕。」<sup>169</sup>劉鳳祥的安慰果真是一語中的，將楊曦光從優渥的上層社會回憶中喚醒，日後他更是體認到，中國農村社會在一九四九年後的多數時期與自己在勞改隊的生活差異的確不大。

---

理念基本上有著無政府主義的色彩。

<sup>167</sup> 湖南的「省無聯」全名為「湖南省會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委員會」，是部分在野的造反派人士於一九六七年十月成立的一個派系集合組織，是隸屬於革委會籌備小組下的次團體。「省無聯」包含了二十個來自各行各業的造反派團體，包含大學生組成的「高校風雷」、軍人組成的「紅旗軍」、中學生組成的「紅中會」、文藝人士組成的「文藝界紅色造反團」、中小學教師組成的「教師聯合會」及工人組成的「湘江風雷」（全稱為「毛澤東主義紅衛兵湘江風雷挺進縱隊」）等等。

<sup>168</sup> 楊曦光，1994，《牛鬼蛇神錄》，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頁121。

<sup>169</sup> 楊曦光，《牛鬼蛇神錄》，頁123。

一九七一年三月，建新農場中展開了「一打三反」的宣判大會，宣布「嚴厲打擊反革命活動，反對貪污、盜竊和其他刑事犯罪活動」，並當場槍殺了五名勞改犯。楊曦光在四月初即因「一打三反」而遭重新調查，隨即被押送至他一九六七年二月待過的「模範監獄」。再次進入模範監獄，楊曦光與四年前的境況卻大為不同。一九六七年二月，楊曦光於造反派面臨初次的挫敗而入囹圄，但當時自己與造反派朋友都相信會盡速獲得平反，一夥人還膽敢在監獄內絕食抗議，甚至自信滿滿地要求與當局談判，隨即不到一個月便被釋放。而一九七〇年四月的楊曦光，卻是在沿途「殺、殺、殺，殺出一個紅彤彤的世界」的標語中再次遭押送進模範監獄，此時亦是他第一次感到生存威脅——中央將死刑宣判權下放至省，而長沙當局兩度槍殺了將近數百名罪犯，其中半數以上是政治犯，更不乏楊曦光昔日在「省無聯」中的老戰友。隨時遭處決之恐懼時時縈繞在楊曦光心頭，使他更強烈地渴求著生存，直到四月底他聽聞中央收回地方的死刑宣判權才如釋重負，隔年開春前便離開模範監獄，重返勞改場了。一九七二年的復舊風潮過後，勞改隊中的緊迫盯人的風氣漸趨和緩。一九七五年底，勞改隊氣氛逐漸平和。按規定，勞改犯人刑滿前四、五個月必須移轉到「出監隊」，由出監隊幹部與犯人家鄉的公安機構共同決定犯人刑滿後的去向。楊曦光終於在一九七七年底進入「出監隊」，一九七八年五月刑滿後在妹妹的迎接下踏入另一段嶄新的生命。

### 第三節 「半超越式」文革記憶表現手法

就表現手法而言，巴金的《隨想錄》與楊曦光的《牛鬼蛇神錄》中，呈現同時揉和「超越式」與「再現式」之文革回憶敘述手法。一方面以超越式的普世觀點作為引導，秉持著特定價值論述對文革整體之是非功過進行評價，帶有強烈的批判意涵，同時將自身文革經歷安置於宏觀的歷史脈絡當中，直接引領讀者對文革有著全面性的參照，在這個層次上帶有第二章張戎、徐友漁兩人之「超越式」的觀點。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巴金、楊曦光卻又同時受文革中、文革後的際遇流轉所影響、羈絆，因而未能在文中從不涉及自身的角度進行關於文革責任的分析，因此未能完整呈現如張戎、徐友漁般完整而決斷式的「超越式」的普遍觀點，從而形成所謂「半超越式」的普遍觀

點的文革回憶。其次，在巴金的《隨想錄》、楊曦光的《牛鬼蛇神錄》中亦帶有猶如季羨林、楊絳文中「再現」(representation)的文本呈現，因此是謂較接近「超越式」而亦能與「再現式」有所參照之意象，形成本論文中文革回憶之第三種寫作策略。

此處必須闡明的是，第一，所謂「半超越式」普遍觀點文革回憶，僅是作為將巴金、楊曦光與第二、三章中四人之文本的參照比較，作為文革回憶中的另一種書寫分析，同時表明文革回憶絕非僅含「超越式」、「再現式」兩種鮮明的呈現，可能尚存有較接近其中一者，甚或揉合兩者及其它的選項，從而呈現出文革回憶錄之多變內涵；第二，在界定「半超越式」之普遍觀點時，不應將其侷限為「超越式」與「再現式」兩者之過渡詮釋，「半超越式」應僅代表巴金、楊曦光之論述基調呈現接近「超越式」的寫作模式，筆者將繼續對其可能的原因進行相關分析；第三，儘管三種文革回憶敘事手法有別，但不意味著三種觀點應有其優劣高下之別，而僅是文革回憶錄作者價值選擇之呈現，是立基於文革中、後之境遇更迭、身份流變而形成之敘述觀點；文革回憶錄的珍貴價值，端視作者因應其存在狀態而對知識內涵不斷調整的意義，以此概念出發，透過梳理其六人文革回憶錄之文本內容、剖析三種文革回憶型態之策略價值，呈現本論文對文革回憶分析之旨趣。

在釐清「半超越式」的普遍觀點文革回憶與其它兩者之界定後，接著歸納巴金、楊曦光兩人之「半超越式」的普遍觀點表現手法：一、「超越式」之普遍觀點；二、「再現式」之敘事手法。

## 一、「超越式」之普遍觀點

### (一) 巴金：「反對使人為獸」之人道關懷

「我明明記得我曾經由人變獸，有人告訴我這不過是十年一夢。還會再做夢嗎？為什麼不會呢？我的心還在發痛，它還在出血。但是我不要再作夢了。我不會忘記自己還是一個人，也下定決心不再變為獸，無論誰再拿著鞭子在我背上鞭打，我也不再進入夢鄉。當然我也不再相信夢話！沒有神，也就沒有獸。大家都是人。」

這段文字是《隨想錄》作家版代序，巴金發表於一九九三年七月十五日的新民晚報。巴金以這短短一百三十九個字，直接對文革經歷表達嚴厲的斥責，將人道主義化為正義之劍，刺向毛澤東、林彪、四人幫及直接施行暴力的造反派紅衛兵，以批判非人待遇作為捍衛受害者人性尊嚴的最後防線。

據此，巴金界定下的直接加害者為造反派紅衛兵，他稱他們「披上革命外衣走封建主義道路」，揚著個人崇拜的大旗形同宗教狂熱份子。他常困惑何以天真爛漫的中學生在文革中一舉變獸？造反派何以殺氣騰騰？這些問題時時縈繞巴金心頭：「在十載『文革』中我看夠了獸性的大發作，我不能不經常思考造反派怎樣成為吃人的『虎狼』」<sup>170</sup>「我常常在想，我已經繳械投降，認罪服罪，你們何必殺氣騰騰，虐待俘虜……人為什麼變為獸？人怎樣變為獸？我探索，我還不曾搞清楚。」<sup>171</sup>而在這些問題背後更核心的關鍵，如文革從何而來？造反派紅衛兵如何又為何崛起？因何而滅？文革的本質是什麼？遺憾的是，他最終還是沒有試圖對上述種種疑惑做出回答或形成更深刻的了解，他僅認為人道價值不應只有那些出身欠佳的造反派紅衛兵能夠爭取，如他這般在文革一開始便被「強迫為獸」的受害者亦應有追求人權的權利。然而，他卻忽略了造反派紅衛兵卻恰恰是與他一同站在「遭貶抑」這一個基準點上而奮起的，巴金的人道主義顯然不包含這些「獸」，更由於立場的對立，而將人道關懷的目光從造反派紅衛兵身上移開，因此巴金所持的人道關懷為有限度的人道關懷。

## （二）楊曦光：「反對任何形式政治迫害」的人道關懷

楊曦光一九六六年開始支持造反派運動至一九七八年脫離勞改隊，轉眼間他已在文革運動中輾轉沉浮十三年，這段經歷亦讓他從極左派革命的虔誠信徒蛻變為透析中國革命本質的新古典經濟學家。猶如同為紅衛兵的張戎與徐友漁，他們在文革中皆從滿腹熱情的陽關大道走進抑鬱難申的死胡同，也透析了毛澤東對待群眾本質上從來就是恣意而無情的操弄：

「在經歷革命的騷動，有過被剝奪社會地位的痛苦經歷，受過汗辱和羞恥

---

<sup>170</sup> 巴金，《隨想錄》，頁 514。

<sup>171</sup> 楊曦光，《牛鬼蛇神錄》，頁 464。



後，秩序和理性的恢復對我來說像是雨後的陽光。我像所有參加過革命的舊日貴族子弟一樣，在秩序和理性恢復時，感到深深的愧疚——為我過去革命的狂熱，但又為自己父母和家族在革命中被顛覆的身份而悲憤。這場『革命』沒給任何人帶來好處，但卻使我家破人亡——父親被關在『毛澤東思想學習班』，母親被逼自殺，兄妹被趕到農村勞動。」<sup>172</sup>

縱使革命風潮消逝，革命熱情褪去，甚至他在日後學術研究議題已渾然轉移，人們幾乎快遺忘那名屬於革命年代的中學生楊曦光，然而文革經歷卻讓他誓言：「不管將來發生什麼事情，我一定不能讓在這片土地上發生的種種動人心魄的故事消失在黑暗中，我要把我親眼見到的一斷黑暗歷史告訴世人，因為我的靈魂永遠與這些被囚禁的精靈一起。」<sup>173</sup>

楊曦光對革命也表達了出於人道主義的關懷，這關懷不同於巴金對於自己「由人變獸」的嚴正抗議，而是出於共產黨對政敵殘忍的迫害，以及共產黨在文革中一切的倒行逆施及對人民思想的鉗制，當中最重要，便是嚴正駁斥共產黨輕易地把人以簡約的「地、富、反、壞、右」邏輯便打為二等公民，甚至非人化的政治謬誤：

「回想文革前，我心目中的一九四九年的革命是那麼美好和神聖，那時我的父母和家庭是這場革命的受益者，我們全家人都充滿著征服勝利的自豪感，今天我才看到了革命另一面，多麼殘酷，多麼沒有人性，沒有理性，這是千萬人的生命和鮮血堆砌起來的一場災難阿。」<sup>174</sup>

在《牛鬼蛇神錄》裡，楊曦光表達對共產黨鎮壓政敵的殘酷行徑的強烈的譴責：

「我想起一九六二年或一九七二年的復舊，它們都帶來了理性和繁榮，但卻總是伴隨著對政敵的殘酷鎮壓。難道共產黨的秩序和繁榮總要以對政敵的殘酷迫害為基礎嗎？我再也不是共產黨秩序的既得利益者，經過十年的

---

<sup>172</sup> 楊曦光，《牛鬼蛇神錄》，頁 177。

<sup>173</sup> 楊曦光，《牛鬼蛇神錄》，頁 307。

<sup>174</sup> 楊曦光，《牛鬼蛇神錄》，頁 152。

勞改，我看見那麼多高貴的人成為共產黨秩序的犧牲者，共產黨殘酷地迫害如此高貴的人，我再也不會單純地熱愛那建立在殘酷迫害基礎上的秩序和繁榮。我相信對政敵的殘酷迫害是共產黨政權永遠難以穩定，不斷造成動亂的根本原因。」<sup>175</sup>

而至於纏繞他一生的課題——中國向何處去、中國何時能帶來真正的穩定與繁榮，楊曦光則認為：「中國政治最後穩定下來的一天，必是這最後一批被迫害的人被解放的一天。」<sup>176</sup>值得注意的是，此處「被迫害的人」的直接指涉雖為文革中的造反派，及諸多地下革命份子，<sup>177</sup>但追根究底仍是肇因於共產黨對政敵粗暴無情的暴力對待，因而此迫害非僅指陳於特定人物本身，更為所有受政治暴力迫害之所有受害者，因此詮釋之人道基礎較巴金稍寬厚。

## 二、「再現式」之敘事手法：藉由對他者之描寫呈現作者對文革的價值取向

### （一）巴金藉追憶親友抒發情感

巴金在《隨想錄》五卷中追憶了諸多良師益友及親屬，甚至包括所養之小狗，以標題為準計二十三名，其中在蕭珊、雪峰、靳以、方之、老舍、小狗包弟、烈文、越丹、矛盾、方令儒、丰先生、滿濤、均正等十三人的篇章中，巴金透過對親友文革遭遇的側寫表達出沉慟決絕的悲憤情懷，間接道出他對文革殘害的強烈控訴，以及對文革中自身言行的懺悔。於此僅代表性地列舉他對摯友老舍、道友黎烈文、愛妻蕭珊之懷念；老舍是巴金於三〇年代結識的莫逆之交，黎烈文是與巴金同為魯迅追隨者之道友，蕭珊則是與巴金結縭二十八年的髮妻，其中共同的悲劇是三人恰恰皆因文革而殞落。

<sup>175</sup> 楊曦光，《牛鬼蛇神錄》，頁 305。

<sup>176</sup> 楊曦光，《牛鬼蛇神錄》，頁 306。

<sup>177</sup> 如楊曦光在 1997 年出版的《Captive Spirits》中闡明：「此書僅獻給劉鳳祥、張九龍及我的父母」。劉鳳祥、張九龍兩人皆地下反革命份子，在 1930 年「一打三反」的整肅當中先後遭判處死刑。判決中劉鳳祥被指稱組織反革命組織「中國勞動黨」，張九龍則被指稱為「反革命集團首犯」，楊曦光認為其二人是一代右派知識份子中最傑出的人物，他們代表著這一代人中積極反抗共產黨政治迫害的努力。這是在中文版《牛鬼蛇神錄》中前所未見的一段話，代表著楊曦光對其兩人革命精神無窮盡的讚賞與緬懷，亦是能代表所謂的「captive spirits」概念中之靈魂人物。

老舍（一八九九～一九六六年）是巴金三〇年代結交的摯友，兩人同為五四運動後新文學的重要代表，然而一九五一年這位被尊為「人民藝術家」的新文學作家卻在文革時淪為「反動權威」。在文革暴力中，身心靈的折磨擊垮了他的生存意志，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夜，老舍於北京西城太平湖投水自殺。巴金能記得的，只是老舍死前一個多月兩人於北京見面時，老舍對他說「請告訴朋友們，我沒有問題。」<sup>178</sup>對老舍孤苦離世的遭遇，巴金在《隨想錄》中投以萬般的同情：

「我不相信鬼，我也不相信神，但是我卻希望真有一個所謂『陰間』，在那裡我可以許多我愛的人。倘使我有一天真的見到了老舍，他約我去吃小館，向我問起一些情況…我會緊緊握住他的手，對他說：『我們都愛你，沒有人會忘記你，你要在中國人民中間永遠地活下去！』」<sup>179</sup>

巴金與黎烈文（一九〇四～一九七二年）結識於一九三三年，當時黎烈文擔任《申報》副刊《自由談》的編輯，因黎烈文向巴金邀稿而識。巴金談起這段友情時，認為兩人對文學與政治的看法雖非完全一致，「但是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感情，就是對魯迅先生的敬愛。」<sup>180</sup>在文革期間，魯迅作品遭到史無前例的揚棄，連帶著黎烈文也淪為「反動文人」。但是即使在那個人人自危的局勢中，巴金在奉命批判魯迅以及其友人時，仍堅持道：「根據我所知，黎烈文並不是反動文人。」<sup>181</sup>巴金認識的黎烈文向來是謙遜溫謹的知識份子，這一點，是即使在文革中不斷「自我反省」、自認「提早靠邊」的巴金亦無法否認的。文革中巴金對黎烈文的萬般袒護，非單僅是出於友情基礎的護短行為，更是文革中有著難言之隱的巴金對時局不滿的呈現。文革結束後，巴金透過對黎烈文的懷念，緬懷五四時代知識份子勇於為時局發聲的情懷，並為自己的獨善其身做出懺悔；另一方面在道德情感上間接批判了文革時代中，當局對知識份子萬般詆毀的歷史謬誤。巴金，在某種程度上亦等同黎烈文，他試圖告訴讀者，在揭發政治正確的反智浪潮中，藐藐書生，三尺微命，智識份子又能保有幾分的風骨呢？

---

<sup>178</sup> 巴金，《隨想錄》，頁 139。

<sup>179</sup> 巴金，《隨想錄》，頁 141。

<sup>180</sup> 巴金，《隨想錄》，頁 172。

<sup>181</sup> 巴金，《隨想錄》，頁 170。

若說巴金對老舍、黎烈文之歿萬般同情，那麼痛失蕭珊，便是讓他徹底批判文革暴力之最大動因，更令他此生從此陷入萬劫不復的自責之中。一九七二年，蕭珊久病而沒，使得巴金陷入無盡的哀慟：

「她不想死，她要活，她願意改造思想，她願意看到社會主義建成。這個願望總不能說是癡心妄想吧。她本來可以活下去，倘使她不是『黑老K』的『臭婆娘』。一句話，是我連累了她，是我害了她。」<sup>182</sup>「我多麼害怕她離開我！我甚至願意為我那十四卷『邪書』受到千刀萬剮，只求她能安靜地活下去。」

183

《隨想錄》非但是晚年巴金歷時五年之鉅作，更是一代知識份子對文革喜悲愛憎之淬煉，與其畢生一切甘於其中或情非得以之「生存之道」。巴金藉《隨想錄》中對十三名親友之緬懷，秉筆直書之外，人道色彩盡現，真知灼見藏於其中，而再不能增損一字。

## （二）楊曦光藉獄友良師明辨事非

楊曦光在一九六八年因《中國向何處去》被捕，判刑前他在左家塘看守所待了一年許，遭判十年徒刑後他又被移送至監獄與勞改隊，前後歷經十餘年的監牢生活，《牛鬼蛇神錄》記載的就是他在看守所、勞改隊、監獄的經歷及其獄友。以《牛鬼蛇神錄》之標題為準，包括羅鋼、盧瞎子、張九龍、向土匪、紅色怒火、栗異邦、聯動份子（程德明）、聖人君子（李牧師及陳老師）、舵手（劉鳳祥）、逃跑犯（傅子庚及劉桂農）、賓師傅、余總工程師、劉震宇、宋導演、黃文哲、黃眼鏡、勞動黨員（侯湘江）、演說家（龍才早及楊桃年及沈子英）、何老師、王師傅、盧師弟、王醫生、解放軍囚犯（李金培及蕭民生）等共計二十八名獄友。

在《牛鬼蛇神錄》中，楊曦光在與社會底層人士互動後，從而承諾自己不願再當既得利益者，他藉由與不同罪刑的政治犯進行討論而了解文革中群眾運動的工具性，更藉由對獄友之觀察與刻畫而道出自己的價值判準。是以在這十年當中，他逐漸拼湊

---

<sup>182</sup> 巴金，《隨想錄》，頁16。

<sup>183</sup> 巴金，《隨想錄》，頁22。

出文革之具體輪廓，從而透析革命殘酷的本質，以及針砭共產黨不合理的產權、戶口制度。這些來自不同階層的獄友在不同程度上成為他的良師益友：張九龍遭弑事件讓他親眼見到地下組織面臨多麼嚴苛的環境，及瞭解文革動亂為共產黨政權帶來的益處；盧瞎子教導了他私有財產權的合理性；毛火兵的言談中，有著極端保守派對紅色江山的捍衛及對造反派的殘忍；向土匪教育他保守派與造反派之間的傾軋爭鬥是出於暴力報復，而非政治意識形態上的差異；程德明將毛澤東支持紅衛兵比喻成慈禧支持義和團般，是為轉移焦點而作出失去理智的政策；賓師父認為毛澤東與林彪的傳承關係形同康熙傳承雍正模式的再現，表面上名正言順實際上暗潮洶湧；楊曦光在劉震宇身上看到了勞改最成功的典範；他親身經歷被內賊宋導演揭發之震撼教育；他從劉成宇和建妹子的愛情悲劇中深刻體會到農村戶口制度的缺點；他從與劉鳳祥的深談中了解文革發生要追溯至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運動，是為避免「史達林肅反效應」。這些獄友猶如一面三稜鏡，巧妙地折射出楊曦光自身面對不同議題的種種樣貌。

在《牛鬼蛇神錄》中諸多人物與相關的議題領域中，張九龍及劉鳳祥堪稱代表著楊曦光心中的革命典範，一來楊曦光感佩兩人投入地下反革命組織的勇氣，甚至為此犧牲赴義；二來兩人在楊曦光暗無天日的囹圄生活中，扮演著重要的啟蒙者的角色，讓他從中窺伺文革之具體輪廓與革命動因，其中包括：1、文革秩序的混亂反倒有利於共產黨鞏固政權；2、文革之成因與「反右運動」、「大躍進」有著直接相關，一九五九年「大躍進」後，毛澤東為了避免黨內要角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如彭德懷般據此倒戈相向，為了拯救自己被動、不利的政治處境，因而提出「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口號，著手辦理解放軍運動、革命化運動及社教運動，不僅助於轉移政敵焦點，更能奪回政治主導權，而文革為此一努力的延續。3、毛澤東利用「在朝右派」（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與「在野右派」（被劃分為「右傾機會主義份子」的人民）這一個歷史誤會打擊政敵；4、群眾不過是領導者操弄用以取得政治權力之工具；5、最後兩人都指出劉少奇垮台後，毛澤東與林彪將發生利益衝突，林彪將成為毛澤東之頭號政敵。最後第五個論點尤其值得探討，因為楊曦光當時乍聽之下雖大感詫異，但卻也不提出任何懷疑甚或反駁，顯然地，這可能是作者挾帶著「後設」意涵「再進入」文革

回憶時所不自覺呈現的寫作結果，本身帶有著「超越式」的色彩，更為《牛鬼蛇神錄》中「超越式」、「再現式」的混合呈現。

綜上所述，巴金與楊曦光之「半超越式」文革脈絡下，即使持人道關懷再進入其中，卻因十年驟變，而不約而同地形成不同程度之人道關懷判準，與張戎、徐友漁已截然有別，因而形成趨近「超越式」之「半超越式」寫作策略。與此同時，兩人卻又透過「再現式」的手法引導讀者進入其側寫他者的脈落中，藉他者吐己言，這些不一而足的側寫，卻同等真實地反映作者對文革的透析與價值取向，因此完成較接近「超越式」而亦能與「再現式」有所參照之第三種寫作策略。

## 第五章 三種文革回憶寫作策略之身份意涵

在第二至四章分別介紹六位作者之生平、文革經歷與文革回憶表現手法後，緊接著，本章將進一步分析在「超越式」、「再現式」與「半超越式」三種文革回憶寫作之分類框架中，從「文革角色」、「作家國籍」、「寫作身份」、「出版地區」四個向度上分別進行身份意涵上的詮釋，從中透析鑲嵌於作家身分意識上而成之文革回憶，首先形成下表之分類：

表 5.1: 寫作三式與四個分析向度的理解

寫作三式	作家	文革角色	作家國籍	寫作身份	出版地區
超越式	張戎	老紅衛兵	華裔英籍	自由作家	香港、英國
	徐友漁	造反派	中國籍	中國學者	鄭州
再現式	季羨林	受害者	中國籍	中國學者	北京
	楊絳	受害者	中國籍	中國學者	香港
半超越式	巴金	受害者	中國籍	中國學者	北京
	楊曦光	造反派	華裔澳籍	自由作家	香港、美國

緊接著，先需說明的是四個分析向度的設定：

一、「文革角色」指陳的是這些作家們在文革當中的角色身份，分為老紅衛兵、造反派紅衛兵（簡稱造反派）、受害者。其中的老紅衛兵，是指以鮮明的血統論為胎記的中學生階級隊伍，特別是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澤東檢閱之前成立的紅衛兵，承襲文革研究中約定成俗之名稱而來。造反派紅衛兵則是專指一九六六年十月過後因「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而起，以「平反」、「平等」為旗幟之造反派，為廣義的造反派。<sup>184</sup>所謂受害者，則是指狹義的直接受害者，意即非紅衛兵，同

<sup>184</sup> 廣義的造反派泛指文革中一切以打破既定秩序之群眾組織，此處採行之。本定義不同於印紅標區分紅衛兵運動中的「造反派」，他在〈紅衛兵運動的主要流派〉一文中將紅衛兵區分為四個派別：老紅衛

時在文革當中遭受批判之黑九類，他們對文革並無絲毫「有意義」的參與感。<sup>185</sup>

二、「作家國籍」是書寫者進行寫作、發表文革回憶作品時，其所屬國籍。本文分為華裔與中國兩者。

三、「寫作身份」是作家進行寫作、發表文革回憶作品時，其實存的寫作屬性狀態。

本論文中分為「自由作家」及「中國學者」兩者。自由作家直接指涉為文革寫作中的「中國本地外之自由作家」，因研究領域的迥異而略過其學者身份，如楊曦光在歸納上即為自由作家，而非（經濟）學者。

四、「出版地區」係指作家發表文革回憶作品之地，因初版發行地點具特殊指標意義，因此本論文中專指初版地。本文中出版地大抵沿著中國本地/香港/國外而別。

從以上四個分析角度的具體內容出發，以下三節分別耙梳文革回憶中「超越式」、「再現式」與「半超越式」寫作之身份意涵，並進一步將每一種策略中的兩位書寫者以此四個向度區別開來，進行同中求異的比較研究。最後，試圖比較三種寫作身份與其對應之文理表現，以透析其中蘊含的身份策略與其特定的歷史脈落。

## 第一節 「超越式」論述之身份意涵

### 一、文革角色

#### （一）張戎：不畏矛盾而投身為老紅衛兵

四川成都四中於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六日成立了紅衛兵隊伍，出身良好的張戎形容自己的加入不僅出於自願，更是樂意至極。雖然九月時，張戎父親即因任四川省委宣

---

兵、保守派、造反派和極左派，當中的造反派即為狹義的造反派。事實上，造反派分立而生，極左派即從造反派脫胎而來，是「新思潮」脈絡之一，然極左派對整體政治、經濟、社會的徹底批判，是為與造反派最大的不同。本論文中將極左派歸納為廣義的造反派，是基於其反抗、反壓迫、反特權的原則上而來。

<sup>185</sup> 文革雖然牽涉到極度殘酷血腥的集體暴力，但是受害者與加害者之分別存在著諸多曖昧的「灰色地帶」，為了避免過度簡化造成事實的扭曲，因此筆者僅以「狹義受害者」標誌部分在文革歷程中幾乎是全然遭受鬥爭之黑五類，此等之人在文革中並無任何有意義的參與，文革對其而言僅是一場全無可取之處的夢魘。筆者並非認為其餘人士不屬受害者之範疇，甚至，廣義而言，毛澤東及四人幫之外所有文革參與者都可以被視為受害者，此處之「狹義受害者」，是基於分類上的需要而形成。畢竟同為二十世紀的文明浩劫，文革當中受害者與加害者的辨識度遠不如德國納粹屠殺猶太人，因此對文革中受害者與加害者的分類，實屬危險而不易。有關大浩劫中，受害者與加害者間「灰色地帶」的深入探討，可見 Primo Levi 著，李淑珺譯，2001，《滅頂與生還》，台北：時報出版社。



傳部副部長而成爲造反派攻擊目標，受到省領導的短暫隔離，然而，此等矛盾並無損她加入紅衛兵隊伍的決心，「儘管這幾個月來在學校、家裡發生的事使我覺得厭惡和恐懼，但我從來不會想到要怪文化大革命和紅衛兵…毛主席在我心中是個神，我是想也不敢像他會錯的。」<sup>186</sup>因此，她在九月下旬便毫不猶豫地加入這支象徵革命精神的光榮隊伍。

## （二）徐友漁：以理論實踐革命理想的溫和造反派

文革初始，「家庭出身」無不鉗制著徐友漁對文革的實踐意義，使他受拒於成都市一中內的老紅衛兵隊伍，甚至連配戴毛主席徽章的政治權利都被剝奪，對此他深感不滿。但一九六六年十月「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運動興起，群眾運動得到了莫大的鼓舞，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被歸之爲「讓群眾自己解放自己」，使他認知到：「人民要重新做人，這既是發自內心的要求，又是毛主席革命路線代表的真理。」<sup>187</sup>於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他終於投入校內造反派的陣線：加入了「紅野」而開啓將近三年的崢嶸歲月，直至一九六八年中旬過後，中央對各地的文革運動進行一連串的指導與掃蕩而止。面對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六八年初群眾間殘暴而粗鄙的文攻武鬥惡習，他是決然不予以認同的，而是認爲群眾運動應由自身對革命理論的透析出發，方能理解群眾間價值與利益的分歧。據此，文革中他雖爲負責文宣工作之造反派，但卻寧可當個睿智卻溫和的理論家，而非煽動人心的蠱惑者。

## 二、作家國籍

### （一）張戎：華裔英籍作家

張戎於一九七九年於英國約克大學攻讀語言學，至一九八二年取得語言學博士後，也成爲英國白金漢大學（University of Buckingham）、華威大學（University of Warwick）、開放大學（Open University）的榮譽博士。其後她因結識了歷史學者 Jon Halliday，<sup>188</sup>兩人於一九九一年結婚，從此始有英國國籍，同時被動地放棄了中國籍。

---

<sup>186</sup> 張戎，《鴻》，頁 239-240。

<sup>187</sup> 徐友漁，《驀然回首》，頁 90。

<sup>188</sup> Jon Halliday 出生於愛爾蘭都柏林，畢業於英國牛津大學，曾是倫敦國王學院（King's College Lond）之訪問學者，專精於俄羅斯史、語言、文學。並與張戎在二〇〇五年出版合著《Mao: The

<sup>189</sup>現與 Halliday 定居於倫敦西部的諾汀山 (Notting Hill)。此一國籍身份，無疑為張戎得以對當代中國政治的投以批判的直接條件。

## (二) 徐友漁：中國哲學學者

一九七八年三月，睽違正式教育已十二載的徐友漁終於進入四川師範學院數學系，更因表現優異而於一九七九年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其後雖前往英國牛津大學攻讀當代西方語言哲學，但自一九八八年夏季歸國後，即任中國社科院哲學研究所之研究員至今。他研究專精於當代西方哲學，回國後致力關注當代中國當代的現實議題，對此轉折，他自認與自己的文革背景有關，「文化革命一開始我是非常狂熱的，但很快就醒悟了，感覺上當受騙了。上當受騙總要問個為什麼，所以在接下來的十二年裡，我一直在讀書，非常刻苦地讀書，試圖尋求答案。」<sup>190</sup>此種追尋，是基生於斯長於斯的浪漫情懷，更重要的是，他瞭解「一頁歷史遠大於一卷邏輯的重量」，文革影響歷歷，穿過層層時序，其中的始末因果在他心中是逐漸澄明清晰了。

## 三、寫作身份

### (一) 張戎：海外自由作家

在寫作身份上，張戎之《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寫作於一九八九至一九九一年，於一九九二年於香港出版，中英文版本之寫作發表時序幾乎等同。張戎雖為海外自由作家，並多次在書中對西方的自由、平等、人權發出深切的讚嘆，甚至她在批判共產極權時更是不遺餘力，<sup>191</sup>但她也毫不掩飾地承認對中國濃烈的情感認同：“I love Britain, I’m very happy here but I feel perhaps my heart is still in China.”英國公民的身份，是為追求自己所需的生活而來：“I don’t pass judgment on the British, people always look for a better society.”<sup>192</sup>英籍的張戎，如此不對英國社會作出任何價值判斷，卻懷抱

---

Unknown Story》(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

<sup>189</sup>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9，當中國人民加入外國國籍之時，「即自動喪失中國國籍」。

<sup>190</sup> 〈徐友漁關注平等與公正〉，2005，《南方人物週刊》，取自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rwzk/20051019/gg/200510300039.asp>

<sup>191</sup> 在《Mao: The Unknown Story》(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中，她從中蘇關係、政治謀略、成長背景、愛情態度等內外觀察對毛澤東作出了全面性質的劇烈批判。

<sup>192</sup> 張戎的兩個回答來自 HarperCollins 在 2007 年對她進行的採訪內容，取自 [www.readinggroups.co.uk](http://www.readinggroups.co.uk)

著對中國文化、血統上的情感，在赤腳行過文革的千山萬水後，遙望遠方。

## （二）徐友漁：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學者

徐友漁之文革回憶錄《驀然回首》發表於一九九九年，以滄桑文學之方式呈現。作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著名研究學者，現實身份卻無不挑戰著學術獨立的可能，尤其是從事文革研究及秉持自由主義的兩個堅持：「在相當長時間，我在社科院是很紅的人，被認為學術前途無量。但後來，因為我的研究方向，因為我的一些不合時宜的立場，我成了個邊緣人物」。<sup>193</sup>

徐友漁的專業領域雖為當代西方哲學，但是中國作為安身立命的選擇，卻也是他最終的關懷對象，

「我可以成為一個很優秀的學者——事實也如此，甚至在國內當某個領域的學霸，然後在世界範圍內，相當於英國牛津的一個講師。但問題是牛津不需要我這樣的講師，我這樣的講師西方多的是。而對我最終的抱負所在——中國的現實和未來，我離得又遠了點。我需要和中國的現實更近一些。」<sup>194</sup>

正是基於對專注與執著，此等「邊緣人物」更是屢屢突破現實身份的羈絆，犀利地剖析各派紅衛兵崛起之因、興衰過程與其幻滅覺醒，<sup>195</sup>真誠地對文革時代中的個人謬誤懺悔：「我中學時有個對我很好的校長，在文革期間，被整得死去活來，工作組通過我來整她，我扮演了非常不光彩的角色。後來，我就覺得必須找到她當面道歉。但是拖來拖去，當我真的回到四川找她時，她已經去世了。這是我終生的遺憾。」<sup>196</sup>

## 四、出版地區

（一）《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中文版《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發表於

<sup>193</sup> 徐友漁，〈徐友漁關注平等與公正〉。

<sup>194</sup> 徐友漁，〈徐友漁關注平等與公正〉。

<sup>195</sup> 關於對造反派紅衛兵的研究內容，見徐友漁，1999，《形形色色的造反》，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sup>196</sup> 徐友漁，2005，〈徐友漁關注平等與公正〉，《南方人物周刊》，期 21，取自 <http://www.nanfangdaily.cn/rwzk/20051019/gg/200510300039.asp>。此等對文革中不當行為懺悔在其著作中屢見不鮮，本文之外，尚可見徐友漁，2007，〈懺悔是絕對必要的〉，2006 年度十佳華人公共知識份子文集—徐友漁文集，取自 [http://blog.sina.com.tw/2006\\_ten\\_best/](http://blog.sina.com.tw/2006_ten_best/)。此外，筆者與之進行訪談亦有談及相關問題，他直接了當地說：「我做了很多錯事。」見附錄《徐友漁訪談稿》，2006，頁 2。

香港，由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出版；英文版《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野天鵝：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發表於英國倫敦，由 Simon & Schuster Adult Publishing Group 出版。

（二）《驀然回首》：發表於中國，由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 五、「超越式」寫作樣式之身份策略

### （一）對文革身份的切割、保護與療慰

使用超越式的普遍觀點，亦即一反對任何形式暴力的人道價值，再進入文革，如此無非是為了在更宏觀的層次上理解文革產生的原因和意義，進而形成對暴力、不公的道德批判。張戎與徐友漁為先後興起的老紅衛兵與造反派紅衛兵，兩人對自身派系的暴力行為都表達了高度的厭惡感、冷漠與逃避的心態，在回憶上而有「斷裂」的跡象。<sup>197</sup>透過能超越特定價值的觀點「再進入」文革，其道德正當性已經決然超越了任何出身、階級與派系，而形成具有普世觀點的人道關懷。兩人選擇從不涉及自己的角度進行關於文革責任的分析，從而不必受限於文革時的角色，藉此視野作為道德新起點與論述根基，呈現作者在事過境遷後，宣告對政治愚弄的拒絕，安全地揮別了過去的謬誤，療慰了逝去的不枉青春。誠然，在紅衛兵的文革回憶中，不可避免地必須面對不忍卒睹的片段，如何穿透時序空間對記憶的阻隔與破壞，在普遍價值的道德盔甲的支持下正面回顧自己的文革角色，治療文革創傷，是一代紅衛兵撰寫回憶錄時的重要課題。

### （二）基於現存身份的有意識選擇

此種寫作策略出自兩種身份上的需要，一則來自前述之「文革身份」，一則又受「現存身份」的影響。張戎自一九七九年前往約克大學攻讀語言學始，自此至今長居於英國，更於一九九一年取得英籍，是為得以暢所欲言的現實條件，這也可以作為何以《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在香港之外的中國遭查禁的理解。《鴻》一書在中國的政治尺度上，僅可趁隙飛入香港，而絕滅於其他地區。香港因其獨特的地理位置、

---

<sup>197</sup> 詳見第二章第三節之「二、以普遍式觀點進行超越式的文革回憶：人道價值與自由色彩」，頁 35-43。

殖民背景與社會文化意識而成爲特殊的政治區塊，在言論、出版方面，是爲海外異議份子絕妙的政治庇護場所，亦是西方知識界用以窺探、交流中國之橋樑地，除兩者之外，徐友漁之例提供了另一種可能，可由其文革研究出版境況觀察。包括《驀然回首》一書，徐友漁關於文革之相關「主要科研成果」<sup>198</sup>與出版單位有下：（以標題爲準共十七筆，按時間先後排列）

- 1、〈西方學者對中國「文革」的研究〉，香港：《二十一世紀雙月刊》，1995。
- 2、〈再說「文革」中的造反派〉，香港：《二十一世紀雙月刊》，1996。
- 3、〈告別「文革」〉，北京：《青年報刊》，1996。
- 4、〈「文革」群眾運動的虛偽性〉，香港：《亞洲周刊》，1996。
- 5、〈「文化大革命」中紅衛兵行爲動因的調查和分析〉，香港：《中國社會科學季刊》，1996。
- 6、〈「文化大革命」三十年祭〉，深圳：《焦點雜誌》，1996。
- 7、〈關於「兩個文革」說〉，香港：《中國研究》，1996。
- 8、〈「文革」中紅衛兵的派別鬥爭〉，香港：《中國研究》，1996。
- 9、〈異端思想和紅衛兵的思想轉向〉，香港：《二十一世紀雙月刊》，1996。
- 10、〈知青經歷和下鄉運動〉，北京：《北京文學》，1998。
- 11、〈紅色年代的恐怖〉，香港：《華夏文化》，1998。
- 12、《1966年：我們的那一代的回憶》，北京：中國文聯，1998。
- 13、《遇羅克：遺作與回憶》，北京：中國文聯，1999。
- 14、《形形色色的造反》，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9。
- 15、《驀然回首》，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
- 16、〈西方學者視野中的中國紅衛兵〉，河北：《社會科學論壇》，1999。
- 17、〈懺悔是絕對必要的〉，廣州：《南方週末報社》，2000。

除了第六筆之《焦點雜誌》出版於廣州深圳、第十筆之《北京文學》與第十二、

---

<sup>198</sup> 含編著論文、專業著書、報章雜誌三類，於此一概而論其發行地。參考自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取自 <http://philosophy.cass.cn>。

十三筆之「中國文聯出版社」於北京出版、第十五筆之「河南人民出版社」於河南出版、第十六筆之《社會科學論壇》於河北出版、第十七筆之《南方週末報社》於廣州出版，其餘九筆著作之出版單位舉凡《二十一世紀雙月刊》、《亞洲周刊》、《中國社會科學季刊》、《華夏文化》皆於香港出版發行。值得一提的是，《青年報刊》雖為北京發行，但其一九九五、九六年間的文革專題（含徐友漁〈告別「文革」〉一文）在九六年五月遭勒令停止。徐友漁作為著名之自由派中國學者，除社科院之「主要科研成果」，更是多次於香港《二十一世紀雙月刊》、《開放雜誌》、中發表文革相關論述。<sup>199</sup> 其中在〈文革研究從西方回到中國〉一文中，他不僅認為文革研究的重鎮已回到中國，更點出香港中文大學作為文革研究基地之重要性。香港，作為一個中國本地之外，言論、出版相對自由之特殊的政治區域，而成為中國學者對國家敢言直諫之地。在海外異議庇護所、中西文化橋樑之外，構成香港的第三種意義。

## 第二節 「再現式」敘事之身份意涵

### 一、文革角色

#### （一）季羨林：「從未忘記十年浩劫」之狹義受害者

文革前季羨林為北大東方語言文學系主任，是北大眾所矚目之教授，但自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季羨林遭新北大公社抄家起，至一九七三年三月接受「恢復組織生活，留黨查看二年」的決議止，歷經了近六年的文革殘害。期間不僅捲入抄家、陪鬥、批鬥、遊街，甚而與其他牛鬼蛇神一同搭起牛棚，再自行入甕。在經歷一連串無情的攻訐後，他自認「在批鬥的煉獄中已經接近畢業，應該拿到批鬥實踐學的學士證書了。」

<sup>200</sup>如此詼諧自嘲不表示全然釋懷，輕描淡寫不代表渾然無謂。走過文革，他除了表明「從未忘記」之外，亦在《牛棚雜憶》謝辭第一句即闡明「這一本小書是用血換來的，是和淚寫成的。能夠活著把它寫出來，是我畢生的最大幸福，是我留給後代的最佳禮

<sup>199</sup> 如 1992，〈文革中的異端思潮說明了什麼〉，《二十一世紀雙月刊》，期 73，頁 152-155；1993，〈武鬥的結束，懷疑的開始〉，《二十一世紀雙月刊》，期 80，頁 150-152；2005，〈繼承巴金和超越巴金〉，《開放雜誌》，期 227，頁 90-91；2006，〈關於「兩個文革」的爭論〉，《開放雜誌》，期 233，頁 59-61；2006，〈文革研究從西方回到中國〉，《開放雜誌》，期 233，頁 48-50。

<sup>200</sup> 季羨林，《牛棚雜憶》，《牛棚雜憶》，頁 97。

品。」

## （二）楊絳：「見了新奇世界」之狹義受害者

楊絳在文革前為中國科學院外文所研究員，卻在一九六六年八月被打為「資產階級學術權威」，一腳踏入了「curiouser and curiouser！」<sup>201</sup>的新奇世界，任憑挨批、遊街、剃陰陽頭，甚而連翻譯中的《堂吉珂德》譯稿都遭沒收。其後於一九七〇年七月下放河南息縣東岳幹校，一九七二年三月才得以回京。在近七年的文革風暴中，蹉跎一路，備感辛酸，然她卻都巍然不動，自認問心無愧，在驟雨狂風之後，凝神端視烏雲旁的一抹金邊。

## 二、作家國籍

### （一）季羨林：當代中國之國學鴻儒

季羨林之學問通古識今、學貫中西，深厚的學術基礎不僅奠基於其於宗教、文學、哲學領域的長年耕耘，他亦是中國少數通達梵文、巴利文、吐火羅文之當代學者，於二〇〇六年受中央視評為「感動中國」的人物。作為當代國學的精神指標，他自認「愛國不敢人後」，於一九五〇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並先後擔任民盟北京市委和中央民盟的領導工作，同時也是中國共產黨黨員。他就這般站在民族情感與知識使命的基調上，將東方文化、印度文化和西方文化鎔鑄一爐，觀察人類文明長河之更迭消長。

### （二）楊絳：心懷文化中國之中國作家

若說季羨林之愛國精神為中國文化與當代黨國的結合，那麼楊絳之愛國情懷則落實於為戀家、愛鄉、熱愛文化中國之濃烈情感。此情可由《幹校六記》之「誤傳之妄」一記中直觀而得：

「我想到解放前夕，許多人惶惶然往國外跑，我們倆為什麼有好幾條路都不肯走呢？思想進步嗎？覺悟高嗎？默存常引柳永的詩『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我們只是捨不得祖國，撇不下『伊』…解放以來，經過九

---

<sup>201</sup> 楊絳，《幹校六記》，頁 184。

蒸九焙的改造，我只怕自己反不如當初了。」<sup>202</sup>

愛己所選，執著而忠誠，此種根源於戀家、愛鄉的逍遙精神卻是無時不引領楊絳穿越混濁世道、乖舛命途，而終能在精神上保有皎白無垠的天地，恣意馳騁。

### 三、寫作身份

#### （一）季羨林：學術、行政兼籌並顧之中國官方學者

季羨林之文革回憶錄《牛棚雜憶》草稿寫作於一九八八年三月~一九八九年四月，一九九二年六月定稿，出版於一九九八年。期間他擔任國民主同盟中央文化委員會副主任(一九九三)，同時又身兼北大副校長、東語系主任、校務委員會名譽副主任等職，更是擔任過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南亞研究所所長、中國外文文學會副會長、中國南亞學會會長、中國語言學會、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全國人大代表、中國外語教學研究會會長、全國人大常委等職。其中行政職務與學術研究並列，毫不遜色。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季羨林從學術研究上的專業出發，不僅勤於譯品創作，更是身兼多類中央行政專務，於此而有官方學者之寫作身份。關於名利，季羨林曾說自己不虞之譽紛至沓來，再多也只是累贅罷了，然而，工作卻已經成了自己的痼疾，「想要改正，只有等待來生了。」<sup>203</sup>這位慣以沉默、思索的國學大師，在拒絕「作家」、「一代宗師」之盛名後，輕聲說著：「我是北大教授，東方學者。足夠了。」<sup>204</sup>又緩步踏上「任重道遠」的學術之途了。

#### （二）楊絳：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學者

楊絳之文革回憶錄《幹校六記》起筆於一九七二年回京後，於一九八一年出版。迥異於季羨林，楊絳始終與國家行政職務保持距離，而獨鍾外國文學研究與散文寫作。與政治學習或是龐雜的職務，甚至功勳獎項相較，楊絳卻是十足嚮往恬靜平淡的書齋生活，以及和諧的家庭生活。在丈夫及女兒相繼過世後，她仍維持深居簡出的生

---

<sup>202</sup> 楊絳，《幹校六記》，頁 61。

<sup>203</sup> 季羨林，《季羨林說自己》頁 59。

<sup>204</sup> 〈個性嚴謹 季羨林拒絕「一代宗師」稱號〉，取自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book/2006-08/11/content\\_4949684.htm](http://news.xinhuanet.com/book/2006-08/11/content_4949684.htm)



活，但透過《我們仨》娓娓道出深沉地寂寞：「一家三人就此失蹤了。就那麼輕易地失散了…家在哪裡，我不知道。我還在尋覓歸途。」<sup>205</sup>這「家」是以錢鍾書、楊絳、錢媛此一幸福國度為核心的家，是心靈永恆的棲宿，而再不得受絲毫的侵擾毀棄，包括愛國的信念。<sup>206</sup>

#### 四、出版地區

（一）《牛棚雜憶》：發表於中國北京，由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出版。

（二）《幹校六記》：發表於中國香港，由三聯出版社出版。

#### 五、「再現式」寫作樣式之身份策略

（一）用熟悉的語言訴說著荒謬的文革經驗

季羨林與楊絳在文革中有著一樣的文革角色：狹義的受害者的身份，他們透過「再現式」的文革回憶敘事表現手法呈現了此一身份意涵，使作品的真實超乎作者的真實，作者不言其經驗中所有的荒謬，文革巨獸卻透過宛如他者的敘事牽引出來，而無損作者文革經歷客觀性與深刻性。再現式的作品引領著讀者徜徉具有特殊意義的脈絡之中

，讀來不難領會作者表達的初衷。自然、優雅地處理了受害者的身份，幾乎不著痕跡地道盡箇中滋味——何其狂熱、殘酷、不堪、低劣的荒謬篇章，更能烹煮出酸苦嗆鼻的人生風味。這是基於文革身份上的需求，沿著熟悉的語言而生，奠基於兩人謙和恭良的行事風格，以溫婉平和的敘述呈現時而暗喻，時而嘲諷的語句，甚至敘述在文革中鮮有的人道溫暖，而非暴虎馮河式地與那段荒謬搏鬥，去明言是非，論斷功過。無論是季羨林對勞改大院牆上「掃蕩一切牛鬼蛇神」的字跡賞析、肯定施行暴力訓練了體力、批鬥發言鍛鍊詭辯的技巧、武鬥提升了人們的勇氣；楊絳亦藉由描寫其對「正名」的重視——特意精心製作自己與丈夫的罪牌，爾後兩人不禁相視而笑，或是對遊街隊伍

---

<sup>205</sup> 楊絳，2004，《楊絳作品精選·散文（二）》，北京：人民出版社，頁133。

<sup>206</sup> 《幹校六記》中，就呈現「愛家」與「愛國」兩個信念的衝突，但楊絳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前者。即將脫離幹校時，她難掩欣悅之情，而自認「私心未減，依然故我」。

的肯定—自認是隊伍首領而自稱是「有體面的人」。

兩人的回憶錄，再再提供了觀察文革的線索，透過平淡描寫文革生活中的真實場景或生活細節，銘刻大時代下的人物表現，亦為作者的文革身份作出最自然不過的再現。再現是寫實的，是逗趣的，諷刺的，但都不經意地引領著讀者走一趟荒謬旅程，而不禁笑中有淚。此等不經意，維持了作者寫作的一貫風格，以熟悉的語言巧妙安排了受害者的角色再現。

## （二）「再現式」的空白：來自現存境況的取捨

除了上述對於文革身份的處理之外，此一再現還有著現存身份上的表達意涵。「人生識字憂患始」，文革，大抵是季羨林人生中唯一一段後悔身為知識份子的時期。文革過後，他迅速恢復文革前的身分，其後更是仕途暢達，自認「並不缺少報復的能力」，<sup>207</sup>楊絳亦返回外文研究所，兩人皆重拾文革前的文化地位，卻僅以「再現」的手法娓娓道出大時代的一個側面，而形成獨立的客觀論述，這一客觀立場，不服從於道德需求，不是為批判而生，而是基於寫實臨摹的精神與客觀再現文革的目的而來。為了不著痕跡地將荒謬經驗完整托出，所以再現。這無關乎文革後的報復或清算，而是對歷史經驗的維護，以及在現存意義上做出的取捨，誠如季羨林所說：「我寫的是歷史事實，我們『文化大革命』前的友誼，以及『文化大革命』後的友誼，我們都要加以愛護。」<sup>208</sup>如此書寫不僅代表兩人無意對當時的加害者展開反噬，更是知識份子在遭逢劇變的文革時代衝撞後，面對傷痛的一種超外的處理。

在此意義之上，兩人不同程度地抹去了受害者與加害者之間界線，而僅以「他者」之名隱藏控訴，這也呈現了加害者與被害者的辨識過程中，存在著曖昧不明的複雜面向。季羨林同意「打人者和被打者，同是被害者，只是所處的地位不同而已。」<sup>209</sup>卻以前所未有的情感描寫某位重病挨鬥者無力參與點名之事；楊絳更是強化文革中自身感知的一切人道精神，稱革命群眾為「披著狼皮的羊」。此種處理，是季羨林認為的「為了息事寧人，不得不爾。」<sup>210</sup>而有其難言之隱，一則又帶有楊絳式的堅毅與灑脫：

<sup>207</sup> 季羨林，《牛棚雜憶》，頁 197。

<sup>208</sup> 前揭文。

<sup>209</sup> 季羨林，《牛棚雜憶》，頁 2。

<sup>210</sup> 季羨林，《牛棚雜憶》，頁 196。

寬容是門藝術，遺忘是種能力，空白是文革經歷的濃烈呈現。

## 六、「再現式」與「超越式」寫作樣式之身份策略較衡

從文革角色出發，「超越式」寫作中鑲嵌著一代紅衛兵幻滅、覺醒的心路歷程，以「批判」意涵濃烈的「超越式」普遍觀點再進入文革，詳加分析文革動因、過程及結果，呈現紅衛兵對革命精神從崇拜到渾然斷裂的覺醒，從而完整呈現文革殘酷而荒謬的本質。兩位國籍相異的作者在實存身份上透過地理位置、政治意涵特殊的自由香港而有巧妙的交會，一位僅於香港出版文革專著，一位則是大量於香港發表文革相關著述。而「再現式」敘事則是文革受害者基於現存意義，淡化了受害者與加害者的界線，藉超然度外的方式處理傷痛，以溫婉平和的一貫筆觸道出經驗實景，用熟悉的語言訴說著文革的荒謬經驗。「再現式」從側面書寫，「超越式」從正面論斷；前者著重臨摹，後者重批判；前者態度是詼諧輕快，後者則是堅決明確。在文革回憶的呈現上，兩者具有無法比擬相較的真實性與深刻度，在身分策略的意義上除深受文革身份及實存身份的影響，也突顯出某種個人的決斷。

## 第三節 「半超越式」寫作之身份意涵

### 一、文革角色

#### （一）巴金：視文革為一場浩劫之狹義受害者

文革時代中，巴金是狹義之受害者，這位文革前的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作聯主席、中國作家代表團團長，在六旬之時，一九六六年不幸淪為「上海文學界最大的反動權威」，直至一九七七年才獲得正式的平反。文革之於巴金，約莫是血淚交織的十年一夢，這場惡夢令他不由自主地成為「獸」，「我只是屈服權勢，在武力下低頭，靠說假話過日子。」<sup>211</sup>不難發現，日後總是再三提醒自己「說真話」的巴金，對文革是如此深惡痛絕。

#### （二）楊曦光：懷抱理想主義之激進造反派

---

<sup>211</sup> 巴金，《隨想錄》，《隨想錄》，頁 280。

與之相較，楊曦光的文革初期經歷卻是滿載革命式的熱情，他奮起於右派之家，爲了跟隨黨實踐革命理想，誓言與不公義的劣勢抗衡，即使因支持造反派而銀鐐入獄，但革命的絢麗光榮卻是籠罩著這名熱情的中學生，對中國社會階層、文革成因的深層探討，更是直接催生了醒世鉅作《中國向何處去》。即使他在囹圄之中從理想主義者蛻變爲務實主義者，然十年文革卻讓他留下了龐大的人生資產：犀利澄明的政經視野、不屈不撓的生存決心與適應能力，鑄就了日後的一代經濟學大師楊小凱。

## 二、作家國籍

### （一）巴金：中國愛國學者

愛國情懷，是貫穿巴金思想中的重要一脈。不論是安全上遭日軍侵襲的中國，政局上風雲跌宕的中國，文革後百業待興的中國，他都投注了熱切赤誠的眼光，並將他對國家的愛，實際地反映在作品之中，由此相應於時代的要求與人民的呼聲：反帝、反封建與對改革、平等、自由、幸福、愛之呼喚。他雖不至於全然置個人生死於度外，卻常懷國家興亡之任。如此堅貞的愛國情懷，終其一生從未有絲毫的改變。

### （二）楊曦光：華裔澳籍作家

楊曦光方面，無庸置疑，出國經歷是他極爲重要的生命轉捩點，包括一九八三年到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攻讀經濟學博士學位，及一九九〇年受澳洲莫納石大學之聘成爲經濟系講師。若是從楊曦光到楊小凱代表著思想上研究範疇的轉移，與畢生事業的開端，那麼從中國的楊曦光到澳籍的楊小凱更是具有鮮明的政治身份意義：爲了保持學術研究的相對自由環境，爲了馳騁於知識真理的自由國度，而選擇了澳籍，同時被動地放棄了中國籍。

## 三、寫作身份

### （一）巴金：身兼多職之中國官方學者

在寫作身份上，巴金之《隨想錄》創作於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〇年代，於二〇〇五年十月出版，期間他多次擔任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副主席，上

海市政協副主席等職，雖然巴金不慣以作家、學者自稱，但在寫作身份的界定上仍為中國官方學者無誤。在此寫作身份的影響下，其文革回憶仍維持其一貫的基調，由對愛與幸福之人道呼喚發聲，揭開苦痛難癒之文革舊傷，而形成感懷而忿慨的回憶敘事，卻少了對文革本身更為精確、宏觀的分析視野，僅由百篇鞭不及腹的散文呈現。誠然，他在《隨想錄》中的自述說道：「可以說，這五卷書就是用真話建立起來的揭露『文革』的『博物館』吧。」<sup>212</sup>然而，他晚年倡議的兩大館之一的「文革博物館」至今卻未能越過中國文革的政治禁區，一座能銘刻出文革深厚的歷史維度的博物館，一部真誠而全面性質的記載，在現實上不僅缺席，在《隨想錄》中亦未能有完整呈現。

## （二）楊曦光：暢所欲言之海外自由作家

楊曦光之《牛鬼蛇神錄》創作於一九八五年普林斯敦大學攻讀博士期間，中文本《牛鬼蛇神錄》於一九八八年完成，一九九四年出版；英文本《Captive Spirits: Prisoner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於一九九一年完成，一九九七年出版。期間歷經他留學於普林斯頓大學，受聘為莫納石大學經濟系，在寫作身份上為海外自由作家。楊小凱雖歸為澳籍，但在他的研究範疇中，除經濟學理論之外，最常出現的是中國政經濟改革的相關議題，甚至包括兩岸關係的探討。這代表著楊小凱對中國熱切的關懷，始終沒有因國籍轉換而有所削弱。雖然國籍代表著作為公民的在政治義務上的效忠標的，卻不完全代表著文化傳統的母體與情感上的身份認同對象。事實證明，楊小凱同楊曦光一般，其畢生關注的焦點，始終有著「中國向何處去」此一重要命題，而從未離棄。

在海外自由作家的狀態條件下，他終能在文革回憶錄中暢所欲言、大展襟抱。其筆觸之鋒銳、批判之直接、對革命之熱情，在在是《隨想錄》中前所未見的。轉瞬間，楊小凱彷彿又回到了昔日的革命青年楊曦光，在他的文字中，似乎傾訴著對革命精神的感懷與不枉之意，更藉由與獄友們的對話，從中牽引出對文革全面性質的批判。《牛鬼蛇神錄》作為一代青年之療慰之作，在作品中彷彿看到楊小凱穿越二十載，親身為楊曦光梳理羽翅，並帶之一同振翅高飛。

---

<sup>212</sup> 巴金，《隨想錄》，頁8。

#### 四、出版地區

(一)《隨想錄》：發表於中國，北京由北京作家出版社出版。

(二)《牛鬼蛇神錄》：中文版《牛鬼蛇神錄》於中國香港發表，由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英文版《Captive Spirits》(囹圄中的精靈)於美國發表，由美國史丹佛大學出版社出版。

#### 五、「半超越式」寫作樣式之身份策略

巴金與楊曦光無論在文革角色、實存國籍、寫作身份、作品出版地區皆有著明顯的差異，卻同時使用帶有普遍意涵及再現敘事的寫作樣式，足見寫作之身份策略不完全受到文革身份的命定羈絆，而常與文革後之際遇流轉有關。此種不確定性，可由兩人在普遍觀點上的移轉觀察。

「半超越式」較無與個人知識脈絡連貫之普遍觀點。在相當程度上，巴金、楊曦光兩人仰賴的普遍觀點，範疇已遠小於兩人早年原有的知識內涵。巴金於一九二〇年代熱衷於強調個人完全自由、消滅一切強權機制的無政府主義，楊曦光在文革中致力於中國的極左解放路線，然而他們未能在文革回憶中呈現符合自己知識脈絡的「超越式」普遍觀點，而形成斷裂的知識內涵。

巴金在文革時代是否還是個無政府主義的信奉者？可由外部研究與內部研究兩者檢視之。從外部研究觀察，中國無政府主義經歷二〇年代初期之社會主義論戰，至二〇年代末幾盡萎縮，三〇年代後更是杳無蹤跡，因此巴金對無政府主義的跟隨恐怕終止於此一時局之中；從內部研究觀察，巴金從三〇年代起逐漸在文壇嶄露頭角，一九四九起開始背負文壇相關組織工作，並對與中國切身相關的國際議題投注了相當高的熱情，在這樣的條件下，無政府主義不僅不會是他（能言說）的信仰，甚至會成為矛盾於現實生活的重大罣礙。因此，在文革前無政府主義的信仰或許已消失、已隱匿、甚或已逐漸蛻化成純粹的愛國主義與人道主義。巴金在四〇年代過後開始以「理想主義」或「革命者」稱呼昔日的無政府主義同志，<sup>213</sup>便代表著上述假設之成立。

---

<sup>213</sup> 劉慧英編，2002，《巴金——從煉獄走來》，中國工人出版社，頁195。

巴金在文革後便恢復社會地位，因此巴金在回憶文革時，僅以人道關懷為盾作出防衛，而非以手持無政府主義之劍攻擊黨及國家；僅能呈現較單薄的「半超越式」普遍觀點，而非符合自己知識脈絡、力道較強的「超越式」普遍觀點。而楊曦光雖然在文革中參與激進造反派組織「省無聯」，並致力於極左解放的目標，然而他自一九六八年初試啼聲寫出《中國向何處去》隨即在一個月內被捕入獄，十年的牢獄生活對知識青年理想的磨損更是難以估計，他與獄友劉鳳祥對話即有明確說明：

「我目前的政治哲學已與《中國向何處去》時非常不同。寫這篇文章時，我有對理想主義的追求，我認為民主政體應該是民選的…而現在我已經完全沒有理想主義了。我相信人判斷自己所追求的價值標準會隨著歷史變化，所以歷史怎麼發展遠比理想的目標更重要…過去我關心的問題是『什麼是好的，什麼是壞的，這個世界應該是什麼樣子的』而今天我再不問這類問題。而問『這個世界會怎麼發展』…因此屬於好壞是非的判斷沒有任何意義，如何適應環境生存下去才是重要的事情。」<sup>214</sup>

這無非代表著他在經歷人生重大轉折後，從理想主義者過渡到務實主義者的宣告，文革後楊曦光更是以「小凱」之名於經濟領域再露鋒芒，並主動告別了屬於革命時代的「曦光」，因此更是無法延續文革當中的知識系譜了。

#### 六、「半超越式」較無「超越式」般完整而決斷式的身份策略傾向

巴金、楊曦光兩人雖倚仗著普遍式觀點「再進入」文革經歷，卻未能如張戎、徐友漁般形成完整而決斷式的「超越式」敘事。意即張戎、徐友漁兩人藉書寫紅衛兵時期對革命的冷感與對毛澤東的疏離，作為全然超越於文革之外的寫作目的，以此自由式解放書寫，有效地將自身從偶像崇拜的氛圍中解放出來，從而呈現一代紅衛兵拒絕政治愚弄的宣告，並藉此療慰自身一度瘋狂、迷惑過的青春敘事，透過過去謬誤的揮別與斷裂而完成之。在這一點，巴金、楊曦光處理時便未採「超越式」文革論述中的

---

<sup>214</sup> 楊曦光，《牛鬼蛇神錄》，頁 109。

明快與果斷。

針對巴金的書寫，肇因於他從文革一開始即被迫成為受害者，因此對文革並無如兩派紅衛兵（老紅衛兵、造反派）般絲毫「有意義」的參與感，或是任何道德瑕疵，因此自然不需要與文革中的自身作出切割，不需在文本中呈現對環境、偶像崇拜的疏離，亦不需完成「超越式」普遍觀點了。針對楊曦光的書寫，可能的解釋相當多，一來他始終未如其他革命小將接受毛澤東的閱師，因此無法用同一事例檢驗這方面的寫作策略，因此就無法構成「超越式」的瀟灑書寫；二來張戎、徐友漁的「超越式」是建立在「參加文革為一被欺瞞的歷史謬誤」為基礎上形成，從而進行否定、斷裂的書寫，然而，楊曦光在文本中從未認為自己秉持著理想投注熱情於革命是為一種浪費、是為一種徹底的謬誤而應與在寫作時有所切割，是以沒有形成「超越式」寫作策略的需要。

#### 七、「半超越」較無「再現式」之超然敘事

巴金、楊曦光之論述基調呈現接近「超越式」的寫作模式，但同時帶有「再現式」之敘事手法：藉由對他者之描寫呈現作者對文革的價值取向。巴金在《隨想錄》中，藉由對十三名親友的追憶緬懷，譴責文革暴力與政治對知識份子的迫害；楊曦光則透過與《牛鬼蛇神錄》中二十八名獄友之交談互動，拼湊梳理出文革之具體輪廓，及文革中國家對群眾運動的殘酷壓迫。這些時而沉重，時而輕快的側寫，同等真實地反映著他們對文革的透析與價值取向。與「再現式」敘事相較，作者在其中情感涉入更深，批判意味亦較濃厚。

從文革角色觀察此一現象，巴金在文革中為狹義受害者，其妻更蒙難於文革之中，使得巴金從此陷入無盡的自責深淵，因此自無法從此一情感上進行如季羨林、楊絳般超外的傷痕處理。楊曦光作為激進造反派的信徒，對秘密政治結社、徹底擊潰政治制度的地下反對組織有著獻身式的狂熱，而身為地下組織重要關係人的獄友（劉鳳祥、張九龍）先後在文革中遭清算處決，更是逼使楊曦光直接譴責共產黨對政敵殘酷鎮壓的暴行，誓言自己的靈魂「永遠與這些被囚禁的精靈一起」。文革之後，巴金秉



持著「講真話」的態度回顧文革，楊曦光成為著名海外異議份子楊小凱，兩人自不願輕易抹去受害者與加害者的分野，甚至，在回憶錄中，他者之見與對他者的描寫都與作者本身的價值取向有著高度的一致，體現在作者對特定人物感同身受的緬懷之中。身份意義使然，「半超越」寫作從而與「再現式」之超然敘事保持著批判上的距離。



## 第六章 結論

### 一、文革敘事主體的回歸與再回歸

文革敘事主體從海外文革研究進入中國文革研究，再由文革研究回歸到親歷經驗與回憶敘事，過程蘊含兩種意義。首先，文革研究作為西方知識界觀察中國的對象，無論是脫胎自政治學、歷史學、社會學、心理學，出自馬克思主義或是自由主義，都試圖將文革經驗收編於普遍性律則的知識框架中。這樣的知識框架，作為一種體系上的「自我」，而無視於他者作為「他者」的意義，而形成化約論的東方學。理論概念羅列精美，經驗事實卻不免匱乏。在第一個意義之上，中國學者的挺身而出就顯的格外重要，研究文革不僅是責無旁貸的歷史責任，直書歷史，不忍忘卻，這是中國人對這十年集體記憶的責任所在，恐怕也是唯一不枉百萬生命為此蒙難的道義出口。儘管在中國「禁桎的文革」有其壟斷性質的「最後發言權」(last word)，但透過文革敘事主體的回歸的第二個意義，便沿著其書寫模式避開了這個考驗，調和了其中尖銳的衝突。

在第二個意義之上，文革親歷經驗與回憶敘事的出現，忠實呈現富涵個人身份哲學的歷史經驗，讓回憶說話，讓文本對文革真實性發生再現其真實性的作用，再現文革具有其真實性的印象—不管來自何種視角，超越、半超越或再現。無論是慷慨激昂、滔滔直論，還是淡言絮語、默語無言。這些文革回憶書寫的視角，反射出書寫者們基於際遇流轉所造成的意識選擇與其相關論述，具有同等對待的價值，逃開了在有限經驗中抽取出一般結論的誘惑，也避免情馭於理的直觀書寫。

### 二、相互他者化的橋樑

本論文中處理的相互他者化，分為兩個層面，其一隸屬於寫作策略屬性：超越式/再現式之別，其二為四個身份分析向度的安排：紅衛兵／受害者、中國籍／華裔、學者／作家、中國出版／海外出版。這些看似相互他者化的元素，卻由六位文革書寫者一予貫之，而呈現彼此調和不悖的樣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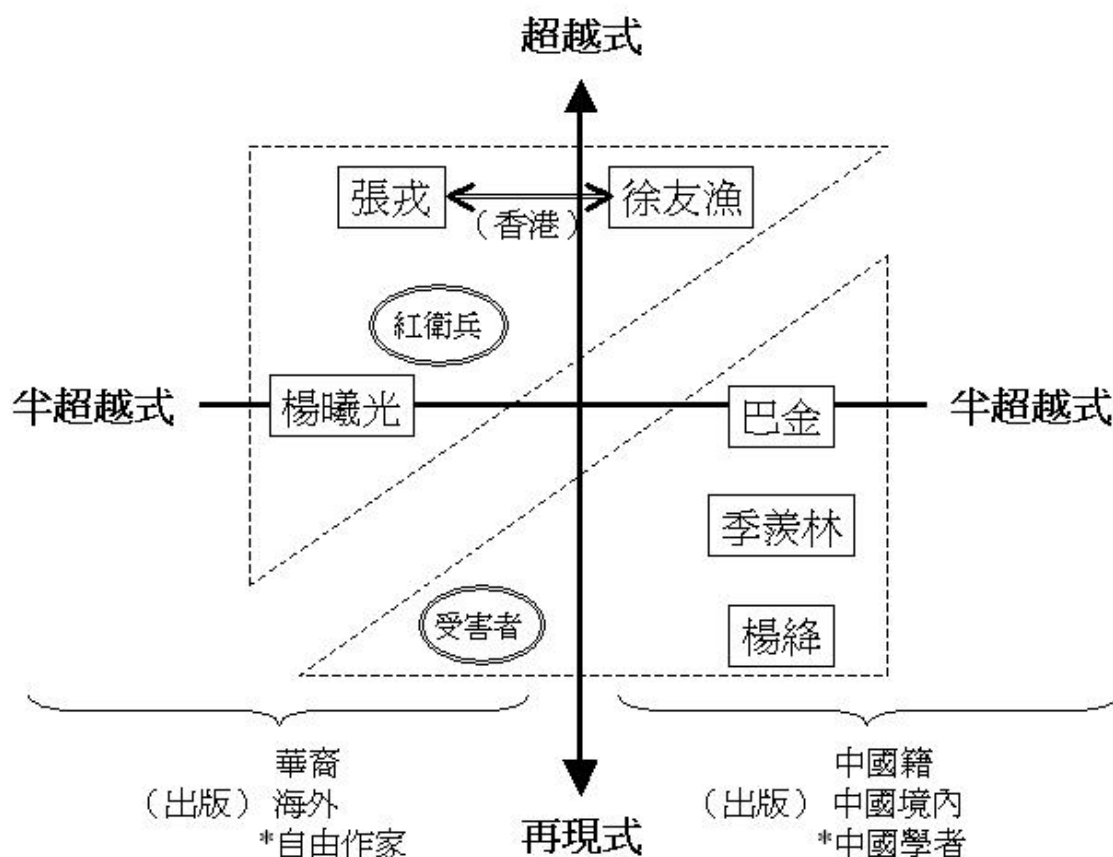


圖 6.1: 六位書寫者之寫作策略與文革角色/國籍/寫作身份/出版地區綜合分析

在第一個層面上，「超越式」成為紅衛兵再進入文革的途徑，深受張戎，徐友漁之文革角色與知識脈落的影響。「再現式」成為狹義受害者回憶文革的途徑的意義在於，季羨林、楊絳用熟悉的語言訴說著文革荒謬經驗，更考量了現存境況，予以「再現式」之空白化。

超越式、再現式寫作策略屬性透過「半超越式」的出現而有融貫的效果，巴金與楊曦光的文革回憶成就了這個實際上的不可能。文革角色中，兩人分別來自文革中狹義受害者與紅衛兵之列；作家國籍中，兩人分別隸屬於中國籍與華裔澳籍；寫作身份中，兩人分別為中國學者與海外自由作家；就連回憶錄出版地，兩人亦有著中國北京與香港、美國之迥異。在文革角色、作家國籍、寫作身份、出版地區之差異中，巴金與楊曦光意外相遇於相似的寫作脈絡之中，這並非意味著四個向度的分析不具意義，而是指出個人身份意義作為本文分析基體的重要性。兩人出於文革後的際遇流轉與文

革角色使然，在不同意義上形成類似的寫作樣貌，然而，他們所持的普遍觀點已與早年個人知識脈絡有所斷裂，亦受文革角色影響而未形成如季羨林、楊絳般純粹再現之書寫。追根究底，是文革中、文革後的身分意義創造了這個巧合，使「被禁錮的文革」與「說不盡的文革」兩者看似不相容的他者，在回憶錄中有並列的呈現。

在第二個層面上，此一分析說明了文革角色、作家國籍、寫作身份出版地區對「超越式」寫作與「再現式」寫作並無命定的約束，但狹義受害者巴金、季羨林、楊絳無來自文革角色的包袱，而較能夠輕鬆地趨向「再現式」；相對地，文革角色則羈絆了楊曦光、張戎、徐友漁，使之被迫形成趨向「超越式」的道德批判。值得注意的是，作家國籍、寫作身份、出版地區有其相似性，從而彰顯書寫者實存地區：海外（包括香港）對文革寫作與出版自由性的影響，這也是批判性質濃烈的文革研究在中國海外與中國本土迥異發展之根源。因此張戎、楊曦光等「海外華人（Chinese overseas）較中國籍書寫者擁有更多的自主性，但此等自主性仍會受到實存意義的挑戰，

「一個身在海外的華人，當他開始對身為華人的拼湊形象進行思索時，他依然會面對許許多多在不同程度上扭曲這個形象的（鏡子）所干擾。因此，他遲早會問：生活在外國人當中如何影響自己對身為華人的看法…對於大多數海外華人來說，最直接衝擊他們生活的，正是置身於非華人社會環境的事實。」<sup>215</sup>

另外，於框架之內，張戎、徐友漁兩位看似僅由「超越式」寫作與紅衛兵的文革身份聯繫的個體，在香港而有對話之意義，足見作家國籍、寫作身份、出版地區之別，無損其「超越式」理念之趨同，<sup>216</sup>香港因其獨特的政治屬性、地理位置、殖民背景與社會文化意識而成爲特殊的政治區塊，不僅是西方知識界用以窺探、交流中國之橋樑地，亦是海外異議份子庇護所、中國學者對國家敢言直諫之地。

<sup>215</sup> 潘翎主編，崔貴強編譯，1998，《海外華人百科全書》，香港：三聯出版社，頁120。

<sup>216</sup> 尤其顯見於徐友漁對張戎和喬·哈利戴合著之《毛澤東：鮮人知的故事》一書的高度評價。徐友漁認爲張戎講述了一個「人們必須知道的、真實的故事」，是最真實的毛澤東傳記，此書貢獻在於顛覆了長期統治人們意識的神話，有助於中國人民真正的思想解放，對世界各國人民認識毛澤東的真面目做出了巨大的、歷史性的貢獻。參考自徐友漁，2006，〈毛澤東：必須知道的故事〉，《開放雜誌》，2006年11月，期239，頁61-63。

一言蔽之，本文最終的關懷揭示與此，西方社會科學對中國文革書寫者在知識形成過程中構成一定程度的影響，但脫胎自書寫者於生命歷程中的身分意識，是致使書寫者使用超越、再現進入文革的決定性因素。本文試圖透過處理這兩個層次上相互他者化的元素，作為理解文革書寫者身份—知識分析的起點，以及個人身份策略上的選擇意涵。讓歷史告訴未來，鑲嵌在書寫者脈落化的身份意識上的文革回憶，不管以何種書寫手法呈現，皆在本質上代表著文革敘事主體的回歸與再回歸，有著補充規範性質的實踐意義。

## 參考文獻

### 一、中文部分

#### 〈專書〉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1987，《中共黨史大事年表》，北京：人民出版社。

巴金，2005，《隨想錄》，北京：作家出版社。

王友琴，2004，《文革受難者——關於迫害、監禁與殺戮的尋訪實錄》，香港：開放出版社。

王年一，2005，《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大動亂的年代》，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王西彥，1991，《焚心煮骨的日子》，香港：崑崙製作公司。

王希哲，1981，《毛澤東與文化大革命》，香港：時代出版社。

王紹光，2004，《理性與瘋狂——文化大革命中的群眾》，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石之瑜，2005，《社會科學知識新論：文化研究立場十評》，台北：台灣大學出版中心。

宋永毅、孫大進，1996，《文化大革命和它的異端思潮》，香港：田園出版社。

宋永毅主編，2002，《文革大屠殺》，香港：開放出版社。

宋永毅主編，2007，《文化大革命，歷史真相與集體記憶》（上）（下），香港：田園出版社。

李一哲原著，漆豪校註，1977，《關於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香港：東亞出版社。

李輝主編，2002，《巴金自述》，鄭州：大象出版社。

季羨林，2003，《牛棚雜憶》，香港：三聯出版社。

季羨林，2006，《另一種回憶錄》，北京：作家出版社。

季羨林，2007，《季羨林說自己》，北京：京華出版社。

周倫佐，2006，《文革造反派真相》，香港：田園出版社。

席宣、金春明，1996，《文化大革命簡史》，北京：中國黨史出版社。

徐友漁，1999a，《形形色色的造反》，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徐友漁，1999b，《驀然回首》，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 張戎，1991，《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台北：中華出版社。
- 張戎，2006，《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台北：聯經出版社。
- 陳一諮，2004，《中國向何處去—追思楊小凱 Where is China-In Memory of Xiaokai Yang》，香港：明鏡出版社。
- 陳永發，1998，《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台北：聯經出版社。
- 陳丹晨，2003，《巴金全傳》，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
- 陳永發，2001，《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台北：聯經出版社。
- 楊絳，1993，〈回憶我的父親〉，《楊絳作品集》第二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楊絳，2004，《楊絳作品精選·散文（二）》，北京：人民出版社。
- 楊絳，1981，《幹校六記》，香港：三聯出版社。
- 楊絳，2006，《幹校六記—及將飲茶等篇》，台北：時報文化出版社。
- 楊曦光，1994，《牛鬼蛇神錄》，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1993，北京：人民出版社。
- 蔡國裕，1988，《一九二〇年代初期中國社會主義論戰》，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 劉青峰編，1997，《文化大革命：史實與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劉慧英編，2002，《巴金—從煉獄走來》，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
- 劉國凱，2006，《人民文革論》，香港：博大出版社。
- 聶元梓，2005，《聶元梓回憶錄》，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 潘翎主編，崔貴強編譯，1998，《海外華人百科全書》，香港：三聯出版社。
- 羅金義、鄭文龍編，1997，《浩劫以外：再論文化大革命》，台北：風雲論壇出版社。
- 羅銀勝，2005，《楊絳傳》，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

### 〈編著論文〉

- 王力維，2007，〈毛澤東主義和人間天堂〉，《文化大革命：歷史真相與集體記憶》，宋永毅主編，香港：田園書屋。頁 203-234。
- 王若水，2007，〈毛澤東為什麼發動文革〉，《文化大革命：歷史真相與集體記憶》，宋



- 永毅主編，香港：田園書屋。頁 186-202。
- 印紅標，1997，〈紅衛兵運動的兩大潮流〉，《文化大革命：史實與研究》，劉青峰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頁 231-248。
- 李劫，2007，〈毛澤東的文革：在毛天下與黨天下之爭中同歸於盡〉，《文化大革命：歷史真相與集體記憶》，宋永毅主編，香港：田園書屋。頁 235-258。
- 徐友漁，1997，〈異端思潮和紅衛兵的思想轉向〉，《文化大革命：史實與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頁 267-285。
- 徐賁，2007a 〈懷舊物品與文革記憶〉，《文化大革命：歷史真相與集體記憶》(下)，香港：田園出版社。頁 982-1003。
- 徐賁，2007b 〈全球傳媒時代的文革記憶：解讀三種文革記憶〉，《文化大革命：歷史真相與集體記憶》(下)，香港：田園出版社。頁 916-940。
- 華林山，1997，〈文革期間群眾對立派系成因〉，《文化大革命：史實與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頁 191-208。
- 華新民，2007，〈關於「毛澤東為什麼要發動文革」的研究述評〉，《文化大革命：歷史真相與集體記憶》，宋永毅主編，香港：田園書屋。頁 173-185
- 楊小凱，1997，〈文化革命中毛澤東控制下的準政黨政治試驗〉，《浩劫以外：再論文化大革命》，羅金義、鄭文龍編，台北：風雲論壇出版社。頁 273-287。

#### 〈期刊論文〉

- 丁抒，1999，〈兩百萬人含恨而終—文革死亡人數統計〉，《開放雜誌》，1999 年 08 月，期 152，頁 36-42。
- 王友琴，2006，〈文革之罪正在被淡化〉，《開放雜誌》，2006 年 06 月，頁 40-44。
- 王毅，1995，〈「萬物生長靠紅太陽」與原始崇拜〉，香港：《二十一世紀雙月刊》，1995 年 10 月，期 31，頁 125-132。
- 印紅標，1996，〈文革的「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香港：《二十一世紀雙月刊》，1996 年 08 月，期 36，頁 37-45。

宋永毅，2002，〈文革中的暴力與大屠殺〉，《當代中國研究》網路版，2002年，期3，頁143-151。

佟新、沈旭，2007，〈文革研究對認識中國社會的意義——一種國家與社會的視角〉，《開放時代》，2007年02月，期2，頁42-54。

周群、姚欣榮，1993，〈新舊毛澤東崇拜〉，《二十一世紀雙月刊》，1993年12月，20期，頁37-43。

金楓，2006，〈文革四十週年，兩個研討會〉，《爭鳴》，1996年06月，期344，頁85-86。

徐友漁，2006，〈文革研究從西方回到中國〉，《開放雜誌》，2006年05月，期233，頁48-50。

徐友漁，2006，〈毛澤東：必須知道的故事〉，《開放雜誌》，2006年11月，期239，頁61-63。

徐賁，2006，〈變化中的文革記憶〉，《二十一世紀雙月刊》，2006年02月，期93，頁19-27。

高默波，2000，〈文化大革命及史論方法：評回憶錄〉，《香港社會科學學報》，2000年春季，期16，頁151-166。

章海陵，2003，〈楊小凱一生追問中國向何處去——從文革舞台到國際講台：激情煉成的經濟學家〉，《亞洲週刊》，2003年07月，卷18，期30，頁24-26。

黃俊傑、蔡明田，1997，〈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試論〉，《人文學報》，1997年12月，期16，頁1-43。

鄭義，1992，〈毛澤東的文革和人民的文革〉，《九十年代月刊》，1992年08月，頁94-99。

### 〈多媒體資料〉

（虛擬）文革博物館 <http://www.observechina.net/Data/Editors/wenge000.html>

宋永毅編

2002，《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目錄，1966—1976》，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任不寐文集，2004，〈楊小凱，站在李慎之與路德之間〉，取自

[http://www.boxun.com/hero/renbm/132\\_1.shtml](http://www.boxun.com/hero/renbm/132_1.shtml)

徐友漁，2005，〈徐友漁關注平等與公正〉，《南方人物周刊》，期 21，取自

<http://www.nanfangdaily.cn/rwzk/20051019/gg/200510300039.asp>

徐友漁，2007，〈懺悔是絕對必要的〉，2006 年度十佳華人公共知識份子文集——徐友漁文集，取自 [http://blog.sina.com.tw/2006\\_ten\\_best/](http://blog.sina.com.tw/2006_ten_best/)

龔小夏，2007，〈迫害性集體行動的邏輯〉，取自 <http://gongxiaoxia.qzone.qq.com>

## 二、英文部分

Martin Conway, David Rubin, Hans Spinnler and Willem Wagenaar. 1992.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on Autobiographical Memory*. Dordrecht, Boston, Lond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Edmund Burke. 1996. *English Text Originally Published as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John King Fairbank. 1986.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1800-1985*. New York: Harper & Row.

John King Fairbank. 1985. *China Watch*.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Johan Galtung. 1990. "Cultural Violence,"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2, no. 3 (1990): pp. 291-305.

Maurice Meisner. 1986. *Mao's China and After: 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New York: Free Press.

## 徐友漁訪談稿

受訪者：徐友漁（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

訪問者：蔡明琴（台灣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研究生）

訪談日期：2007 年 9 月 10 日

訪談地點：徐友漁老師北京家中

---

問：第一個問題是請問您研究文革的動機為何？與文革經歷有直接關係嗎？

答：在動機大概有三個方面吧。第一個方面我自己經歷過，而且我對文革陷入的很厲害，可以說很瘋狂，而且更可以說我對文革的了解情況比較多，因為我在當地也是一個學生的領袖吧。第二個原因是，我覺得我當初年齡不算太年輕，也算是比較動腦筋的人，所以文化革命我記的我大概是 1968 年…就文化革命發動兩年，我就約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人，他們都是比較重要的一些人物，我當初就成立了一個文化革命的研究小組，當初我就有一種自覺，我感到文化革命是個問題就自己開始研究，所以當初就有這種研究的興趣了。第三個直接的原因是 1992 年到 1993 年我在英國的 Bristol University 研究西方哲學，我在圖書館書架上看到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書，那上面有一段話是「東方在中國，但是東方學在西方；文化革命在中國，但是文革學也在西方」這段話對我刺激很大，當初我覺得我不服氣，我覺得文革是我們經歷的事情，怎麼文革學在西方呢，然後我就開始看有關文革的文獻，我發現事實果然是這樣，中國人毫無研究，就三個因素加起來我就開始研究文革了。我的研究就從自己的優勢而來，第一個我經歷過，外國人看半天他們也看不懂，因為中國文化革命太撲朔迷離了，所有事情到底哪一個說法是真的，外國人很難判斷，我自己有這種經驗，我一看我就知道是怎麼回事。同時我自己在 68 年成立的文化革命研究小組，當時就有了一些想法，這些想法現在用來研究就非常有用。另外還有一個比一般中國人好的條件，中國人研究文革基本上沒有懂外語的，他們都是自己關起門研究，這是一個坐井觀天的事情，他們不知道他們的研究外國人早就研究過了，或外國人研究比他們好的多。我自己因為是研究西方學術的，而且我到國外著名大學的機會非常多，這讓我自己信心方面大的多。我跟中國人研究文革不一樣，中國人好像是自己經歷過很多轟轟烈烈的事情，就去進行研究，他卻不知道怎麼看待這些事情，我做研究不一樣的就是，我首先研究西方學者已經研究了什麼，這是作學問的第一步，不然就像中國人到了 90 年代研究文革，還沒有達到西方學者在 70 年代的水平。而你看外國人的研究，就像你搞自然科學、物理學、數學，你自己關著門研究，別人到底研究了什麼你一點都不知道。所以我有這些優點，第一，我自己經歷過文化革命，第二，我當初也研究過，同時我對外語的熟練程度與瞭解國外研究的程度，我有這三個條件研究起來就比較容易一些。

問：文革發生時，是否各地資訊不一？能否談談文革經歷。

答：我當時在四川成都，我是第一中學三年級的學生，就正在考大學的時候。文化革命中我做了很多錯事，我也勇於承認。中國其它地方的特點是都比北京慢很多，資訊上有很大的落差，北京的事情要將近半個月至一個月才傳來，就會發生很有趣的事。我們標準說法是從 1966 年 5 月 16 號文革發生，我參加到 1968 年底，之後毛澤東一聲令下，所有的中學生和大學生，我們全給趕到農村去了，作為紅衛兵就結束了，但後來我們下鄉以後在農村還再搞文化革命。所以這裡面有很關鍵的因素是，西方很多學者都認為文化革命最多三年，甚至沒有，甚至有書的標題是「文化革命：1966-1968」，但是中國的標準是說文化革命是十年，一直到 1976 年 10 月份，華國鋒和葉劍英把江青他們抓起來才算結束。關於文革分期就是一個非常值得研究和引起爭論的問題。

問：請問您如何理解用普遍觀點研究文革的意涵？

答：如果用妳這種界定，我當然認為普遍觀點是比較科學的，雖然我們任何一個學者不給自己貼上標籤，但是我研究一段歷史應該是有一些共同規範的，當然肯定要收集歷史的真相。這不是派別的問題，假定不願意面對歷史，比如大屠殺，或者替它辯護，這就是沒有資格也沒有良知的問題，這一點我覺得是願意面對歷史真相與不願意面對歷史真相的分別，這種區分在我看來是有無資格作研究的問題。面對歷史只有一種態度，就是去面對它。我們去年冒著極大的危險，在北京舉辦過文革 40 週年的研討會，我們提的問題和妳的觀點相關，我們提出研究文革大概有三種方式，第一個方式是鄧小平的、中國共產黨中央的方式，它的研究框架是文化革命是偉大領袖毛主席犯了一點錯誤，它有七分功績三分錯誤，而這種錯誤的主觀動機是好的，他想把中國建設的非常美好，是被一些反革命份子（四人幫）利用了，因此研究文革就是研究一個偉大人物犯了一點錯誤，這種研究方式統治的中國大陸的官方歷史學界；另一種方式就是文革過後中國大陸知識份子說的，文革是一個很壞的東西，但是在文革中間，這種壞叫做「我們偉大的黨犯了一個路線的錯誤」，但是文革中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像周恩來、鄧小平、陳雲，他們還是在堅持正確的東西，而中國的知識份子雖然受到了迫害，他們也堅信，黨永遠是正確的，總有一天黑暗會過去，這種觀點就像妳看的季羨林的《牛棚雜憶》一樣，他跟那些小丑作鬥爭，這也是一種研究；我們回答妳的問題時，要進到第三方面，這兩種方式都不正確，雖然第二種要比第一種正確一點，都是在一種傳統的意識形態裡面。我們現在看文革應該用一種人權及民主自由的觀點，比方紅衛兵殺死了人，那他就是在法律上犯罪，他們就是罪犯，我們就不可能用第一種或第二種觀點，認為是小將犯了一點錯誤，是一個認知上的錯誤，但是認識上的錯誤怎麼可以掩蓋法律上的罪則呢？我們當然應該用這樣一種觀點來研究。所以現在中國最新的一批人，包括我在內，我們認為應該進入到用普遍主義來研究。以前那種意識形態很可笑的，什麼七分功績三分錯誤，什麼偉大的毛主席犯了一個極左的錯誤，然後被反革命份子利用，用這說明文革是非常荒謬非常

可笑的事情。我們應該正視文革發生的暴力，發生了殺人，整個法制完全不存在。如果在妳的框架裡，我當然承認我現在贊成的是一種普遍主義的觀點。

問：老師您覺得持普遍觀點的學者中，他們有相似之處嗎？比如跟文革經歷或是後來發展有關係嗎？

答：從邏輯上來說，應該跟以前經歷沒有太大的關係，只看他現在接不接受這種普遍觀點。像是我認識的一些非常有名的造反派，像是蒯大富，他們仍然持著第一種觀點，他們可能不知道，也沒有那個條件去知道聯合國的人權宣言或是人天生擁有人權，這就和他的文革經歷沒有關係，只是跟他現在實存狀態有關，跟思想的認識水平有關。我現在接受了普遍主義的觀念，用來研究文革就是這樣的觀念。邏輯上是這樣，但在實際上造反派更多人可以接受這種人權的觀念，這是事實，因為以前的老紅衛兵是跟現存的體制聯繫在一起的，他有既得利益，他如果肯定中國的現實制度的話，他就容易站在黨的立場看待文化革命，而造反派沒有這種既得利益和思想包袱，但這只是在實際上容易跟不容易的差別。從邏輯上來說還是實存決定。比如我現在在中國社科院工作，很多人當我是官方體制內的學者，那為什麼我的觀點又和官方的不一樣呢？所以這跟體制也不一定有關。所以說到底還是自己現在的思想狀態決定。

問：所以或許對特定觀點的理性選擇決定了人們的文革視野？

答：有個別的人研究文革是理性選擇的結果，比如像我，我研究文革採取了學者的客觀態度，不受地位的影響，但是這種畢竟是少數，從社會學或是統計學的層面來說，大多數人採取的態度都受地位的影響，這也是事實。

問：身為處在北京的文革研究者，對您的研究有什麼的影響？

答：我的文章都是在海外發表，這裡不會容許的。今年六月份就發生很大的事情，全世界都知道，北京有一個團體請我去作文化革命演講，後來就有…不知道你們台灣怎麼說，就是搞安全的警察吧，他們就知道這件事，就通知我們單位下了禁令「我們絕對禁止」，我說我肯定要去，他們就說「如果你去參加這個演講會發生非常嚴重的後果，我們現在對你提出這個預先警告」，這件事…第一後來我還是要去作，第二後來我把它公佈到網上，最後他們讓步了。他們要禁止的話太容易了，有無數的演講他們都可以禁止，首先演講需要場地，他們可以找到場地的老闆，警察也會堵在門口不讓你進去，這些事我都想到了。

問：您覺得他們何以會讓步？

答：這個讓步是很例外的事情，他們事前連續三天給我施加極大的壓力，我覺得他們是會採取手段的，之後我也覺得很奇怪，這是最近很罕見的事情，我唯一的解釋是…你們台灣人應該更敏感這些事，現在要辦奧運了，他本來很多特務的工作就先不做了。妳想 1936 年德國要辦奧林匹克，希特勒暫停對猶太人的暴力，但他們什麼事情都不做了，因為他們要做讓世界看，這是我唯一的解釋。所以妳就知

道研究文革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我主要的著作發表在海外，不可能在國內發表，我連做一場演講都不允許，我為了要表明我的演講是有道理的，我說我事先可以把演講稿給你看，你們看了有問題，你們可以禁止。但這其實都是不對的，因為言論自由，但我都這麼做了，站在你們（指台灣）的觀點看應該沒有問題，但他們就說文革就是不能談。

問：但香港似乎又是另一種情況，是否這代表著官方有意識的刻意容許，請問您如何看待這件事。

答：沒有阿，這純粹是一種臨時的措施，現在要辦奧運會了，它在某些方面要看得更緊，在某些方面要寬鬆一些。就像現在如果臨時有些事，我對妳笑咪咪的，這不說明我改變了。

問：我注意到普遍觀點與季羨林、楊絳、巴金的回憶文革方式有顯著的不同，對此請問您有什麼看法？

答：一般來說，妳提到的人不論是季羨林還是楊絳，甚至包括巴金在內，他們都是中國的高級知識份子，他們的基本立場是這樣的，第一個是他們是憎恨文化革命的，文化革命讓他們吃盡了苦頭，而在文化革命之前，因為他們的身份地位很高，黨需要利用他們，他們過著相對而言比較養尊處優的生活，他們經濟條件和社會地位都比較高，他們以前是跟官方相當一致的。文化革命對他們來說是個災難，而且文化革命中，客觀的說，他們地位下降而形成和以前截然的對比，他們總的來說，是詛咒和憎恨文化革命的，所以後來中共中央在否定文革的時候，他們是非常支持中央這個決定。這種觀點可以說是沒有跳出中共的意識形態，一丁點都沒有跳出來，他們覺得文革前很好，文革中他們受到無妄之災，文革之後又恢復了秩序，這一點他們跟官方是一致的，他們對官方意識形態沒有任何批判的東西。他們還有第二個共同點，他們由於養尊處優，他們對中國現實不懂，他們對文革為什麼受害、文革如何發生沒有正確的認識，所以他們總是看到那些迫害他們的造反派，他們非常憎恨這些人，他們記仇是記的很厲害的，他們就很難想到這件事最後的根源在毛澤東，他們也沒有能力研究、追溯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悲劇。他們後來有了話語權，是著名的知識份子，寫了大量的書，他們基本立場就是以上兩點。這裡面還有一個不同，巴金就是直接了當控訴文化大革命，他雖然沒有能力去找到那原因，但他算是非常勇敢指出文化革命就是非常壞的事情。季羨林、楊絳實際上基本立場和我剛才描述的一樣，但是妳知道中國知識份子有這麼一個傳統，他們有「跳脫」的思想境界，他們覺得寫自己受了多少痛苦，這境界是不高的，他們就故意要描寫那些超脫的東西，他們對待苦難和不幸採取一個淡然處之的態度。我覺得妳就太看重這一點了，你沒有注意到這種知識份子有一種基本的立場，這種基本立場實際上是控訴和詛咒文化革命，把文化革命當作是黑暗時代，尤其是季羨林、楊絳很容易讓人有這種觀念。老是說苦好像境界不高，這只是一個表達的手法而已，他們故意用輕描淡寫的方式描寫發生在自己身上的迫害和罪惡，實際上他們立場還是控訴，他們這種態度是中國傳統文人的態度，

這一種態度是很特殊的，可以讓讀者更信任他訴說的。巴金就沒有採取這種態度，但是他們基本立場還是一樣的。

問：除了這種寫作上的表達手法外，還有其它實存的因素造成他們「不能言」的可能嗎？

答：要看人，我覺得像楊絳，她從 1949 年從來都不是很高興，她對中國的現實很深刻的不滿，所以她有一種不得已。但是像季羨林是個更老實的人，他可能認為新中國是更好的，現在黨已經改正了錯誤了，所以他們之間實際上是有差別的。巴金我覺得比他們更勇敢一些，他就是直接了當，對文化革命採取非常憤怒和控訴的態度，這一點跟他們有是有差別的，而且巴金就覺得應該大講文化革命，我們應該要去找這個悲劇為什麼會發生在我們身上。但是巴金依然沒有跳出官方的意識形態，他仍然不知道到底為什麼會發生，所以巴金問的問題非常天真，他始終在想「為什麼文化革命他們（指學生）都是人，怎麼一夜之間就變野獸了？」我覺得這樣的好處是他站在普遍主義、人道的立場，但他們的缺點就是只會問這些非常天真的問題，他們變成獸不是一天的，不是說文化革命他們是人，文化革命當中就變獸。巴金你在文化革命中寫過那麼多根據黨的命令的關於階級鬥爭的小說，把中國年輕人從人變成野獸你也有責任阿，但你看不到這點，我要再問個不容客氣的問題，這些學生不是你教出來的嗎？你們在文化革命中灌輸了多少觀念。我自己就有這種親身的經歷，文化革命前我喜歡看很多西方的小說，充滿人道主義的，托爾斯泰、屠格涅夫、左拉的小說，我們語文老師把我當反動的學生批判，他把我的作文拿到全班面前去散發，說「你看這學生思想多壞阿，全是西方那種人道主義的東西」，我自己是非常人道主義的，文化革命中我有機會去批判但我沒有去批判他。實際上這批人會變成野獸是你們把他們教出來的，為什麼你們不知道呢？但是大部分的人包括巴金、季羨林他們都看不到這點。這悲劇是因為文化革命之前毛澤東創造的體制才使人變這樣的，而你們在體制內是既得利益者，你們實際上是在維護這個體制。

問：若我們回到一個關於真實性的探討，我這幾天在北京蒐集資料，發現許多關於文革歷史的記載跟台灣及香港是不同的，比如說第一張大字報究竟有無授意的過程，或是由誰授意…好吧，既然一些爭議是個人感觀的問題，那這些真實的歷史事件到底有沒有它的依據？

答：這有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是大陸的政治體制基礎之一是靠製造謊言和神話，有一套系統化的制度去創造它，所以很多東西不可信是這個制度決定的，還有一個方面是文化革命是一個很複雜的事情，有很多東西確實是當事人想替自己辯護或是事情本來就很複雜，歷史可能本身就是一個謎團。比方第一張大字報這個例子就非常，第一張大字報說不清楚的就是我說的第一個原因，照我跟印紅標的研究，第一張大字報是自發的，而官方要把這件事說成是康生授意的。如果說成是聶元梓等人自發作的，就涉及到文化革命前北大內部的矛盾，這就會揭露文化革命前中國政治體制上的問題，這是官方不願意的，官方就願意把事情說的很簡



單，就是康生指使的。如果是康生指使的，就不存在文化革命前（北大校長兼黨委書記）陸平與聶元梓的矛盾，這是官方不願意讓人看到的東西。現在包括聶元梓本人都說那是他們自己寫的。這回到我剛剛說的第一點，中國大陸為了維持現存的體制，系統化地去扭曲歷史。

問：對於敢於揭發中共政權虛偽性的華裔作家張戎，您有什麼看法？

答：張戎，我在開放發表過了（毛澤東：必須知道的故事），我是在學術上肯定她的。

問：您如何看待自身、左派與官方三方認知文革的意義

答：左派實際上是從理想主義的角度肯定文革，贊成當時的毛澤東而反對現在的政權，認為毛澤東要建立一個理想社會，打倒特權，建立平等社會，鼓勵群眾動員。現在這些左派去研究文革，只看到毛澤東那些美妙的話，那些話正是當初欺騙我們的話。而官方是否定文革，官方的態度是很簡單的，鄧小平、陳雲當初是被毛澤東打倒，毛澤東打倒這些革命功臣，他們本應是享受高位的，所以官方是在這種意義上否定文革，而且否定的很徹底。左派攻擊我說你們現在跟官方一樣，但我們（可能泛指國內的自由派學者）和官方否定的立場不一樣，我們否定的意義是文化革命破壞了人權，侵犯了文明，把國家帶進了災難。左派是肯定文化革命的，所以他們對我們也很不滿意，說你們這些什麼自由知識份子，官方否定文革你們也跟著否定文革。他們就看不到我們跟官方否定文革的差別，官方否定來自個人利益的維護，是來自老一輩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否定，而我們的否定是站在一個普遍主義的立場上否定。

問：您如何看待中國未來的政治社會發展？

答：中國大陸存在越來越多不公正的事情，尤其是腐敗的問題，民眾常覺得這種現存的腐敗是無法反對的，是官官相護的，中國的民眾又不知道西方那種法制社會是如何處理這些問題，他唯一的經驗就是文化革命，也就是動員群眾去打倒貪官污吏。因此我覺得以後最大的問題不是文革重演，根本不可能的，但是面對越來越尖銳的矛盾，民眾會用類似文革的方式進行大規模的社會動亂，來實現他們認為的理想社會。實際上這點不是我的推測，現在的情況就是這樣，比方說現在河南省，文革中很激烈的河南省，下岡工人每年都在遊行示威，他們舉著毛主席的像，他們的口號就是文化革命，我認為有現實可能性的危險。就我認為應該搞政治體制改革，把中國建設成現代化的法制國家，很簡單，就學習台灣，學習蔣經國，放棄一黨專制，實行民主制度，使民眾和政府間的矛盾可以通過法制處理，這是解決社會問題比較好的方法，雖然這一條路目前還看不到出路。台灣似乎也還在這條路上努力，或許有一些混亂，但起碼台灣的法院大抵上還是比較公正的。這是中國邁向文明的方法，中國只能走這條路。